

米奇尼克文集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 著
崔卫平 译

目录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崔卫平）

- 1。我投票反对瓦文萨（1990）
- 2。灰色是美丽的（1996）
- 3。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 4。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 5。新演进（1976）
- 6。可以谈话，没有仇恨（1991）
- 7。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1988）
- 8。反权威的造反（1987）
- 9。革命散记（1990）
- 10。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1991）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崔卫平

我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这位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有位美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¹然而，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们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²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关米奇尼克的著作：《狱中书简》(1985年)、《自由书简》(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还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的书《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它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米奇尼克的信”，作者Ira Katznelso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米奇尼克写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77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980年团结工会巅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称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一 “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在谈及家庭时，他用了“红色同化”这个词。)他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³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Katyn)的事实？”结果是被老师

赶出了课堂。看到父亲的老战友及自己的亲戚身上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十五岁时，他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一个将自己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Club for Contradiction Searchers）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红色家庭。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团体，讨论当时被禁止的各种各样问题，在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刚满十六岁，他在大街上遇见库隆（Kuron 此人担任过波兰共青团书记，最早的异议人士，后来成为团结工会顾问），库隆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米奇尼克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而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中学过关考试后，他首次去国外呆了三个月，见到了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遇见朋友 karol Modzelewski，他惊讶朋友为什么不在家里约他下一次见面，却要约到公园里。结果是几天后他在公园等了几个小时无功而返，来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经被捕。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时刻——他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库隆在内的人们的纲领，但是他感到和他们亲近。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正在策划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库隆（此时属于共产党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岁“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一次，当时的外交部长拉科夫斯基参加了讨论。年轻人向这位大人物发出质疑：“哥穆尔卡是一个人，还是上帝？”答曰“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答曰“不能，这不可能。”

“那么，拉科夫斯基，为什么他身上不能找出一个错误来批评呢？”从反权威的立场导致的质疑，和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非常接近。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后者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于此时不仅很对年轻人的心思，也适应了社会上人们渴望冲破樊笼的心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发放命令的是高教部本身。正当他沉浸在由这部戏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波兰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出兵国之一，使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进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当时的报纸上对他采取了“反犹”攻击：不止一家报纸说，米奇尼克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他的位置。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使得他最终和共产主义制度划清界限的原因。接着是十八个月的牢狱，罪名之一是他参加了一个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存在。目睹了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之后，米奇尼克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1969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它有一个光辉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位知识分子

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个工厂有着华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们中间很受欢迎，“我想不出来还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们组织了一次抗议，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1970 年秋季，哥穆尔卡下台，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课堂，作为 Poznan 大学的扩招生，1975 年得到历史学硕士学位。直到 1977 年重返监狱，这是他前后十年中远离审讯和牢笼最长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和天主教知识分子有了广泛的接触，他们互相阅读，彼此产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当时也只有天主教的报纸发表他本人的文章。与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教堂和左派》，试图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力量结合起来，该书 1977 年于法国流亡出版社出版。他还鼓励老朋友库隆看望波兰主教，而此前，这位共青团书记仅仅将教会视作敌人。阅读阿伦特也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一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1976 年 9 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稍前，在 Radom 和 Ursus 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 Ursus 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紧接着，米奇尼克和库隆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别就此事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识分子支持波兰工人。这是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随即 KOR 诞生。

“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它是在后极权制度中所开辟的新空间。

在此期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了一趟法国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发现在东欧和西欧的持异议者之间“存在着悖谬的联系”。那些和他同样经历了 68 年洗礼的年轻人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主要的概念区分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对米奇尼克来说，他的主要区分是极权主义还是反极权主义。他经常被问及 KOR 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两句话回答他们。第一，“我们不是来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我们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支持波兰工人？”因为波兰工人正在反对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产主义阵营。回国之前，库隆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带一个油印机回来，米奇尼克认为库隆“疯了”，“在波兰什么地方可以藏这样一件玩意儿？”

从巴黎、罗马、伦敦、汉堡喝完香槟回来仅仅两个星期他再次被捕，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尽管他用民间的老话“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来替自己打气，他还是感到很不好受。这次是因为一个学生也是 KOR 的合作者被杀害，他们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返回的路上汽车就被拦截。这是 1977 年 5 月，被捕引起了知识分子团体广泛的反对逮捕的抗议，关了两个月就释放了。但是这样的规定却遗留一段时间：每两个星期之内，他就要在监狱里呆上 48 小时。它的讨厌之处不是呆在监狱里的时间，而是等着被投入监狱的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麻烦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他说。直至 80 年投入团结工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 KOR 的活动，米奇尼克还帮助建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帮助“飞行大学”展开活动（在人们家中或别的地方开设被禁止的课程）。

1980 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叫做 Bogdan Burusewicz 的 KOR 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但于 1980 年 8 月，

他和其他几个人又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时间内，直到今天，我们都认为团结工会是我们（KOR——笔者）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

在这个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米奇尼克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萨摆正位置？“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从一个异议者立场来作出判断。当被问及在团结工会的“日常工作”时，米奇尼克答道：“我处在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里。”他担心瓦文萨和政府之间妥协太多，防止将团结工会变成一个纳入现存制度组成部分，同时严厉防止瓦文萨把自己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成为一个新的权威，从而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在他认为，团结工会的经验，是他们所有有关民主、自由、尊严、判断的学徒期。选择当团结工会的反对派，这使得瓦文萨很恼火。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瓦文萨跟米奇尼克、库隆这样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米奇尼克身上恰恰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他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乃至后来瓦文萨私下对米奇尼克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拧断像我这样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让我活着。”这种情况一直到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军管，把米奇尼克、瓦文萨、库隆这些人通通关进监狱而告终。从监狱出来后的一度时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萨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军管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关了两年八个月，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审判。1983年底，当时的警察头子让人带信米奇尼克可以选择去里维埃拉过圣诞节还是继续留在牢里过上几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里维埃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们是一些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即使在牢里。我不想离开波兰，别打这主意。”这封信被自由欧洲电台于圣诞节广播之后，波兰人也听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米奇尼克是犹太人，因为他已经显示了对于波兰的忠诚。这次出狱六个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的评价是——“为了团结工会十六个月辉煌瞬间，付出六年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国68年人Daneil Cohn-Bendit访谈中，他扪心自问“作为一个68年的老兵”，他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贯？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终坚持反权威的理想。这是我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我反对瓦文萨的原因。”法国人对他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作战。我刚不久前在西方说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人之一，但是我必须说，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兰我是否有勇气像你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对监狱的威胁。”米奇尼克说：“我和你一样热爱生活，所以殉道者的头衔根本不适合我。”“我并没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强逼的。一个君子总得始终做一个君子，甚至是在屎尿中行走。”但同时他承认关于“殉道者”的说法有一点是真实的：“如果你捍卫一种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让它实现，用你自己的行为表明你相信它；换句话说，你要让它得到见证。”

1991年瓦文萨当上总统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Gazeta Wyborcza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1999圆桌会议10周年之际，当年的原班人马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瓦文萨没有到场），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现任总统、总理更大的欢迎。

二 立即动手重建社会

1985 年米奇尼克的《狱中书简》出版时，他仍未获自由。为该书作序的美国作家、反核活动家 Jonathan Schell 在序言中写道：同时具有反思行动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是不多见的——写作要求孤独，而行动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够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因于权威帮忙的结果。因为他们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动的框架之内，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写于 1976 年 10 月的文章《一种新的演进》，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动的开端。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涉及一个对形势的判断，即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行动，我们（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空间。对于当时波兰的政治形势判断，米奇尼克的结论是——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于波兰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波兰必然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和这种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赢得一场对于苏联的军事战争这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于想要改变波兰现状的人们来说，并不是十九世纪左派的“改革”还是“革命”的问题。“要相信通过革命和自觉组织的行动来推翻某个专制，即非现实，也是十分危险的。”⁴ 在短期内，完全看不出来苏联想要放弃对于这个地区的全面控制，如果苏联军队不可能赶出波兰，苏联的政治结构仍然保留，波兰的政治格局将会一如既往，极权主义也将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米奇尼克同意当时人们谈论的第一点——不可能战胜庞大的军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点：所有的抵抗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是这种抵抗要获得一个全新的起点。米奇尼克分析了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上风的改革派“修正主义”（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opositivist）。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试图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别的解释，把共产主义制度加以松动和自由化；后者主要与波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寻找一种讲实效的途径通过与其合作来限制它。修正主义忠实于圣经（马克思主义）但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它，而新实证主义追随教堂（效忠于苏联）却希望它迟早完蛋。这两者都是在体制之内的运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积极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们归根结蒂在“勃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解决问题的取向，使得他们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失去了应对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义。譬如修正主义之于 1968 年的民主运动、新实证主义之于 1970 年的工人罢工，都不能最终选择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边还是遭受暴力的一边。结合中国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和九十年代的实用主义，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兰的这两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对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相信演进的纲领必须在独立的公众（an independent public）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给极权主义的权力。这样的纲领必须指引人们如何去做，而不是说给掌权者让他们如何改进。对权威来说，没有比来自下面（from below）的压力更能够引导他们。”⁵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头脑中，不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关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断关注他们的行为、动向，希冀最终由权威作出关键的变动，从而引起预期的社会效果，或者借此作为自己政治赌博的押宝。采取和皇帝一道进餐的人仍然将皇帝看作唯一的权力资源，他将依据皇帝的脸色、皇帝的将要收获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拥有的某个怪癖，也成为这些人关心的对象和行为的依据；而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们相信还有别的权力资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为当

中，这样的行为不需要皇帝来钦定，不需要皇帝赋予其意义，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赋予的。说米奇尼克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是鲜明的例证：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着眼光向下，意味着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样独立的人们，他和这些人们的行为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起点。他这样的行动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人们那里开始，而且可以马上就去做。当然，苏联军队暂时不可能被驱逐，那么在十个人聚集在一个家庭中聆听被禁止的关于波兰历史的讲座如何？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由一小组工人写出他们工厂和他们生活的真实报告如何？而当全国千百万人抛却恐惧，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地方性的行为又将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 Irena Grudzinska-Gross 的话来说，是“一种超越政治地平线的限制但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理界限之内的努力。”⁶

这一套表述在起点上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哈维尔有着非常接近之处。与哈维尔不一样的是，哈维尔更强调从恢复个人的尊严道德开始冲击极权主义无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说，极权主义如此践踏了个人的良心，那么从恢复个人的良心开始即开始一场革命；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会领域，他呼吁的是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是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倡导创立社会的独立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和自身的命运。极权主义曾经以一种非常严厉的方式压抑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但是到了极权主义时代后期，在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政权和波兰的当代社会生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有待发掘的空间。就权力方面而言，它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它已经做不到它曾经做到的，它的控制变得不那么有效，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它变得被迫向社会妥协，或者有可能出现这种妥协。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和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米奇尼克最终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杂交品种”，政府能够认可和接受没有同他一道进餐的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的独立机构。这便是“新演进”的内容。在这篇文章的结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担当这种“新演进”内容的三种力量：首先是工人阶级，与被当作夺权和维护政权的领导阶级的作用不一样，米奇尼克的工人阶级是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朝向民主的公众生活演进的必要条件。”⁷ 其次是天主教会，这是米奇尼克根据波兰的特殊情况作出的判断：“大多数波兰人感觉和教会很亲近，大多数波兰牧师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第三则是知识界，知识界在这场新的变革中的角色为“提出纲领和捍卫基本原则”⁸(defend the basic principles)。也许他们的声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在这个队伍中也许还有别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义者和前实证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在 1968 年事件之后明白过来。

米奇尼克本人带头实践了这个“新演进”的纲领——他和库隆并肩做成的“保护工人委员会”(KOR)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帮助工人的组织。(它令人想起捷克“七七宪章”之前，哈维尔他们有过一个“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服务于这样一些十分具体的目的——在经济、法律和医疗方面，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在一些持异议者的眼中，KOR 的人们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s’)，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免遭政府的整肃，显然政府不这样看待他们的行为。任何超出极权主义政权原先的工作范围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敌意的，是一种故意为难和对抗。结果，KOR 的成员很快遭到了来自政

府的报复：丢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等，总之是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许只有伟大的目标才配遭此待遇，而 KOR 的目标则是渺小的。同时，在 KOR 组织内部这样的一些做法也是开先河的：一、公开化。KOR 成立时，不仅公开其成员的名字，而且公开他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二、真实性。在 KOR 发表的所有公开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实的准确性，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行动的自主性。这是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也适用于 KOR 成员内部。于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新的起点，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 另外一个重要组织者 Lipski 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这并不有悖于 KOR 的原则，那么他会得到允许追寻他们自己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们的首创精神和激情推动下完成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⁹ 四、互相信任。“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这是作为一项原则确立下来的。这四项基本政策归结起来，就是不搞阴谋论，不搞权力中心论，不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意志在某处发挥作用。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它自己的理由、过程和收获。这就决定了这样的组织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组织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却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们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来，具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KOR 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的 KOR 式的独立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是 KOR 同意他们的独立性，而且是要求他们成为独立的。”¹⁰ (Lipski)。前面提到的较早时候格但斯克船厂工人的罢工（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前），就是一个 KOR 的成员在那儿组织的。1980 年 8 月，KOR 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这四项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爱用一个词“修辞学”，即不仅在目标上和过去作一个了断，而且在全部“修辞学”上幡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条告诉人们，革命就是获取权力，先抓住国家权力，然后再去建设社会；新的做法是鼓励人们把“权力”和“社会”区分开来，将权力的问题放在一边（留给国家），按照你认为理想的社会先做起来；旧意识形态许诺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现在必须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认为的好事，“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

（米奇尼克）¹¹；铁的历史规律提醒人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论自由吗？那么，请自由地说吧。你不是热爱真相吗？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开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吗？体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政府将在未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你于现在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显示出你的忠诚、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们开始“as if”地行动，这个“as if”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使得人们陷于瘫痪的那些理由有许多仅仅是心造的幻影，人们感觉事实上踏入另一个空间，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氛。尽管这只是“接近”行动，“as if”那就是行动本身，并打开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来，你会觉得这个“as if”并不是“伪装”，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最早的持异议者、KOR 的另一位组建人库隆说过：“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¹² 还有一个令许多政治家头疼的问题——目的和手段。传统上所鼓励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兰反对派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统一，每一个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处于建设社会的开端，你怎么可能

允许你的行动被残酷、欺骗所污染同时也是污染社会？

三 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

哈维尔曾经澄清过“反对派”(opposition) 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 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及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但聚集在七七宪章旗帜下的人们，他们只是想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一直到 1989 年 12 月天鹅绒革命的前夜——1989 年 10 月，捷克的“公民论坛”组织成立，这才是被认可的捷克第一个“反对派”组织¹³。波兰人的说法不一样。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自己是“反对派”，是“民主的反对派”(democratic opposition)，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有关将来要建成什么社会的前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米奇尼克“公民社会”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实际上是重合的。它意味着承认社会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纷争只能通过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来解决。那是一个仍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只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和当下他们所处社会大不相同。这一点决定了团结工会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在欧洲近代社会运动历史上完全不同的起点：“我认为团结工会为欧洲文化带来了全新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乌托邦的。……团结工会为之奋斗的公民社会本质上是不完善的。这对我很重要。在 12 月 13 日（指 1981 年底波兰军管当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写的所有文章都在捍卫这个观点。我们不能为一个摆脱了冲突的完美社会而奋斗，那是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但其中的冲突可以在民主游戏的规则之内得到解决。”¹⁴ 米奇尼克在一处称之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¹⁵。1988 年在回答那位后来为哈维尔写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的美国人 Jone keane 的提问“公民社会是一个 18 世纪的概念如何运用于今天？”时，米奇尼克答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老师，而社会是教师里的学生，有时它就转变成一个监狱和兵营。相反，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诞生于 18 世纪之末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作为反对封建制度提出来的，20 世纪末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更野蛮的封建社会。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起用这个古典概念为一个民主秩序而斗争，就不奇怪了。其关键是，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反对派再也不想被当作小孩或者奴隶来对待。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人权，即每个人拥有和君王一样的权利。我们希望每个人享有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法律条文的保护。”¹⁶ 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 KOR 还是团结工会，都是通向这种公民社会前景的途径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运动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变革部分起源于共产党内部，而波兰民主运动起点全然是在党和权力之外的某个地方，是“草根的运动”，(a grass-roots movement)，它不由权力来引导也不受它权力的保护，从一开始，其做法就是政治性的，是对于现有政治框架的冲击，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中加进一个异数，在不存在反对派的环境中充当反对派的角色。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陷入毫无目的、随时随地的那种冲突，目标的清晰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觉和界限。“大多数自发的社会运动（除个别的以外）陷入一种日复一日地和权威不停地冲突之中——并不拥有一个具体清晰的前景，或制定完成的与共产主义制度共存（coexistence）的概念。它允许自己被微末枝节的事件所激起，拖进非本质的冲突当中，它自身经常是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它不熟悉对方和对方的手段。团结工会知道怎样出击而不是怎样一味忍受；知道怎样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却；它有着总体的理念而不仅是一个短期行为的计划。”¹⁷ 于

其中他再度声明团结工会不仅不是要推翻现政权，甚至没有要求取代共产党在造船厂工会中的位置：“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团结工会从来没有想要排除共产党的权力，不想排斥它在国家造船厂中的控制”¹⁸，尽管统治阶层的宣传机构经常把他们说成那样。当团结工会面临官方这样那样的指责时，听听团结工会对官方的“指责”也是很有意思的。“党的宣传机构指责团结工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劳动者联盟；团结工会建议党应该变成一个政党去寻求自己的社会信任，而不是将自己停留在政府和党的官僚主义的劳动联盟。”¹⁹米奇尼克进一步称他们的事业为“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最大的限制就是雅尔塔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格局，这个条约将波兰划作苏联军事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内，简单地说，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级邻国，从而把波兰推进更深的灾难之中。“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²⁰“自我限制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知道不可能打赢一场对苏联的战争，我们的机会依赖于苏联对于占领波兰的恐惧——不要把波兰变成第二个阿富汗。²¹

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个词是“妥协”（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协”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个性化签名。“妥协”的起点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样的，内涵比“自我限制”要来得更加广阔，它是从今天的社会通往明天的社会的接合部：“我的妥协图景其起点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波兰赶走苏联红军。但是它还建立在这样确信的基础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协来面对复杂的现实。”²²在1980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呼吁团结工会应当调整自己的位置，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频繁地使用罢工武器会导向混乱和国家机构的分崩离析，乃至导向谁也不能控制的一种冲突。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social accords）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张形式上的网络。”²³他劝导人们信任政府，在现政府全能的意义被削减之后，还政府以政府的尊严：“政府必须获得信任——不是作为前专制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对手。开诚布公地说吧，如果政府不被团结工会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敌人不是民主的反对派，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没有效率、懒惰和愚蠢。人们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对于电影“1980年的工人”（一部罢工谈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没有一个KOR的出版物中，如此伤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们真挚和诚实的要求。”²⁴

下面这段话，更能够表明米奇尼克的“妥协”立场，不仅是政治上的伦理或策略，而且是对于民族共同命运的高度自觉和强烈责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种妥协，和这个我完全不喜欢的政府妥协。这个政府的政策对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贴膏药对一个断了胳膊的人来说，即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势要求所有人——当权者和我们——严厉地修正我们的想法。有理由提出仅仅适合我们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独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险。而现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喜欢当权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为一个谈判对手来接受。写下这些话对我并非易事。对于他们的了解无法令我抱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新

的逮捕和每日的欺诈使得坦率的对话成为不可能。权威的虚弱通过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偷换形势分析的对象看得出来。党的书记 Stanislaw Kania 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长，明明坐在一张木排上面却要求一只巨大的横渡大洋的飞船。……无论如何，我要求妥协是因为我们在同一张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们也许都会沉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沉没。我相信，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重建秩序。”²⁵，关于“同一张木排”的表述，在 89 年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

当然，妥协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义的。在要求妥协这一点上，米奇尼克不惜调转话筒，向权威发出同样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 年在回答那位美国人约翰·肯尼提出的在波兰新的妥协如何达成时，米奇尼克旗帜鲜明地指出：

“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否进入和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像哥缪尔卡或盖莱克一样被丢掉一边。我看没有别的选择，他也许再拖另一个两三年。波兰民族可以等这么长时间，但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权威们认为他们手中有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盖莱克的例子表明，这不是真实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作出决定：他是作为军事法的颁布者进入历史还是作为新的妥协的联合设计师。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妥协，波兰新的妥协就会要求他放下权力。瓦文萨说过，有些人必须为这个国家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总是为了妥协伸出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不会同意投降主义。我们将继续呼吁妥协以妥协解决问题，但是以全部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呼吁。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走向街头。但如果这是不得已的，我会感到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个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权威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逼上街头，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将做每一件事避免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有这样的感觉，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之成为可能。”²⁶

1992 年米奇尼克同这个雅鲁泽尔斯基有过一个长谈，后者关了他近六年，这场谈话的标题是“我们可以没有怨恨地谈话”，在涉及 1981 年底的军管时，雅鲁泽尔斯基解释那是由于担心苏联军队出兵波兰。他问米奇尼克应该如何来分派责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当权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责，因为他们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拦在所有栅栏的后面；第二，我们也应该受责备，我私下里和库隆说过，我和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那时就可以自由选举，而我则认为当时就可以由共产党和团结工会分别搞两个议院；第三、1991 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因为如果苏联实行军事法，他将得到西方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确和怎样保护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这方面对于波兰实施军事法感到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²⁷因此——米奇尼克接着说——在 89 年圆桌会议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 1980—1981 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意识到现在正是他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得新的妥协成为可能。

1989 年 2—4 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也是 1989 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

一张牌。米奇尼克谈及此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的贡献，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²⁸

四、“我们只有一个波兰”

在回答约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兰传统的特殊成分”时，米奇尼克承认自己“波兰民主传统的孩子。”他提到四个当代波兰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于民主的理解。他们是：作家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 1911——）、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哲学家 Leszek Kolakowski（1927——）和神父 Karol Wojtyla（1920——），“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唯一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之上。”²⁹这个名单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复杂的面貌。这些人都是波兰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波兰与这个世界对话开放的一面，比如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特点；但同时他们都是从深厚波兰文化传统中走出来的，在他们本人及其作品中，回响着传统波兰文化、历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话题，传递着传统波兰人忠诚和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将这些不同的取向结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着全部现代民主、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本民族的命运。那位法国“68年人” Daniel Cohn Bendit 一上来就问他：为什么你在谈到自己时总是让人们记起你是一个波兰人，而我则从来没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联系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同波兰人民，是因为我认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我将会是一个吉普赛人。

作为受欧洲战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在米奇尼克那里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目标，他面对的永远是那些具体的人们。“对我来说，民主涉及到人们的状况和人的权利。”³⁰具体的人们总是千差万别的，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即非纯善，也非纯恶；即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们中间制造对立。1979年他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蛆虫和天使》，详细清算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虫”这个词是在他之前一位波兰作家 Wierzbicki 用的，此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蛆虫”，用讽刺的笔法列举了人们的种种自私和伪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而逃避责任。米奇尼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他那些用 Wierzbicki 的标准看来是“蛆虫”的波兰历史上的伟人，同时也有其高尚行为的一面。那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不仅不适用于波兰历史，尤其不适用于波兰现实。米奇尼克分析了波兰现实中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面临着善和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善者或者恶人。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考虑自己是否更加残暴凶狠还是走向务实和人性化；对于介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人们比如一个教授来说，他是否能写出一份关于法庭审讯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对于反对派活动家来说，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协议上签名而这可以放他去国外。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看似被动消极的人们，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

英雄的人们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们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们决定了 Radom 和 Ursus 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³¹ 对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 Alekander Wat 曾经写道，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³² 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们，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价，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们——他们的反抗的行为对于周围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话将成为不可能。”³³

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对待前共产党人，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米奇尼克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全部结论可以从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中引申出来。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不要因为怨恨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共产党人和其余人们：“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其余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承担者”？”³⁴ 他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们需要谈论和写作过去，我们需要平静地讨论它们。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³⁵ “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波兰”。另一方面，在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人们有权要求伸张正义，有权要求清算过去，要求在善和恶之间划上一条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³⁶ 1992 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维尔的长谈中，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首位。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把他们带向一个“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如何让正义得到实现，而不制造新一轮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对立？

这两位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哈维尔说“所有这些改变的本质，是引进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开始。”³⁷ 米奇尼克说：“许多共产党人在我们周围，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去生活。如果他们犯下了罪行，他们将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惩罚，但如果有的，便不能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³⁸ 这两个国家具体的做法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波兰没有专门针对前共产党人的法律或有关规定，波兰人提出的是“粗线条”政策，旧政权人员是否保留在新政权之内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过去。而捷克则通过了一项“祛除法”(lustration)，对前共产党人是否留在新政权内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五年之内不许进入公共机构。在谈论中，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 Sasha Vondra 指出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文化区别所致。哈维尔认为这两种做法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切断了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将会出现我们稍后谈到的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私

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³⁸实际上，哈维尔对“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评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论的是哈维尔、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权的严重受损害者，事关他们本人这是难题所在。这两位前共产党的囚犯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的——哈维尔先发问“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经验，对于你这样一个多次接受长时间审讯的重罪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碍的人？而历史证明这些人完全错了甚至是罪犯？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涉及个人报复；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宽待迫害他们个人的人，他们个人的尺度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谈到他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所有曾经向当局告发哈维尔而现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单，哈维尔当即把它扔掉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的做法多么毁人。”但是“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有些人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从中解脱。”“对待这种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总的大赦。”³⁹米奇尼克也不无痛苦地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永远不会参加一个老战士组织，它给那些反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的人颁发奖章；第二，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们注定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身上的过失，但是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而人们有权要求正义。”⁴⁰

前面提到过米奇尼克曾经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怨恨”的长谈。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种种宽容的做法被质疑为：“是不是胜利者对于被打败的人表示的宽宏大量？”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的共产主义者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⁴¹他还说“许多年以前，保罗二世宣称：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我认真听了他的话。”⁴²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不可能把它分为共产主义或非共产化的不同的行政区。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⁴³米奇尼克认为今天自己主编的报纸 *Gazeta Wyborcza* 正是“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注释：

1、第 1、2 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Republicanism Democracy, “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 :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Blackwell,1998, p52、p55。

2、第 3 及“动荡起伏的生涯“这一部分所用材料均来自“Anti-authoritarian Revolt: A conversation with Daneil Cohn-Bendit ”见“Letters from Freedom ,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98, p29——67。

3、第 4、5、7、8、11、17、18、19、20、23、24、25、31、32、33 见“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 ”, Adam Michnik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85, p142、p144、p144、p145、p148、p29、p30、p34、p92、p115、p115、p116、p189、p184、p190、

4、第 6、9、10、12 转引自 Jonathan Schell 为《狱中书简》所作的序言，同上书 pxxiv、pxxviii、pxxix、pxxi。

5、第 13,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不同的民族在为争取民主作斗争时, 所使用的语言或资源可能是很不一样的。一位 1959 年出身的捷克哲学家 Martin Matustis 在一篇“通向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访谈中说起, 1991 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良心先于存在”, 而美国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这套语言对捷克却是适用的。

6、第 14、15、16、21、22、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1、42、43 见“Letters from Freedom ,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98, p65、p59、p105、p62、p110、p112、p279、p280、p105、p115、p297、p295、p233、p233、p226、p230、p231、p294、p295、p295。

我投票反对瓦文萨

亚当·米奇尼克
(1990)

译者按：1989年9月12日，马佐维耶茨基在波兰议会发表施政演说。这之后，波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举措。1989年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1990年1月16日，波兰政府通过政党法草案，为多党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90年7月6日，政府进行改组，政府4名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入阁部长中有3人被解除职务，他们是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运输和海洋经济部长维隆德克。雅鲁泽尔斯基答应于1991年春提前进行大选，并意欲推荐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统候选人。

团结工会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公开化，以瓦文萨为首的一派，和以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另一派，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政治多元化、议会民主和联合执政的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1990年5月12日，拥护瓦文萨的一派发表《中间派协议宣言》，正式声明支持瓦文萨竞选总统；1990年7月16日，拥护马佐维耶茨基的一派成立新党“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这些标志着团结工会在组织上的分裂。这都应该看作是完全正常的。引用米奇尼克曾经说过的：他们是在“为了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与此前社会不同在于，解决分歧的方式，不是运用暴力，而是通过充分的公开讨论、协商以及投票。

米奇尼克主任主编的《选举日报》，本是于1989年5月8日作为团结工会的机关报，为配合首次大选而诞生的。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后，这张报纸因公开批评瓦文萨，被瓦文萨剥夺了使用团结工会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公开表达了他对于瓦文萨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忧虑。一位深具个人魅力的工人领袖、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为民主的斗士，并不必然知晓民主政治的规则、程序，甚至表现出对于它们的严重缺乏；在为民主的斗争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放在民主社会之内，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简言之，即很有可能导向新的专制。个人魅力会成为招致灭亡的诱因。

“瓦文萨也有可能会在竞选中胜出，但即便是如此，他也不会是民主波兰的总统。”米奇尼克认为。不徇私情，公开揭露公众生活可能面临的危险，是米奇尼克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责任感和无私精神的高度体现。

这是一个严格的个人反思。

我之所以觉得有义务将它公开，是因为有人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最近几个月里，我感觉到了这些人的焦虑，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的休戚相关。

我最主要是感到困窘。同团结工会分裂是一个丑闻。本应是公开的关于标志的讨论，被代之以暗地里的讽刺与争斗。

关于团结工会标志的争执是一个缩影，它反映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关于我们波兰公共生活的形式，我们应当采纳的政治文化的方式，以及我们国家的未来。基本原则而非细枝末节是争执所在，而团结工会的分裂变成不可避免的。这个始于对团结工会标志使用权的占有，止于将联合组织变成瓦文萨选举的宣传工具的过程，让人禁不住要为之感到痛苦。

团结工会的标志对于那些在过去十年里忠于团结工会的人，对于那些感到与之难舍难分的人来说，有着巨大的情感价值。这些人曾把它印刷在地下出版的小册子上，涂写在城市的墙上，并在街头游行中高喊着这个词。一些团结工会的徽章还被防暴警察和秘密警察从西装的翻领和羊毛衫的衣襟上扯掉，但佩戴它们的人们仍旧保持着他们对于那些熟悉的词语的忠诚，置迫害和坐牢于不顾。对他们来说，它标志着对一个更好的、民主、独立、公正的波兰的期望与信任。

这一标志现在已经被许多团结工会的成员们变成了一个敲诈的工具，一个审查员的图章。从现在开始，所有那些把这一标志刊登在他们报头上的编辑将会知道什么样的文章不可以发表。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为我的同僚们决定将“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这句口号从《选举日报》报头上去掉而感到安心。我感到与那些把代表着自由和希望的标志变成一个代表机会主义的标志、当作压制人民的一个工具的人们，没有共同之处。

对我们的指控究竟是什么？在团结工会的民族委员会提案里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我们批评莱赫·瓦文萨。

我没有见过所有投票赞同决议的人，但我为他们而感到遗憾。迟早，心灵和精神上的贫瘠会表现出它的肤浅。我同时要向瓦文萨表示祝贺，因为他为了进入总统府而进行的奋斗中能获得这样的支持者。他得到了他想要的。

在华沙炼钢厂的竞选中，瓦文萨回答了一个关于在今天批评他的报纸的前途问题：“让他们把这样的报纸办得更加繁荣，”他说，“然后你将会当选并将它们接管。”不久这一言论被瓦文萨的新闻发言人解释成：“是的，民主将会接管它们。新的政治力量将会在选举后浮现，他们需要自己的新闻和媒体，这使他们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建立新的，或者他们从在政治上被击败的政权手中接管那些已存在的”。

我从没想到过瓦文萨和他的发言人能讲出这样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思维方式的简洁定义。

我总是公开地对瓦文萨的政治才能表示钦佩。我由衷地尊重在艰难的军管时期他所采取的策略。作为一名瓦文萨的合作者，我赞同这个持抵抗立场又合乎常理的策略。他的政策既谨慎又不乏勇气。并且，除此之外，它还很有效，并且通过一种非凡的直觉而得到改善。

可自那时起我们的道路就产生了分歧，现在，我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仍愿意相信，一次关于思想的争辩要比彼此间进行暗讽，更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之间。如果让曾经的友谊变成恶毒的仇恨，那真是糟透了。

莱赫·瓦文萨，我今日的政治对手，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家。我相信如果你能给你的对手以相当的尊重，你将永远也不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重。

我欣赏瓦文萨的某些方面，我欣赏他幽默，我钦佩他的直觉和政治洞察力，并且我承认他在我们同共产主义秩序的斗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眼看着一个团结工会的主席，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浪费着波兰唯一的机会，正在破坏他自己所想象的，以及在世界眼中的波兰的美好的前景，这令我沮丧。看着瓦文萨如何从波兰民主政治的象征一步步演变成如今的荒诞形象，这令我痛心。因为批评了瓦文萨而剥夺了《选举日报》对团结工会标志的使用权，这个决定仅仅是一个最初的表征，它向我们预示着，当那些人最终获取了权力之后，波兰的民主政治将会如何，这也是瓦文萨本人对于民主概念的一个扼要概括。

瓦文萨想当总统，我并不因为这样的野心而责备他。然而令我担忧的是，他想要作一个“使用斧头”的总统，靠法令来统治，并且把民主视作一个司机驾驶

自己的一部车那样。“我们现在正在改变这个制度，我们需要一个带着斧子的总统：一个坚决、强悍、简单的人，一个不兜圈子的人。”这就是瓦文萨的话，而比他说的话更令我担忧的是，他把团结工会当作是一个用以满足他自己野心的工具。在他宣布由他要求的义务的、公开的选举中，他可以获得 80% 以上票数时的信心，他以街头暴动为由进行的恐吓，以及他总是不断谈论他自己而从不提及他的计划。总而言之，令我担忧的是：瓦文萨将为了进入总统府而不择手段。

作为团结工会的主席，他在这个严峻的时期，并没有为工会联盟提供任何的计划。关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工会的角色或活动，关于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途径，以及关于如何处理失业问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没有从瓦文萨那里听到一个词。

代之而来的，是我们被告知团结工会必须分裂。最终，瓦文萨使它分裂了。他摆脱了所有有能力够反对他、阻挡他前进的人们。为了搬走他们，他公开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他认为这样对他有所帮助。

我能够理解瓦文萨的动机。他的野心尚未被满足。他两次拒绝了竞选更高的政治地位，他既不愿参与国会议员，也不打算成为总理。在我看来，他始终被一种动机所驱使：关于自身公共形象的一种幻觉。瓦文萨的政治概念是要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无责任的绝对权力。总统这一概念，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统治，并将责任延顺至总理、内阁以及其它的政府精英那里。

这样的概念是多么令人咋舌：瓦文萨从来就是一个无视条例和计划的魅力型领袖。他表现得仿佛他根本就不懂得民主政治的规章制度。在 1980 年 8 月，他无视这些规章是理所当然的。之后，在军管时期，瓦文萨坚决认为他根本就没必要了解那些程序。也许正是这样的决断，以及他的个人魅力。使瓦文萨在那一时期成了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什么叫做个人魅力？魅力是一种控制人的情感的能力。在情感上的从属以及对于领袖特殊能力、天赋的认同，在领袖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普通人们对领袖的盲信导致了他的顺从。在普通人看来，领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最好。领袖的权力是无节制、无规定的，他个人的条件与能力都不再重要，法律也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魅力的领袖随意作出的决定。

这样的领袖会在政治力量被摧毁的时代浮现。因为这种时代要么缺乏希望要么忽然涌现希望。

他就是群体梦想和对新神话之渴望的最后成果。他也许是个先知，一个受欢迎的领袖，或是一个街头煽动者，他是公正的、不可征服的领袖神话之缩影。他激发倾慕与崇拜。

有魅力的权威与最具革命性的历史进程相关：它帮助人们战胜恐惧与冷漠，摧毁传统秩序，推翻旧政府，无论它是君主制的还是由外国占领的。而一旦胜利，这样的权威就变得专横跋扈反对民主，它高居于民众之上。它诞生于群体性的对自由、有尊严的生命的渴望，却导向新的专制。相信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不可战胜成了臣民的责任。领袖和他的团体要求按照自愿服从的行为来体现这种信任，而拒绝表现出这一点，就会被判以重罪，被认为是极大的不忠。

而当有魅力的权威开始衰弱，这样的被赋予“神的荣耀”的领袖终于被证实无法创造奇迹之时，对民众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们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领袖失去了他的魅力但却掌握了警察力量。他的同党，那些根据忠诚与否而不是根据职业品格筛选出的人，将会毫不犹豫的运用暴力来维护权力，革命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程式：从克伦威尔到列宁再到霍梅尼。

一旦人们不再信任其超自然的力量，不再盲从，有魅力领袖的神话便分崩离析。这样的革命史给予我们一个教训，觉醒越早，一个民族挽回其自由与稳定秩序的机会越大。

一个胜利的有魅力领袖对其权力与声望的关注是病态的。他既多疑又敏感地去发掘身边的敌人与阴谋。为了摆脱对手——即存在于民主机制内的通常的竞争者——他会向个人及全体承诺任何事。他会不顾及政治程序：他本人就是他的程序。他总是谈论自己，他的功绩、他的骄人成就，概括性地极不充分地描述他的计划。他承诺速度：让每一个人都更快地进步。

莱赫·瓦文萨不会是一个民主波兰的总统。

他可能会在总统竞选中落选。从他浮夸的言词可以判断出，这位团结工会的主席实在没有什么可提供给我们的。抛开他个人和他大量的自相矛盾的许诺不说，他所承诺的“公平分配波兰的资产”与“加速私有化”该怎样统一？或者，立刻解决失业问题和起动市场机制的需求何以能够一致？还有他所许诺的向个人布施上百万的兹罗提能否真正实现？

瓦文萨也有可能会在竞选中胜出，但即便是如此，他也不会是民主波兰的总统。而且，他将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制造混乱并导致波兰被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因素。瓦文萨说：

我不赞赏传统的总统观念，无论是法国的、意大利的、还是美国式的。我有我自己的考虑。我要让所有人惊讶。我的模式不是先喝餐酒再吃晚餐，我的是一个“飞行的荷兰人”，他走遍这个国家的各处并在任何需要他的地方出现。到处都会有瓦文萨，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到恐慌的原因。

如果瓦文萨打算保持他的“国父”形象，他有可能会赢得总统竞选。一个父亲可以随意喝酒并痛打妻子，他的儿子却不可以发出喊叫或者举起手反对他。如果这样的神话使波兰的心智麻痹，瓦文萨将会胜利。他将会胜利，尽管他公开宣称他只是在攫取权力时需要将民主当作工具使用。我恐怕他一旦攫取到它，民主所能保留的，将只是他自己的法令。

瓦文萨的功劳与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对公众感觉极为敏感并有着政治游戏的极大天赋。成千上万的人将他的名字同共产主义的终结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位天才的政治家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有魅力的领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魅力只会招致灭亡。

那些使瓦文萨得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团结工会运动领袖的品格，同时也使他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民主国家的领袖。瓦文萨是无法预知的，是不负责任的、不称职的。同时他也没有能力担负改革的重任。

瓦文萨的不可预知对于同共产主义斗争而言是一种财富，但它会给一个现代国度的民主结构带来灾难。他的不负责任是当他持反对立场时和进行地下斗争中产生的：如果你不能对这个国度行使权力，那你当然不必对它负责。

瓦文萨不能从他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他深深地相信他从未犯错。

最后，瓦文萨对经济及对外政治的观点，因其荒谬而显得既无力又可怕。这不仅仅是对波兰人来说，一些见过他的外国人也这样认为。

对波兰和世界而言，莱赫·瓦文萨一度是一个神话。美国国会对于团结工会领袖的夸赞如今于我仍声声在耳。瓦文萨在国会的演讲，关于波兰错误地对待自由，那是一段精彩的、鼓舞人心的言词。而在最近几个月，他用自己的表现亲自摧毁了这个神话。

一个领袖的人格是他自己的事情。莱赫·瓦文萨一直是自我中心的，而我们已经习惯了它。可是现在，情况已完全变了。

瓦文萨认为凡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也同样会对波兰有好处，曾经，我同意他的看法，也曾经，它或许真是如此。但一切都已不再。瓦文萨的总统野心已经给波兰带来了巨大的灾害。他在公开辩论中引入了一种新的、野蛮的言辞：

这是一个丑行！这样的政府将会遭到审判，就在落笔时，我仍在这样说：它将被审判，因为它销毁文件，因为它让共产主义者们安逸舒适，因为它劫掠波兰——它必须立即被起诉，就在此刻，因为它已不称职。

这样的言辞对某些人来说自有其吸引力。所有那些想要破坏的人，那些为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人，那些贪恋权力的人，皆在此列。瓦文萨为他的批评选择了一种恩主式的、目空一切的口吻。他承诺给他们“华沙将会焕然一新”。他承诺他将成为真正的拿破仑事业的出发点。他已经开始分送内阁及其它政府部门的职位。承诺，承诺，给每一个符合他野心的人——这难道还不是瓦文萨的“个人革命”的真正意义吗？

瓦文萨——我这样说基于一个亲近的个人了解——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或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对他而言民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都是愚蠢的教条，然而，通过宣讲关于“学究”无用，通过根据种族标准将人们分成犹太的和非犹太的。他以反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和反犹太的憎恶感，吸引了他的追随者。这些人将会在此时支持瓦文萨出任总统。

瓦文萨说，“我是纯粹的波兰人，我生在这里。”用这样的话，他暗指着其它的一些波兰人是“不纯粹的”是“出生在异地的”。

在批评一些关于华沙新闻界的令他不愉快的观点时，瓦文萨说，“某些人的手伸得太长了”这样难以抑制的、暗讽的语气，难道我们不是似曾相识吗？

波兰并不是唯一引发争论的问题。波兰是我们见过的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发展得最为深入的。民主制度没能稳固地扎根，经济形式严峻，巨大的渴望已经被激起，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这稳定是脆弱的。

从极权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是史无前例的，因而这苦痛也是无前例的。巨大的期望导致了巨大的破坏。一些人并不明白，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行为在新的工作标准、新的价值观念以及亏损企业破产等方面，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应的作为它自身组成部分的结果。在破除带有共产主义时代特征及反共立场特征的标准和思想的同时，并没有迅速产生出相应的有代表性的适合民主制度的思想。世界变得晦暗而虚弱。这就使得这一时代成了一个理想的容易被“煽动”的时代。有闯劲的攻击政府式的煽动可能会成功，但它一定导致不稳定，不稳定继而引发混乱，混乱则导致贫瘠与新的极权统治。

没错，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将会面临这样的局面。所有的，无论俄国还是捷克，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种种昨日的亡灵于今都苏醒了：某些运动混合了民粹主义、排外心态、个人崇拜以及由共济会和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之幻像的。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这样的方向正在孳生着巨大的危机。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民主制：民主制的胜利是建立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智利基础之上的。并且，看起来，这也是在经过塔·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之后波兰民主得以胜利的基础。看起来，所有的主要政治力量——甚至相互批评的——都联合起来拥护一个符合民族理想的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的时代，将随着内阁与总统竞选而告终，它将成为一个让步与协调的时代。它的存在对于政治、经济改革以及新的对外政策而言是一个前提和一个条件。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瓦文萨分裂了团结工会阵营并宣称“战斗至上”，这扰乱了波兰内部的协调，一场主要的讨论被嘈杂浮夸的选举运动所取代。现在，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选择：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波兰？

对于后共产主义欧洲，来自西欧和美国的评论家们已经采取了一个静观的态度。最初的兴高采烈已退回到了关切。这些国家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们真的会回归欧洲吗？或是回到有着民粹极权、种族纷争以及长久的不稳定的旧世界？因瓦文萨的言论而给波兰带来的伤害，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不稳定的国家，被持续的冲突所撕裂。

我想——我并且对西方的记者这样讲——这样的情景是错误的、过于简单化的。这样一小部分嘈杂的激进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波兰的现状。然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仅仅重复说，波兰人天性宽容，是一场国际性卑鄙诽谤的受害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大声去说关于这个病态的、边缘性群体，我们必须反对民粹主义、独裁政治及排外心态的种种症候。因为正是它们在制造着恐慌。

我们要追随怎样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当代民主标准的欧洲道路，还是相反，去选择一条回到已逝传统的，通向极权政体、民族斗争的地狱以及极端的宗教排异的道路？波兰在欧洲的位置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我为何要写这篇文章，我想了很多。我必须假定，我将会被误解并且会被当作出于最卑劣的动机。

然而，我感到，我必须不再沉默。读者也许会指责我错了，但我必须确保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我经过真诚思考后所相信的。这样，我要说，瓦文萨的总统任期对波兰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它也许会成为中欧第一个庇隆式总统时代，只有在美丽的三角旗的碎片中——它是因为团结工会领袖对权力的绝对渴求而牺牲掉的——残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如果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警告，我会觉得我是在为了自己舒服参与了一个被大肆宣扬的谎言。

我并不打算将瓦文萨的行为归为有恶意的愿望，然而我谴责他，谴责他严重缺乏对于一个由法律治理的民主国家的想象和知识。瓦文萨式的政治行为，在罢工和地下活动时代，曾经是他的力量，而在这个要建立民主秩序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陷阱。曾摧毁极权秩序的行为现在也必将扼杀年轻的民主。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将会以一种惊人的直觉力量，镇压一切自主的反应，直到他打破波兰脆弱的民主为止。

我们必须认真听取今天团结工会的领袖在讲些什么，我们必须听他的威胁与承诺，因为也许在无意之中，莱赫·瓦文萨会清楚地讲出一些比如忽视法律与民主程序、报复他的政治对手、外行的想法、由不称职的人进行统治等等诸如此类的许诺。

我相信电视会多次不加剪切地给每一个人播放瓦文萨的讲话。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当他在总统竞选中投出他的选票时，他选择了什么，那样的话他将不能够再因为缺乏信息而原谅他自己。

作为一个政治家，瓦文萨有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天赋，所以他是危险的。他的伟大功绩将会变成它们自身的对立面，它们将祸害波兰。因此，我不会给瓦文萨投票。

瓦文萨剥夺团结工会的标志是一个象征，一个团结工会已经终结的象征。团结工会曾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我曾认为通过它可以走向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我曾只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波兰的未来将会如何？而在 1980 年 11 月，我曾作出过回答：

一个自治的、宽容的、多彩的波兰，它以基督教的价值和社会公平为基础。一个友好的与邻国相处的波兰；一个波兰，让我们重复一遍，一个能够让步和接受行动上限制、现实的并在合作中忠诚的波兰，但不可能容忍被奴役、不接受精神上的从属的波兰。一个充满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但同时又充满团结原则的波兰。在这里，知识分子保护受迫害的工人，而工人罢工为了文化上的自由。一个波兰，用哀婉、嘲弄的语气表述它自己：一次次地被侵占但从未屈从，被一次次击败但从未被征服的波兰。一个波兰，它已经重获它的身份、它的语言、它的面孔……

我曾经相信团结工会——尽管它内部存在分歧——能够在所有那些普遍的、基本的东西名义之下保持联合。可现在我觉得失败。

团结工会已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瓦文萨应当为它的结束负责。我将继续作为团结工会的一员直至我生命的终结。但那陪伴了我十年的标志我已经放置在我个人收藏之中，紧挨着法庭审判文件以及我在狱中写的书。我不打算掩饰我的伤痛。我不愿，也从未想过，以一个现在代表着权力与权威的标志来支撑我自己。当它会招致法庭审判时，我佩戴它，但我真的不想在它许诺以特权时再佩戴它。我感到这像是一个审判的时刻——现在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了——不存在一个象征性标志。

灰色是美丽的

亚当·米奇尼克
(1996)

译者按：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 Ira Katznelson 的《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给亚当·米奇尼克的书信》(1996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而写。该书获得当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迈克·汉瑞廷奖，和普林斯顿大学莱昂耐尔·特里林奖。

一

来自中欧的人们喜欢讲笑话。在很多年内，笑话给人们提供避难所。人们在被监禁和苏联统治下，于笑话的世界中，也能发出大笑。

从前，有两个到了不惑之年的人在一起打网球。结果球掉进了草丛中。在找球的过程中，一个人看见了一只青蛙。那青蛙对他发出一种人类的声音：“我是一只美丽的公主；被一个恶作剧的巫师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要嫁给你，你将成为一个王子，我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打球者把这青蛙放进了他的口袋，继续打球。过了一会儿，青蛙又开口对他说：“先生，你把我忘记了？我是那个美丽的公主，变成了青蛙。如果你吻我，我将重新变为一个公主。我们将结婚，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而这回青蛙听到了回答：“亲爱的青蛙小姐，我完全相信你所说的。但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宁愿选择一只会说话的青蛙而不是一个新的妻子。”

这只青蛙就是中欧，正在敲开 NATO 和欧盟的大门。NATO 还没有想好他们是否要吻这只青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是想要一只会说话的青蛙呢，还是一位新的妻子。

二

让我们跳过关于中欧边界界定的争论，来回忆匈牙利作家康诺德ⁱ所说的：“这就是生活在中欧的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换句话说，这种多民族的组合——曾经被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奥特曼帝国所征服的地方，过去并且现在仍然是冲突和不稳定的一个根源。今天，中欧的人们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对他们来说，事情将会变得怎样？

十多年前，通过艺术家、哲学家和作家们的作品，中欧被人们想象成一个精神自由、充满着差异和宽容的地方。米兰·昆德拉创造了这个地方，用来对抗苏联统治这个事实。在盎格鲁—萨克逊表述为“苏联阵营国家”的这个地方，中欧被想象成一个民族平等、文化斑斓、由不同的语言、宗教、传统和特性所培育的家园。

这并不是无稽之谈，也不纯然是虚假的想象。米兰·昆德拉，还有哈维尔、康诺德和其他人，有充分证据向世界表明这个地区的文化遗产，这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互相杂糅在一起。同样，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多元化社会理念的实现——一个小型的多民族的欧洲——在较小的空间之内实现最大差异。这些作家们还有一个关于精神—政治策略的聪明观点：在面对其邻国的帝国胃口时，明显地弱小和无权的这些民族，正在从无权变为有权。这样，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

地方：众多小民族、曾经被征服和压服、世世代代受奴役，如今正在将自己转变为一块富饶的土壤，而在这里也曾经诞生了罗伯特·缪塞、弗兰茨·卡夫卡、汤姆斯·马萨里克、卡尔·恰佩克、密支显维克、康拉德、辛格、爱因斯坦、科尔莱扎、塔他卡、米沃什、塞尔弗特、卡内蒂和莱维纳斯、尤奈斯库和卢卡奇。

这些小民族的王牌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帝国的性格，因而造成了自由和宽容的天然同盟。二十年来和数世纪遭受压迫的环境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其特点是忠诚、自我嘲讽、执拗地坚持价值和有勇气相信罗曼蒂克的理想。在这里，民族的和公民的良心不是通过国家机构，而是作为人类契约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容易发展出公民社会的理念。这个地区最大的文化差异将会是——和通常是一以自我保存作为反对种族或意识形态权力的最好武器。

“东欧”，巴别尔·托鲁泽克于 1987 年写道：“已经有它自己的王国，它出现在它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精神的领域，但是也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今天，后雅尔塔一代的东欧人并不需要崇拜西方而能够去做——它赋予欧洲以新的命名。”

这是共产主义倒台以来七年的景象么？

三

共产主义像一部冷冻机。在一个充满激情、价值的冲突而形形色色的世界之上，盖上一层厚厚的冰。解冻的过程是逐步展开的，于是我们先看到美丽的花朵，很快立刻腐烂。先是柏林墙和平倒塌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而后则是 92 到 93 年之间，德国仇外浪潮的爆发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解。先是 1989 年令人难忘的“民族的秋天”，自由返回中欧，中欧返回历史。但是返回的不仅是自由和宽容，同时还有仇恨和不宽容，包括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不宽容。冲突——对于把这片土地仅仅看作苏联阵营的人们来说很难理解——重新返回生活。但是，这些冲突是原本就有的。它们被理解为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曾经经历了对民族权利的模糊晦涩，如今走向主权的经验：一个民族的权利通常对另一个民族的权利构成威胁，这会导致种族清洗。19 世纪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格里尔帕策ⁱⁱ 曾经富有预言地警告过“从人道主义经由民族主义到达兽行”的道路。

四

亲爱的 Ira：

我猜想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些关于中欧民主想法的闲谈也许显得有点古怪。这种想法处于双重考验之中：被囚禁的考验和自由的考验。因而某些听起来显得语焉不详，而另外则是陈词滥调。然而对我来说，这些想法来自一种共同的激励：关于自由和民主秩序的充满激情的向往。

民主并不等同于自由。民主是写成法律条文的自由。自由如果不是由法律和传统加以限制，便是一条通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自由的道路开始于 1968 年。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学生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抗体制。在柏克莱、巴黎和西欧的那些造反学生与出现在华沙和布拉格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命名么？粗粗一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秩序，而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为争取由资产阶级民主所担保的自由而斗争。更有甚者，柏克莱和巴黎的学生迷醉于共产主义前景，迷醉于毛泽东的革命修辞学，而这些东西对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存在着共同的纽带：反权威的精神，一种解放感，相

信“去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意味着不可能”。造反的要求根植于相信“只要世界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该死在自己的床上”。“现在这个样子的世界”意味着一个不公正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1968年的造反，根植于对于正义的要求：通向自由和面包、真理和权力的需要。造反中有精彩的将人提升的东西，他们不只转变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也存在一些可怕的东西于其中：对于大学、图书馆的摧残破坏，以粗暴无礼的口号代替理性的思考，还有——暴力、恐怖主义、政治上的谋杀。所有这些都属于1968年的遗产。

当时我们都以社会主义者和左派人士自居。而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惯用语会引起我内心深深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认同任何宏伟的意识形态？我相信，在这里存在着和我的美国朋友之间许多争论的根源。但是很有可能，这种争论更多地有关语言而非理念。我曾经问哈贝马斯：“在六十年代倾向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信仰中，我们留下来什么？”他的回答是：“激进民主。”因为这个概念接近我，我将试图以我的方式解释它。

五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有着强劲的对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人们可以讨论二十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与这两个乌托邦之间的联系，可以讨论布尔什维克是否乞灵于社会主义理想，抑或社会主义理想是否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精神方面和政治上的论据。人们也可以尝试探讨法西斯主义是否运用了保守派的反自由的论辩，是否运用了回到前工业价值世界的保守派梦想，或者保守派是否视法西斯主义为使得自身免遭毁灭的救赎之途。但是无疑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尽管我们可能在保守派中发现反法西斯的反对派，也可能在社会主义者中发现最坚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这两种反自由乌托邦的顶峰变成了极权主义制度。我在其中的一个生活了四十年，但是我学会了对两者都不信任。

六

为什么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宁愿变成一个较小的、受约束的少数派，而不愿加入更多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极权主义专制的世界？

当然，我们反对共产主义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它是一个谎言，而我们要寻找真相；共产主义意味着遵守一致，我们要求真实；共产主义意味着奴化、恐怖和审查制度，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是对传统和民族特性的持续攻击，而我们

想坚持自身传统和民族特性；共产主义是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我们相信平等和公正；共产主义搞一种荒唐的匮乏的经济，而我们寻求理性的、有效的和富裕的道路；共产主义是对宗教的迫害，而我们视良心自由为一项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反对共产主义的这些理由，对一个保守派、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自由派也是同样适用的。以这种方式，一个特殊的联盟的理念出现了，这就是克拉科夫斯基在他著名的文章《如何当一个保守派—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而这个联盟随着共产主义一起崩塌。但是在崩塌之前，这个联盟用一种特殊的道德绝对主义的语调作为其公开论辩中的标记。

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对派要求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邪恶，是邪恶帝国。是我们时代的恶魔，因而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自然是某种善良、崇高和美丽的行为。民主的反对派在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将自身天使化。我知道自己此刻说的什么意思，因为这种道德绝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并不为这样的经验感到愧疚，也不需要对此愧疚。抵抗极权主义专制世界是去冒险，甚至是去牺牲，不只是个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人们不得不相信：“人类生活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正如一位共产主义时期的教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天你都必须在可能付出的代价面前做出选择。这些决定并不是学院式争论的结果，其道德行动通常要付出坐牢的代价，或者毁灭事业。对于活跃的持异议者来说，这种形势创造了一种气氛，更适合严酷和要求价值判断。他们认同人道的价值(humanistic values)但却生活在英雄的价值(heroic values)之中，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忠诚于一个人自身的特性：忠诚于来自民主的反对派的朋友，忠诚于教会和传统。鲍格丹·采维斯基写道：“弱小的一边，总是处于围攻之中。”多年来为捍卫绝对价值而反抗的最突出的见证有索尔任尼琴、哈维尔和赫伯特。赫伯特写道：“让嘲笑成为你的姐妹永不离弃你，永不屈服于告密者刽子手懦夫——他们会赢的 iii。”

而最后赢得社会的是我们。但是对于这些道德绝对主义者来说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也是一件苦恼的事情，哪怕只出现一瞬间。

七

对于反对专制的个人和团体来说，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在极权专制的废墟上建立民主程序来说，却是一种弱小的力量。在这里，不再存在一个正义的、融洽的和完美的乌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绝对主义的位置。这两者都变成了过时的或者虚伪的，两者都对民主秩序构成威胁。因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极权主义必然性世界（当然幸运的是它也非完善）崩塌之后来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败的和虚弱的）。

这个世界不仅迫使反极权的联盟崩溃，而且暴露出它们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义者发现自己与自由经济原则相冲突；而保守主义者则挑战自由宽容的精神。社会主义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解决所出现的种种悖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共产党人的过去、市场经济的模式、建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新现实中教会和宗教价值的位置。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在于给予贪婪的市场经济一副人性面孔，保护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从世俗的方面考虑国家的性质，以及宽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条的延续上去，寻求以宗教来覆盖这个国家的政体和制度；它要警告来自自由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的威胁；对于旧体制中的人们，它要求采取一种严厉的对待。

自由主义者会说，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增长、清晰的市场规则、关于税

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货币的稳定制度。它是一个宽容国家理念的谨慎捍卫者——在对待教会、少数民族、邻国和过去，都采取一种谨慎的立场。问题还在于，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都将在一种新的语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民粹主义的、仍然是不可命名的意识形态中展开。其中夹杂少许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和教权主义。这些口号伴随着来自启蒙的意识形态和来自道德绝对主义的激烈批评。与此同时，怀旧情绪也出现了——这令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惊讶。怀念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安全保险，正如有人说的：“国家假装给人们付钱，人们假装在干活。”

人们必须知道这个上下文，才能去理解新近后共产主义民主的悖论。涉及到共产主义的过去，分成了正义的代言人与和解的代言人两派的争论。前者要求对有罪的党员进行按部就班的惩罚，而后者则在未来挑战的民意之下提出民族和解的进程。两者都采取了一种夸张的形式；前者尽可能要求对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成员进行甄别，后者的行为好像他们忘掉了专制制度甚至存在过。我的态度是：“大赦，好吧；遗忘，不可能。”结果这种态度对民主的反对派来说是很困难的。

争论起于采取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形式。在这场争论中，社会主义和保守派都批评自由派的转型政策。失业、社会悬殊、雇员的失落，所有这些都延缓了改革进程。争论也发生在国家的形式方面——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个公民国家？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刚刚从长时期的奴役中重获独立。

保守派党人强调要求重建若干年被官方“去民族化”所破坏掉的种族的连接；持公民立场的人竭力保护基本的民主信念，反对不宽容的沙文主义的侵犯。而教会，经过若干年压抑之后重新回到公共争论中来。在一个共同体中，民族特性通常伴随着宗教特性，因而存在着一个理所当然的诱惑，赋予新生的国家以宗教特性。教会呼吁一个伴随着宗教道德规范的政体，及其处罚法规。争论还在于对于堕胎的处罚，这个古典的争论关系到这个国家基本的价值观。认为堕胎是可以接受的人，是否意味着谋杀尚未出生的孩子？视堕胎为有罪，是否构成妇女有权决定自己怀孕的基本权利的侵犯？而每一种争论都伴随着一种十分激烈的情绪，并始终诉诸于某种道德争论，战争宣传的语言也用上了。两个相反价值的世界互相对抗：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通常渗透着旧体制中人民的腐败和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保守派价值的，那些长时期处于爱国主义世界中的人们，在近些年中着力于反对共产主义。而此时，反对压迫的前英雄们显示了他们的第二幅面孔：不宽容、狂热和抵制新的现代化的观念。这就是后共产主义民主世界中依次出现的事件。

八

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协商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因为激进运动——不管是在黑色还是红色的旗号之下——都乐于利用民主的进程和机构来扼杀它。实际上民主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只有相当艰巨才能建立起来。其品质和爱好最好被认为是——在通往红色或者黑色的激进观点压力之下所丧失的那些东西。民主并不是那么一贯正确的，因而其争论的各方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令自身被操纵，并且在反对腐败时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选择平庸而不是出类拔萃，选择机灵而不是崇高，选择空洞的许诺而不是真正的胜任。民主是各种

不同利益之间持续的衔接，是各种利益之间孜孜不倦地寻求妥协，是各种激情、情绪、仇恨和希望的市场，是永远的不完善，是罪人、圣徒和猴子把戏的大杂烩。这就是为什么寻求道德国家和完美社会的人们不喜欢民主。

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相比之下不管是红色专制还是黑色专制都毁灭了人的创造能力；它们消灭了人类生活的爱好趣味，最终也杀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九

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们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及意识形态如何。今天古典的意识形态立场，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税收、医疗改革或保险方面不能主宰公共争论。但是争论的每一方都存在一种需要——社会主义的对于最贫困者关怀、保守主义对于传统的保护和自由主义对于效率和增长的思考，其中每一种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们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样性；正是它们给我们准备了选择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的互相矛盾使得我们能够承受自相矛盾、实验、改变观点和更换政府所付出的代价。

不同的原教旨主义者谴责民主的道德相对主义，好像国家应该成为善的保护者。但是不，我们是灰色民主的保护者，并没有授予国家这种权力。我们希望人类的美德由人类良心来保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灰色是美丽的。

这就是一只来自中欧的青蛙所讲述的。

注释：

i Gyorgy Knorad, 1933——，匈牙利社会学家、小说家和随笔作家，曾经参加过1956年匈牙利起义，当过编辑，在文学研究机构供职多年。1973年因写政治文章失掉工作后，经常在国外访问，获得多项国际奖项。除了小说外，重要的著作有《反政治》、《看不见的声音》。

ii Grillparzer, 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作品以德国古典主义和丰富的抒情性相结合，主要剧作有历史剧《国王奥托卡的胜衰》、爱情悲剧《海涛和爱浪》等。——译者注

iii 该句诗来自赫伯特的诗集《柯思多先生》中《柯思多先生的献辞》一首，译诗来自唐浩先生。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

——亚当·米奇尼克接受《Polityka》杂志编辑访谈录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译者的话：后共产主义的波兰社会，在结束了从思想到制度等各个层面的“大一统”状态之后，出现了多元纷争的也是泥沙俱下的局面。肯定有些事情不是当年的推动者们所希望出现的。

一切都在转型，人们在尝试寻找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报纸也不例外。米奇尼克们给他们这份波兰阅读量最大的报纸规定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称之为“新的语言”在于，它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

什么是波兰的“现代化”？什么是波兰的“欧化”？想要“重返欧洲”这个表述背后到底想说什么？对于新生的独立的波兰来说，是不是一定要把欧洲的垃圾也吸纳进来、奉为时髦？抑或相反，听任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的大爆发？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波兰既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又取得自身的民族认同？如何既从波兰的文化传统出发、而又能够剔除其中不合时宜的、狭隘的部分、跨越她的局限？

标题为“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决定了该文涉及大量深邃、复杂的波兰历史、文化（宗教）及现实背景知识，不管是译起来还是读起来，都会有些吃力。译者不揣学识浅陋，敬请朋友不吝赐教。总的来说，那些未能译出的人名、政党或社会组织名称应该不影响整体的阅读和理解。

编辑：亚当，从现在起十年之内，你想做什么？

亚当·米奇尼克：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我和我朋友圈子的特色，我们从来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试图计划自己的生活。十年前，我在监狱里。如果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许给出一个荒谬的回答。再往前算，我在波兹南完成我的学业，它因为 1968 年的事件而中断，后来我给 Slonimski 当秘书。对四年之后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能想象，遑论十年。

编辑：我们来谈谈你的公共生活。你是否希望仍然当一名编辑，还是一名政治家或者作家？

米奇尼克：如果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我介乎 Gazeta Wyborcza（波兰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1992 年米奇尼克在辞掉国会议员之后，担任主编至今，译者注）的编辑和一名作家之间。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 Sejm（波兰共和国一立法机构，译者注）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

当我说，我们的报纸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不认为是在抬高自己。对我们来说，这张报纸不仅是一张报纸，而且还是波兰公民社会、波兰民主的一种手段。

编辑：你是怎么给这张报纸的价值体系加以定位？

米奇尼克：我在我们的新年献词中谈到有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对于民粹主义有着强烈的厌恶，同时坚持关注贫困和不公正。第二是对待教会的态度。我们强烈反对我们称之为（诉诸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的福音派化……

编辑：这是为什么大主教称你为一个“杂种”的原因？

米奇尼克：这对我无所谓。Heirich Boll 和 Gunter Grass 经常被称之为“doberman pinchers”（德国种的短毛猎犬），我也忝列其中。第三是我们对于去共产主义化的态度。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同于许多可以称之为去共产主义化者所采取的那种敌意的和冒犯的态度。我们不提倡集体的大赦，但是我们也不主张盲目的仇恨。第四点，我们对有关民族尊严的事务十分关注。我们并不试图补偿因为羞辱他人而造成的怨愤。

编辑：在你的列表上，并没有包括波兰的现代化或者“欧洲化”，这很有意思。

米奇尼克：这是你们杂志 Polityka 的特色。在某个意义上，现代化已经包括在第四点当中。但是现代化自身却是一个陈词滥调，每个人都喜欢现代化。1989 年，我对自己说，让我们回归欧洲。很快，我便意识到那是一个标语口号。我们必须精确地定义我们正在谈论的价值体系。欧洲并不是一个价值。称之为价值的是我们能够为欧洲做些什么。而我们能够贡献什么呢？

编辑：当我们谈到欧洲时，我们真的认为一个波兰人正在准备对外来者打开大门？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危险。一个是，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你都发现这种偏狭、地方性和仇外综合症；波兰也不例外。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不久前担任在格丁尼亚举行的波兰电影节的评委，一周之内看了 32 部影片。我不得不说，当我看到从欧洲来到我们这里的残羹剩饭，仅仅是一些垃圾而外什么也不是，我感到很震惊。我强烈反对我们的主教们对波兰文化中腐败和色情发出的咆哮和诅咒。但是当我看了这 32 部影片，我意识到，主教们没有捏造这种色情。在我们的意识中真的有东西正在生病。色情被当作发声最响亮的时髦。在每部影片中，不管是男主人公说什么，女主人公必须脱衣服和光着胸脯走来走去，因为否则就不是电影。这种对妇女的态度是凌辱，她们变成了交媾的工具。对我来讲，这是虚无主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避欧洲化的口号；我们必须准确地找出，我们通过这个词想说的那种东西。

编辑：欧洲化涉及比性商品店和奔驰汽车更多的东西。它同时意味着一个启蒙的法治文化、理性教育，以及许多新的争论：女权主义、环境等等。在你们报纸的纲领中，有贯穿一致的东西吗？

米奇尼克：当然，我想是这样。欧洲也不仅仅意味着性商品店。但是模仿欧洲和美国的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影片和思想中有这种模仿。在我们报纸的纲领中，贯穿始终的是持续质询什么是民主的目标和性质。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我们便会发现民主正在经受着来自三方面的攻击：民粹主义、种族狂热和宗教原教旨主义。

编辑：在民主的三种威胁中，你最少担心宗教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我宁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在这个纷扰的现代世界，人们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家园，将自己根植于某件看上去持久和不变的东西。因此，（需要）回归某个民族，回归某个社会团体，和回归某种宗教。这是所有原教旨主义的基础——在波兰也许称之为“一体主义”更为恰当——它涉及到试图将国

家建立在宗教的规范之上，试图以一种地方性意识形态教条、波兰的天主教教条，来取代多元化和宽容的哲学。一体主义是宗教的一种形式但它本身不是宗教。我想一体主义是一种演变为政治工具的宗教形式，并在一种民粹主义时髦中得到阐述。民粹主义同时在波兰的天主教和反教权主义中得到体现。

编辑：如此，那么谁来保卫民主？以什么方式？如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闹到大街上，会出现足够智慧的响亮声音吗？

米奇尼克：我宁愿举一个可能容易得到核实的例子来说明。我不知道当民主处于危险之中时，谁来保卫它。但是我知道那些买报纸的人。语词拥有它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语词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们所呼吸于其中的智性氛围和精神气氛。我们每个人选择适合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出于很多原因，生活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宁愿选择我们的报纸而不是 Nowy Świat 或者 Słowo Powszechnne，宁愿选择你们的杂志而不是 lad。我不想低估这种选择的意义。我意识到，民粹主义在和印刷文字没有关系的人们中最容易找到土壤。

编辑：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看法。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贫乏表明，他们并不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在二十世纪，右派不再拥有自己精神上的启蒙者。今天的民族主义当中，不能找到一个有如（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Zbigniew Zaluski 那样的才华，Zaluski 能够给 Moczar 和他的支持者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象征，它们正在衰退而不是兴起。

米奇尼克：现在还看不出来。另一方面，某种情况似乎的确如此。今天波兰的民族主义没有文化上的表达。但是，整个后共产主义纪元不是都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这表明，传统的我们用来描述世界及其冲突的语言已经归于无效，我们正在试图建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新世界图景。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不相信每件事情都被决定了，也不相信还有什么退路可走，比如说后共产主义必须遵循民主的道路。什么语言我们可能描述这些？S·米洛舍维克把自己从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立场可以使他的权力合法化。Gamsakhurdia 提供了另外一个雄辩的例子。一个诗人、囚犯和人权捍卫者，当他进入权力之后……我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例子——我们在那里可以发现相似的情况——表明，后共产主义和一张法西斯的面孔相联系，以及反共产主义和一张布尔什维克的面孔相联系。但是十九世纪造反的语言和自由民主的语言已经不适合描述它们。

编辑：于是你就用自己的、个人化的尺度，来反对你所评估的这些东西？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似乎一个人总是试图表现得比他实际上要好。Kurt Vonnegut 说过，他的小说《母亲的夜晚》中的道德寓意，在开篇首句中即能找到：“我们是我要扮演的某人，所以，对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小心。”也许我正在无效地扮演另外一个什么人。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因为对我来说，最好是扮演成一个普通的、得体的什么人。波兰需要普通的、体面的、明事理的人们，尽管我不能成功地扮演这种人，我想这种人也有某些价值。

编辑：但是年轻一代责备你对前共产主义者太过宽厚，而对于你从前 KOR 的同事，比如 Antoni Macierewicz（一度出任波兰内务部长，1991 年因泄漏国家机密受审，译者注）则太过严厉？

米奇尼克：因为我从前的朋友现在具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Macierewicz？我记得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也是在这个公寓里，讨论站在切·格瓦拉一边

和支持“黑色九月”的恐怖主义行动。我记得他聚集钱来支持 MIR 这个反对 Allende 的左派激进组织；记得他为一份反对尼克松访问波兰的请愿书签名，因为在越南扔下的炸弹。Macierewicz 的思想总是十分激进、专注和粗线条。不管他的头脑被带向何方，他总是从他自己的观念发展出它们的逻辑结论。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但是，我不敢肯定，处于一个内务部长的位置，一个人是否需要这些品质。我承认很容易批评 Antek，但是在他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设想如果我认为必须祛除，我可能会做得比他更加糟糕。感谢上帝，我有别的想法；从一开始，我就认为祛除是不健康的和愚蠢的主意。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虽然语境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 Antek 代表了我生活中的另一个故事；如果我采取了“错误的转向”，他将会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编辑：这就是为什么你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更为宽容的原因？是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那种慷慨大度？

米奇尼克：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人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于其中没有我这样的人的位置。我则经常写道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讨论涉及个人的宽容需要，这并不困难。这并不是什么人道德上的胜利，而是试图对你的敌人宣称宽容。

编辑：这是从圆桌会议就开始了的？

米奇尼克：在圆桌会议上，我对自己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得像战争幸存者一样学会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自己是否必须参加谈判有着巨大的疑虑。反对圆桌会议的人们主要的争议在于现在并不是共产党将要令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是团结工会将要令共产党合法化。但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圆桌会议标志着一种通往民主和平的、渐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雅鲁泽尔斯基起着一个主要的角色。作为总统，他完全忠诚于民主化的进程。我不喜欢前政权人士能够说：

“米奇尼克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们有权时，我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现在米奇尼克的朋友把我们踩在脚下。”你是一只猪，我是一只猪，他是一只猪，全世界是猪圈，正如 Andrzej Oseka 曾经指出的，除了猪圈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对这种东西的反应是，这不真实。存在着我们必须捍卫的某些原则，而不（必）去考虑环境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正在逆流而上。多年之前，教皇宣称我们在要求正义之前必须表现仁慈，我认真地对待他所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这就是我看到的。撇开其他情况，个人的原因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我在牢里时，我给 General

Kiszczak 写过一封傲慢的信，它差不多是这样结尾的：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时，当人们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我希望我能够有勇气前来保护你。

编辑：现在你必须兑现你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对待当下的发展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是不是？它涉及到对过去的评估，包括对于“人民波兰”和更遥远的过去，（要求）透视过去一百年、两百年所发生的历史进程。

米奇尼克：我们深深根植于历史之中。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阶级，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总是自欺欺人地宣布，我们必须和过去割断联系，波兰不可能处于 Pisudski 和 Dmowski 的幽灵之下。这是无稽之谈。我也不相信 Maria Janion 教授所说的，我们到达了一个源自内战的波兰文化中某种“密码”的终结。问题恰恰是历史正以某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强烈影响着波兰。我们正是这样经历着我们自身。我想，除非我们就近检视近两百年来的波兰历史，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波兰现实。我越往深里看，由此出发看我们的问题或现状越觉得吸引人。所有关于“轻骑兵世界的终结”、关于 Count Wielopolski 的世界、关于民族起义的转折、包括华沙起义，都是我们的起源、我们的身份和现代波兰的开端。

编辑：这个视角能否提供一个“人民波兰”更清晰的图景？

米奇尼克：“人民波兰”的历史已经告终。当然，人们可以尝试从一定距离之外去评价它，远离直接的政治语境。这是一个特殊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这种特殊环境中重建波兰。不存在另外一个波兰。很自然，我相信当年的反对派——我曾经所属的——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拥有不同的观点而为了波兰辛辛苦苦奋斗的人们，我发现这是不可理解的，受到最狂热恶毒攻击的是那些曾经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文明、温厚宽容的共产主义的人们。

编辑：你相信历史的公正吗？

米奇尼克：人们为不公正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评估此前四十年的时刻正在到来，这比奥斯威辛或者卡廷远为复杂得多。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请允许我重复：我希望公开争论和反对任何试图弄脏这副图景的人们。我想明确地划分善和恶。但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模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波兰历史有着不同的贡献。依我看，我们不能混淆上个历史阶段善和恶的界限，但是，谁能够宣称他是无罪的？谁能够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担当者？

编辑：你回避直接回答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欧洲化”。你是否相信，多年以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连同它所有的后果，比如德国人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发现我们正处于身边民族主义大爆发当中？

米奇尼克：欧洲的制度整合这是可能的，但是不同的种族分裂主义者的景象也是可能的，比利时和西班牙也许追随捷克斯洛伐克的范例。我在法国时，我谈及赞成 Maastricht（欧洲统一），但我知道在许多争论中，批评这项协议是公平的。当然，我能想象这样一种情形，波兰面对着几百万其他国家人们的涌入，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想象并理解随之激起的敌意的反应。说到底，政治是一种前瞻性的和实施可能的艺术。Goryszewski 部长说——

编辑：他说不想要一个由德国人支配的欧洲。西方欣赏这种论调的是那些决不想让我们加入到欧洲的人们。

米奇尼克：Goryszewski 部长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很多事情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党派、基督教民族联盟在迄今的政府联盟里，表现出是可信的和负有责任的。从长远来看，这个党必须在它狭隘的、地方性的教条逻辑和并入欧洲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当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欧的一块上帝赐福斯拉夫人的飞地，我们的民族利益将会更好地得到实现。但这将要求从我们自身作出努力。

编辑：让我们结束在这个永恒的问题上——知识界及其在波兰的事业。就目前来说，工人对于社会变动将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五十年代那样的情况，共产主义者把工人招进大学。而团结工会也不再鼓励自我教育。教育水准在下降，同样也可以说报纸、电视和教堂布道的水准都在下降。那么谁来保卫——不仅是知识界的精神氛围，而且是知识界的思想水平？谁将与之认同？也许知识界将要退出舞台而让位给暴发户？

米奇尼克：毫无道理。人们将（继续）创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变动，去做有价值的事情，要求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满足。不存在任何人为的机制改变知识界（的作用）。谁将来认同知识界的精神氛围？我，亚当·米奇尼克，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属于这样的一个传统，它可以在这些人的著述中得到体现——泽罗姆斯基（Zeromski, 1864——1925，被波兰人称之为“波兰文学的良心”，主要作品有《无家可归的人们》、《逃避我的姑娘》、《春天之前》。当小说家雷蒙特 1924 年因其长篇小说《农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波兰人纷纷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泽罗姆斯基更有资格担当此荣誉。译者注）、Strug、Brzozowski、Slonimski、Irzykowski、Kotarbinski、Ossowsski 和 Babrowska。他们是一些伟大的榜样，对我来说。请允许我这样说，因为这并不仅仅涉及到我本人。例如，我们的报纸 Gazeta Wyborcza 整个是由知识界所造成。我们试图将团结的价值体系转换成今天的语言。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不需要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大声说出。我们想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把自己隔绝起来，必须寻找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头脑中牢记 Slowacki 所说的：“我恳求你们——活着但不要放弃希望，让智慧的火把在民族当中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需要的话，献出自己生命，前赴后继，死得其所。”基本上，这是我的信条，它比任何意识形态、种族或其他因素更能够说明我是谁。

编辑：在波兰之外有人理解这些吗？

米奇尼克：有，在俄国、匈牙利和在塞尔维亚。我的一个塞尔维亚朋友 Nebojsa Popov 给我一篇文章有一个出色的标题：“鹅能够拯救罗马吗？”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责任、命运，去拯救罗马是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换句话说，用波兰人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们需要再思波兰知识界的本质。

编辑：为什么？

米奇尼克：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包括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信奉一套另外的价值体系。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撞上历史过程中的晦涩暧昧，可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必须知道如何从中摆脱。说到底，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与此相反，ONR 和布尔什维克的氛围是站在权力一边和统治集团一边，是站在一种旨在使得个人屈服其意志的运动一边。没有人像 Judym 医生（泽罗姆斯基另外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为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他喜欢一棵树被劈作两半，他头顶上有明亮的天空内心有道德律令。他有点康德、有点 Konwicki、有点 Brzozowski 和有点 Turowicz。波兰知识界还有一点爱哭。那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为眼泪留

出空间的价值世界当中。为世界悲惨的事情流泪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拥有一席地位，也许我们的眼泪不容易干枯。我们必须遵循我们自身的路径，否则将会迷失。

编辑：但是，正如你的另外一个朋友 Andre Glucksman 所写下的，超越由我们“知识分子大师们”所界定的地平线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是“弑父”的时候吗？

米奇尼克：我并没有与我的“知识分子大师”作斗争的要求。我不想弑杀什么人。在这个国家——正如 Norwid 所说的——因为每一件事情是如此摇晃和脆弱，人们总是在弑杀某个其他人。我赋予这样的眼光以极大的价值：持续性和某种长远考虑——在和过去与未来的双重联系中。

编辑：谢谢你。

（本文译自《自由书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 年）

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

——给乔纳森·席尔

亚当·米奇尼克

译者按：在对于后共产主义的几种原教旨主义形式进行反思时，米奇尼克将来自前团结工会人们可能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危险也纳入其中。那是一种道德主义，混淆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界限。而在反对前制度中培养起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是如此地不适合正在进行的民主社会的建设。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波兰人的历史意识。没有必要解释，对波兰历史的阐述，对我们前进的方向和卷入政治，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对于波兰的老一套，尤其是第二共和国进行冷静地分析。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共和国的整个历史，已经堕落为神化和陈规陋习的牺牲品，从中产生了要么是共产党官方宣传的黑暗传奇，要么是试图保卫他们自身来对抗共产党篡改历史的光明传奇。看来我们需要对过去提出新的质疑。总的来说，我们需要考虑 1922 年，当加布里埃尔·纳鲁图维奇（Gabriel Narutowicz）被谋杀时发生过什么。这个行动过程建立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上？暗杀发生时的氛围是怎样的？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变成波兰历史意识的里程碑？为什么这个事件毫无困难地被遗忘掉？

我们同样需要重新审视当时主要政治力量的行为。我们需要将政治舞台，当作超越了国家和民主的形式一个冲突的竞技场所，来重新检视；提出下列问题：是什么样的扭曲和转折，标志着毕苏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民族民主运动”和波兰社会党的追随者们，他们的反民主的演变？我们同样需要分析内战期间的天主教教会的历史。没有这种再评估，我们注定要美化我们的过去，注定地担负起神化般的历史感而不是清醒的判断，注定无力反抗记忆的复仇，那样的记忆多少年埋没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如果我必须就当下出现的新现象下定义，或多或少地，在当今政治争论当中，存在着原教旨主义重新浮出的危险。原教旨主义确信人拥有一种组织世界的药方，一个摆脱了冲突的世界，而不是处于善恶的冲突之中，例如，处于民主秩序中的各种观点和利益的冲突之中。依我看，我们可以指出三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第一，是民族原教旨主义。存在一种诱惑，让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臣服于民族利益之下。这种利益总是依据一种相当特定的政治观点来加以解释。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好的波兰人有责任和立陶宛的少数波兰人团结一致，而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论他们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前苏联人还是前立陶宛人。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也是波兰人这个简单的原因。任何企图批评立陶宛少数派领袖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波兰的。这种想法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邻居们呈现出一种免于冲突的景象，除了在我们民族利益的“正确的、天主教”的阐释与左翼世界主义虚无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外，再无别的冲突。在这种民族利益的定义结构中，被视作反波兰人而指向反犹太人的倾向，可见于波兰的政治争论，或者在波兰我们对于吉普赛人的集体屠杀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辩论当中。

我在这里提到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运动和教义特征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波

兰，并且在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也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现代社会，这种原教旨主义正重新苏醒，例如在阿拉伯国家；它在以色列和其右边的西欧国家中也被发现。在法国的关于勒庞（Le Pen）及其拥护者的讨论中，或是在德国历史上的关于纳粹主义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注意到对这种原教旨主义复活的担心。因此，它值得被当作一个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波兰的。

第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现象与现今波兰教会寻找自身位置有关，在这种新情况下发现神圣无处不在。这不是新的发现，现代世界的病态之一是神圣的消失，是整个共同体可能吁求的社会共同的神圣价值的消失。这可与铭文相比较，铭文的毁灭象征着我们根植于其中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的崩溃。

对于这种趋势，现在教会已经给出一种确切的回应。我们也许怀疑它是否确实有可能构成一种回应。无论如何，尝试回应已经作出。其中之一是梵蒂冈二世，他倾向于对世界采取开放的态度，承认在教会或者在人们的信仰或文明之外，有可能出现某种可信的价值。而原教旨主义也提供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回应。它倾向于重新模糊神圣和亵渎、自然法和刑法、道德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界限。有关辩论，使得我们面临着最基本的、其意义绝不亚于重返欧洲的辩论。当谈论重返欧洲时，不同的人们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教会僧侣集团的一些代表在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谈论的是重返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欧洲。

第三，今天的波兰存在着第三种原教旨主义。大多数具有这些危险的人们，是那些来自前团结工会的人们，和团结工会的反对派，笔者是其中之一。我头脑中考虑的是这样的做法，模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斗争规则之间的区别。地下斗争可能提升了某种牺牲的价值，因此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每一种政治行为都可以被翻译成道德价值语言。在民主秩序中的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原教旨主义者——让我们称之为道德家——其头脑可能导致很大的混乱。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在政治或标准的政治话语中，不存在道德的位置。很显然地，它有一个位置，然而是很特殊的位置。正如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政党，宗教标准不应该变成法律标准。所以，形成于反共产主义地下政治活动的道德标准——那是摩尼教的典范——不应该自动应用于一种民主当中。它们被证实为对民主和我们自己是致命的。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成目的却并非高贵。

我们应该考虑的另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新现象，然而值得重新审视。例如，值得重新检验庇隆主义（Peronism）的教训。庇隆主义是什么？它所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它所喜欢的步骤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制把它推上权力，又使它离开权力，以及保证其运转的机制是什么？

在波兰，民粹主义是工人起而反抗极权国家的语言，这点必须清楚说明。当然，这是一种以自由和尊严的名义的反抗，但是这些价值观是以民粹主义的语言表现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概念“他们”，是取自民粹主义的话语，而不是取自任何政治或社会利益的分析。可以争议的是，这种反叛基于一种平均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几十年来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以平均价值为名义的反共产主义的造反。它并不是借助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观，尽管社会正义总是其关键概念之一。

现时正在形成的波兰市场并没有容纳社会正义作为其关键理念。市场的角色不是实现正义而是迫使人们有效率和创新。正义可能由于商品的重新分配而得到促进，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无论如何，这种由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团结工会所培育的平均主义，在每个工会的民粹主义话语中可以找到，不管是国家的工

会还是在团结工会当中。比较国家的工会和团结工会在过去这些年所使用的语言，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同样必须告诫自己，在波兰反共产主义的造反，虽如此成功，但是却是群众性的造反。当共产党人仅仅必须面对其精英集团，他们会忽视群众的要求。只要民主法治的程序还是一个问题，他们就会这样做。共产党人拿反对派当一回事，仅仅在于它背后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有群众，共产党人被迫谈判。这种情况提升了这种感情：在群众中，我们是有效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用群众的语言说话。

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今天，似乎我们目击着这种群众语言的回潮，回复到反对共产主义期间获得的行为方式，回复到曾经在一种非理性的制度框架里所使用的某些方式，它们提供了将政治制度非合法化的手段。今天，这种相同的行为方式正在取消议会民主的合法性，和通向独裁主义的大门。我们正在抵达一种没有什么政治文化（能）与之相适应的一种民主秩序，这有点像在一个野蛮人面前放上一部电脑。这并不是说，一个野蛮人不如一个人类成员，在灌木丛中他也许比文明的美国人做得好上一千倍。正如在丛林中很少用到电脑一样。

存在着一种危险，人们将对民主感到失望，这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是一种我们曾经听到过的以不同语言表达的危险，人们说“Sejmocracy”，这是一种 Sanacja 的语言；而当人们说“议会侏儒症”，这是一种共产主义语言，当人们说腐臭的“恶魔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法西斯语言。

存在着一种危险，民主的进程将会伴随着一系列危机——公共生活的无政府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和增长着的不安全感。很有可能，我们将听到日益大声的争论，是时候了结束这种混乱和腐败，即我们需要某人以强有力的手腕来恢复秩序。这样的理念可能被包装成总统角色或者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理念，这样的包装也可能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在 18 世纪，由于无政府主义、争吵等，波兰因此而分崩离析，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情况。换句话来说，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人们当中将会出现某个人来回应这样的危机，这对我们并不陌生。当传统惯例和文化模式破碎，当沟通渠道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一个承载着我们希望的救世主便将现身，出来结束混乱。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仅是波兰的现象，也不是从未经历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它，需要考虑这种催生着威权诱惑及其结果的机制，需要询问什么是威权政府可能解决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将决定波兰知识界的头脑状态——这种状态如同于最坏时代的那种迷失，失去了自身的精神气质，自身的视野和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我们承担这个反思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增加用民主思想来抵制正在谈论的这些原教旨主义的机会。在民主思想中，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的空间，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宗教的或者道德家的。根据民主思想，没有任何人天生具有特权。在民主话语的框架里，威权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如果有人争辩道，因为自然法则或者国家利益，某种事态必须存在；而这种事态也许可以不服从于公民投票，他就侵犯了民主话语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秩序建立在有可能使得任何关乎每个人的事情，采取公民投票。

这也许决定了无论哪一种民粹主义——造反的语言——都将遭遇到适合于议会民主和法治的语言。这也许同样决定了不管哪一种极权的诱惑——对于强腕的崇拜——将遭遇理性的民主，即强有力头脑。

新演进

亚当·米奇尼克
(1976)

译者按：文中提到的、作为重要转折点的 1956 年“波兰十月”和 1968 年“三月事件”，大致情况如下。

1956 年 2 月 14 日—25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给予包括波兰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极大冲击。3 月 12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患肺炎和心肌梗塞去世，党内的权力斗争加剧。群众集会增多，各种报刊纷纷面世。党内外要求恢复哥穆尔卡名誉和职务的呼声很高。(此人 1948 年前担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在 1948 年底与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过程中，因反对照办苏联模式被排斥；1949 年 1 月的“大清洗”中，被免除副总理等职务，后被捕入狱，1954 年 12 月获释。) 1956 年 6 月，发生了“波兹南事件”。6 月 28 日晨，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的一万多名职工，因劳动定额不合理和发放加班工资而举行抗议游行。此时一年一度的国际博览会正好在波兹南召开，街上气氛非常活跃。9 时左右，聚集在广场的人群有 10 万人左右，人们高喊着“提高工资，降低赋税”、“面包、民主、自由”、“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游行队伍最后冲到姆温斯卡大街的监狱，用铁杆撬开牢房，释放了数百名犯人，占领了监狱，夺取了储存的武器。这之后又开往省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大楼守卫人员之间互相射击，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傍晚，两个装甲师开进波兹南。6 月 29 日，秩序逐渐恢复，7 月 1 日波兹南事件结束。在 28 日的冲突中，当场死亡的有 55 人，后在重伤员中死亡的有 19 人，被称之为“黑色星期四”。在事件中被捕的有 600 多人，后来除 3 人被判刑外，其余全部释放。波兰官方对波兹南事件评价不一。哥穆尔卡在 1956 年 10 月 19 日—21 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认为工人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稍前，1956 年 10 月 8 日—17 日，在为准备召开八中全会的连续会议上，哥穆尔卡应邀参加了政治局的会议，表明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全会召开的第一天 10 月 19 日，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突然飞抵华沙，力图阻止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刚下飞机双方就当面吵起来。面对赫鲁晓夫的大声申斥，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回敬道：“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这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哥穆尔卡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把波兰）出卖给任何人。”10 月 20 日全会上，哥穆尔卡的讲话通过电台向全波兰直播，他以惊人的自我克制和不带任何个人恩怨的发言，冷静地分析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种种弊病，包括反对强制化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建议下放管理权限和企业自治、成立工人委员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超产奖励等，赢得了波兰公众的强烈认同。这次全会确定了波兰新的政治路线，被称之为“十月的春天”，也可以说，是由党内高层领导推动的改革政策所能够达到的高峰，是由这个体制所能释放的最大能量。全会之后，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释放了 7000 名政治犯，并调整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

波兰 1968 年“三月事件”和邻国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有关。1968 年 1 月，

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 12 年之久的诺沃提尼被迫下台，杜布切克上台，主张对内改革开放、对外独立自主，一场新的改革正在酝酿之中。1968 年 2 月，杜布切克会面了哥穆尔卡，提议为建立“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合作奋斗，遭到后者的拒绝。这在波兰人民中间引起巨大不满，后来上街游行的学生口号之一是“波兰人民等待自己的杜布切克。”1968 年 1 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 19 世纪伟大的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剧《先人祭》，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情绪，当演员朗诵着激烈的反俄台词时，台下观众反映强烈，全场欢呼雷动。《先人祭》的演出变成了反苏大示威，哥穆尔卡下令禁止演出。2-3 月期间，华沙大学师生联名上书抗议禁演诗剧。3 月 4 日，米奇尼克等一些华沙大学学生被当局开除学籍（1965 年米奇尼克进入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3 月 8 日，大学生们举行抗议并占领了校舍，要求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内务部长米·莫查尔派警察包围了华沙大学。学生被驱散，很多人被捕，包括后来成为重要的反对派人士的雅·库隆（此人曾任波兰共青团总书记）和卡·莫泽莱夫斯基（此人为波兰重要的历史学家）。3 月 8 日在华沙大学的抗议事件，引发了其他地方和学校学生抗议运动，又有不少学生被开除学籍，支持学生的十多名教授和副教授被开除公职。哥穆尔卡此时已经蜕变为反对改革的陈腐老人。1968 年 7 月 14 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最高级会议在华沙召开。这次会议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出了公开信，提出了武装入侵的警告。8 月 20 晚，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国联合部队，出动 20 万军队，向一个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颠覆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权，扼杀了这个国家的改革运动。

亚当·米奇尼克写于 1976 年的这篇文章，一般被认为是波兰独立社会运动的最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在阐发被称之为“新演进”运动的起点之前，米奇尼克先回顾了在此之前波兰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声音：它们是来自党内的“修正主义”和来自教会的“新实证主义”。借用“教会”（世俗权力机构）和“圣经”（意识形态信念）这一对比喻，米奇尼克指出“修正主义”相信“圣经”（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信任教会（现政权）；而“新实证主义”为了争取政府的让步，采取了承认“教会”而不承认其意识形态的做法。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指望“从上面”来解决问题，都倾向于面对权威说话而不是面对公众。其中对修正主义的分析耐人寻味。由于将信任建立在一个开明的、明智的党的领导人身上，当现实情况不如人意时，修正主义者便展开了对于现任领导人的无情尖锐的批判，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走到了“反对派”的路线上。然而仍然存在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在于：不管这种批评多么激烈，但是它们仍然是向着权威进言而不是面对独立的公众（the independent public）。他们改变了的策略——“留在党内”，对于不是党员的一般公众来说，仍然不能起到任何指导作用，不能帮助一个人怎样生活和进行抗争。当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冲突进一步表面化的时候，修正主义者当中的一些人并不困难地采取了和政府相一致的立场。（哈维尔曾经将这种修正主义者称之为“改革的共产党人。”）

“新演进”认为，在新的社会冲突面前，这种修正主义的、党内改革的思路已经失去了活力。新形势要求必须发展出一套面对公众而不是面对当权者的表述；告诉人们每一个人自己该怎么做，而不是对当权者说如何改进他们本身。与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不同在于，“新演进”信任“来自下面的压力”，而不是来自领导层的明智；信任“独立的公众”，而不是政府机构中的开明派；信任社会

的自我组织，信任由这样的组织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与政府之间进行平行的商谈妥协，而不是屈从强力或流血牺牲。与捷克的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相匹配，波兰的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提出“生活在尊严中”；而为此进行的漫长艰苦的斗争，米奇尼克表述为并不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而是“为了更好的今天”。

我们称作“波兰十月”（1956年）的历史事件，是共产主义可能发生演变的一个希望之源。这个希望立足于两种图景、两种不同的演变的概念。我将它们称之为“修正主义”（revisionist）和“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t）。

修正主义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党内观点之上。它从来没有提出一种政治纲领。它提出权力制度可以更人性化和民主化。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条（应该）有能力吸纳当代艺术和社会科学。修正主义意欲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框架之内采取行动。它们意欲将教条主义和这个党朝向民主化改革和常识的方向转变。在很长的时间内，修正主义者寻求让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人掌握权力。瓦蒂斯瓦夫·别尼科夫斯基是这个团体最典型的代表，他将这些观念表述为开明的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

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马，第二种演变的主要阐释者，称自己的方向为“新实证主义”。在这种图景中，世纪之交由罗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民族民主党的精神之父和政治领袖）所选择的策略，运用到今天的历史和政治形势中来。斯托马将自己视作一名天主教徒，认可天主教作为波兰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持久的组成部分。作为天主教 Znak 教派的领袖，他想要重复民族民主阵营的领袖及意识形态策略，像德莫夫斯基所做的那样，后者在 1906 年加入沙皇杜马。斯托马和他的伙伴在 1957 年 1 月加入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议会(Sejm)。围绕着斯托马的天主教活跃分子团体，同意他对于地缘政治学形势的分析，这些人的目标在于在适当的时机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引导波兰民族。对于德莫夫斯基来说，这个时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斯托马来说，这个时刻或许是苏联阵营的解体。

从 1956 年到 1959 年，斯托马的理念得到了教区主教的支持，也赢得了哥穆尔卡统治集团对于天主教会的让步。一句话，新实证主义将波兰效忠于苏联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修正主义则相反，它们倾向于反苏联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像在匈牙利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可以运用一个隐喻式的比较，即将苏联国家组织比作教会而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教条比作圣经，那么修正主义在忠诚于圣经的同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表述；而新实证主义则追随教会，同时希望这教会或早或迟会消失。

这两种理解同样相信改变来自上面。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都指望由党来推动的积极演变，由聪明的领导人的明智政策来造成新的局面，而不是持续不断的公众压力。他们都指望共产党王子的开明思路，而不是独立的机构获得对于权力的控制。大多数人也许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假设，不管是新实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都没有能够采取公众行动，尽管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采纳这种假设会不可避免地遭致政治和思想的失败。不管是“教会”的修正主义批评家还是“圣经”原则的新实证主义对手，结果都归于失败。

修正主义倾向在其消极面的另一侧，肯定有其积极的特色。人们会记住修正主义时代的精神果实，也会记住由修正主义所激发的知识界重要团体的行动。

精神果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回忆得出由这些人所写的那些杰出的书——克拉科夫斯基、奥斯卡·朗格、爱德华·利皮尼斯基、玛丽亚·希尔朔维奇、沃泽米耶·布鲁斯、克日什托夫·鲍米安、布劳尼斯瓦夫·巴奇科和维托尔德·库拉。就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修正主义还在卡兹米耶日·布兰迪斯、亚当·瓦泽克、

维克托·沃罗希尔斯基和亚策克·鲍亨尼斯基的著作中得到呈现。所有这些著作，不管其科学或艺术价值如何，都将那些在官方宣传中受到损害的真实和人道主义的理念加以传播。每一本这样的著作出版，迅速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除了积极影响波兰的学术和文化，修正主义还在人们中间激发政治运动。由于反对消极和国内流放，修正主义将基础放在公民生活的独立参与方面。相信一个人有能力对社会的命运施加影响，对政治活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前提。对修正主义来说，这个信任建立在这个党可以改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信任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然而从 1956 年到 1968 年的公民活动和公开的反对游行来看，是有其真实的和积极的结果。大多数后来的反对派这个期间都在这些圈子中活动，而在老牌的反共产主义者之中。正是这些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知识界创造了和传播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在波兰最困难的现实中帮助恢复了公众生活。

修正主义在其源头上不可救药在于相信党的机构中的“自由派”这一翼，认为其追求和目标与修正主义知识界是相一致的。我认为修正主义最大的过失并不在于他们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失败（在那里他们不可能赢），而在于这种失败的性质。它是个人从其权力和影响位置上的消失，而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左派和民主政治的平台受到阻遏。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创造这样一个平台。

1968 年 3 月事件是修正主义的终点。在这个月内修正主义知识界与党之间的脐带断了。1968 年 3 月之后，人们便不再认为在党的领袖中，存在着进步、民主的一翼。只有极少数人抱有这种政治希望，瓦蒂斯瓦夫·别尼科夫斯基是其中一位。尽管他的提议普遍被认为是保护色而非真正的理性。在别尼科夫斯基的著作中，他创造了一种完全是新的政治活动的模式。他提出“留在党内”，是修正主义不成文的法律。别尼科夫斯基给予陈旧模式以新的基础。基于幻想存在一个明智的党的领导层，修正主义转变为无情和无休止地批判现存领导人。一方面，他清晰地传播了对权威的敌意，清晰地传播了反对派的要领；而另一方面，他的要领不是向公众提出的而仍然是面向权威。别尼科夫斯基的那些不是党员的读者从他的书中，不可能学到如何生活，如何行动，为了未来的民主改变应该做什么。

也是在 1968 年，修正主义寿终正寝的这年，游行的学生喊出“全波兰都在等待自己的杜布切克”。一段时期内，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领袖成为希望的象征。对这些非同寻常的日子来说，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的神话在波兰扮演者一个重要角色，神话的意义远非简单。它为激进的乐观主义和最忧郁的悲观主义都给出了合理解释，对屈从者的态度和英雄姿态都提出了一种辩护。为什么？

1956 年 10 月，在苏联干涉波兰之际，出了一个民族英雄哥穆尔卡，此人由此步上政治舞台，在其后 14 年内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他的例子透露了党的领袖神话在本质上的含混歧义。这就有理由相信，即使不存在武装干涉，党内的进步一翼和党外反对派 KAN(club of the Non-party Engages movement)之间的激烈和公开的冲突，也要浮出水面。预言未来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多一个“杜布切克”，多一份对于风起云涌的反对派的一个损害。

“好”的党的领袖神话，必然是含混歧义的。很多加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人，以下列方式为自己的行为做辩解：“这是我可能服务于波兰民主事业的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有效地支持波兰一旦出现的杜布切克。”照此说来，服务于民主的事业变成了等同于服务于极权的权力。那些没有入党并宣称自己是彻底反共的人也运用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来为自己回避所有反对派的决定做辩护。这些称反对派为“政治麻烦制造者”。这些人视捷克斯洛伐克为这样的

例证：“这里没有可以改变。”对我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意味着改变是可能的，同时存在着自身限制。捷克斯洛伐克是极权的基础显示其脆弱的一个例子，也是处于威胁之下一个国家绝望和无根基的体现。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是——演进有其限制，然而是可能的。

新实证主义的经验也必须就近检视。无疑，他们的行动对于创造一种独立的公共舆论和传播完全不同于党的官方宣传，有着积极的影响。

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1956年Znak运动的起点是地缘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它是从1944年华沙起义的悲剧中得到的教训——遏制在波兰人中间可能存在的、易受感染的造反情绪。由于返回到求助于哥穆尔卡新的党的领导层，Znak运动接受了权威方面富有意味的让步。好几个天主教知识界俱乐部得以成立，

ydronik Powszechny 和 Znak月刊、Znak出版社得以复活。Znak运动获得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提出自身的民族文化的构想。当然，不应过高估计波兰精神生活吸收当代基督教思想的重要性。同样也不应过高估计这样一些人著作的影响——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汉娜·马莱夫斯卡、耶日·图罗维奇、耶日·扎维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马、安东尼·高乌别夫或者亚策克·沃日尼亚科夫斯基。因为这些著作在波兰有着一个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远远独立于官方的那些教条框框。因为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在波兰国民议会所做的发言，年轻的波兰人得以熟悉一种政治多元化的代用品。从一开始，Znak就命中注定地在“社会主义陛下”面前，完成一种现实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天主教的反对派角色。

波兰天主教的Wiez团体制造了一个不同的壁龛，将修正主义的希望和Znak的新实证主义政治策略结合起来。塔杜施·马佐维耶斯基、安娜·莫拉夫斯卡和其它在Wiez上面发表文章的作者们所拥有的革新的观念，造成了杂志编辑和教区主教的冲突；但是这些观念造成了与世俗知识界对话的可能。听起来是如此充满悖论，Wiez团体使得左倾知识分子改变了传统的对待基督教和教会的看法。

Znak和Wiez对哥穆尔卡的支持限于具体的政治目标——拓展公民自由的版图。这个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例如释放被关押的波兰主教，收回对于教会的行政干扰，宗教组织的合法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Znak运动将其活动与权威的政策结合起来，尽管是克制和富有尊严的。像很多修正主义者一样，天主教的政治家更相信来自上面的让步而不是来自下面组织起来的压力。它们寻求协调而不是冲突，他们关心秩序、关心与党的一致，努力避免将他们当作反对派的责难。

Znak的领导人从来没有犯修正主义所犯的那种基本错误。相反，他们总是强调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不同，从而激发了一种批判意识，成为天主教新实证主义所采取的行为路线。

一种调和的政策只有在双方都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对共产党的权力来说，其政治词汇中根本缺乏调和（conciliation）这个词，这样一种政策仅仅在有地位的人实施时才有意义。否则，调和便转变为投降，调和的政策转变为通向政治自我歼灭的一次进军。这就是Znak团体所经历的。

.....

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包含了对于1957年到1964年政治上二难处境的两种基本回应，这是一个社会正常化和政治上的融解时期，是物质增长时期和公民自由相对拓展的时期。这两者都反映了政治平和与社会心理稳定的某种气氛。

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当社会冲突变得越发真实，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

义的脆弱便浮现了。1968年3月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1976年6月的工人爆发，都将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带入终结。在与真实的社会进程的冲突中，这两种从历史哲学中得出的抽象公式和从这些公式得出的策略方案，都暴露了其无用。在公众和权威之间的冲突，暴露了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所抱希望的空洞性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必须做出戏剧性选择的形势当中。当发生公开的冲突时，一个人必须公开自己的位置，宣称他自己属于某一方——是属于挨打者还是打人者。在公开冲突的地方，顽固的修正主义者和顽固的新实证主义者都不可避免地同当权者取得联合，采取当权者的立场。而支持罢工工人、支持集会的学生或抗议的知识分子，则挑战了修正主义的党内策略和新实证主义的妥协政策。社会的团结一致瓦解了这两者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接受政府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19世纪左派运动的难题——“改良还是革命”并不是波兰反对派的难题。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只要苏联的政治结构不改变，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去策划密谋行动是危险的。鉴于缺乏一种真实的政治文化或民主生活的水准，一种地下存在仅仅会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和无从改变。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

在我看来，持续不断地为改革而斗争、寻求拓展公民自由和人权而开展的演进，是东欧的持异议者所承担的事业。波兰的例子表明，真正的让步在于构成对于政府逐步加强的公众压力。与我们大陆的另一端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人们会说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理念更加接近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这就是建立在逐步和片断的改变之上，而不是运用暴力和强力推翻现存制度。

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和政治的存在，决定了这种演进可能所受的限制，决定了有时候未必能够得到改变。反抗的要求始终被苏联军事干预和大街上的苏联坦克这类幽灵纠缠得精疲力竭。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记忆使得许多人们相信，苏联领导人不会允许任何改变。但是仔细审视一下，事情似乎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哥穆尔卡是在1956年对苏联问题做出富有技巧性的界定而大受欢迎。每一个胜任的党的领导人通过聪明地玩弄恐惧和玩弄公众对于安全的要求，才可能赢得服从和忠诚。米·莫查尔试图说得非常得体，而弗兰奇谢克·什拉霍奇采则利用华沙的这样一个短语来吁求公众的同情：“波兰—苏联的友谊应该像好茶——强烈、浓郁，但不是太甜。”这两个政治家（和安全官员）都想寻求更多的支持来获取权力，尽管不是很成功，苏联的问题变成宣传广告中的一个惹眼的舞台。

当分析波兰—苏联关系的局面时，必须首先注意到苏联政治领导层、波兰政治领导层和波兰民主的反对派之间，在利益上有着基本的共存。对这三个部分来说，苏联武装干预波兰是一场政治灾难。对波兰领导层来说，这样一场干预，预示着他们从一个三千四百万人口的民族领袖的位置上被赶下台，或者削减他们的权力。然而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当然会记得他们干涉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国际反应，同样还有1971年12月和1976年6月解决波兰工人问题所引起的反应。如果我们把波兰人传统的反俄情结考虑在内，还有他们斗争到最后一刻的绝望（如在1944年华沙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苏联的胜利无异于选择一场与波兰的战争。这将是一场波兰在战场上失败、苏联在政治上失败的战争。苏联的胜利对于波兰来说，意味着一场民族大屠杀，对苏联来说意味着一场政治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苏联领导人，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竭力想避免这样一场冲突。这种举棋不定描绘出了这个地区可能的政治

策略：利益上的结盟决定了这个地区可能的妥协。

我并不是想争辩说，苏联入侵波兰完全不可能。我相信，如果莫斯科和华沙的权威作为一方，而波兰的公众作为另一方；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的。反对派必须知道，波兰的改变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至少第一步是如此。

修正主义和新实证主义也相信演变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参数之内进行谋划。——不同在于，今天偏离了这套表述的反对派其演进的纲领，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这样一套方案必须告诉人们怎样去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

“新演进”信任工人阶级的权力，信任工人阶级坚定不移的立场，同时也相信它拥有不只一个迫使政府采取深思熟虑让步的理由。很难预见工人阶级的发展前景，但是无疑当权者小集团最恐惧这种社会团体。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是这种演进通往民主的公众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种演进并非容易。它要求持续不断地克服恐惧和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延缓这个过程的因素包括缺乏真正的工人阶级机构和缺乏政治抗争的模式及传统。当一个独立的工人自卫组织的建立，当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船厂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工人阶级觉悟的一个新舞台也随之出现。很难说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另外一个更加持久性的机构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他们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工人委员会是否遵循西班牙模式、还是走向独立的劳动联盟、抑或社会互助的道路？但是，一旦这些机构浮现，新演进就不再是停留于头脑中的构想了。

在波兰局势中，天主教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大多数波兰人觉得教会具有亲近感，许多牧师有着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波兰主教管区的新演进方案需要仔细分析。这种演进很容易在官方的教会文件中得到观察。反对自 1945 年以来所有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教会僧侣集团，其特殊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已经演变为一种更为宽广的反极权主义姿态。在反对“唯一的无神论上帝”的同时，他们已经在采用“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在写给教会教友的信中，波兰的主教们捍卫真实的权利，支持人的自由和尊严。更重要的，他们始终在捍卫工人阶级的公民自由，尤其是罢工和独立的劳动联盟的权利。

始终站在反对官方压力、捍卫基督教原则同时也在捍卫《人权宣言》原则的天主教会，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要求打破常规、实现尊严的人们之间一个交汇点。因为它成为寻求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人们其勇气的一个关键来源。

新演进的目标是逐步的和缓慢的改进，它并不要求牺牲和伤亡。但是这并不是说改进的运动总是温和的。这项运动部分地由工人和学生的群众运动所组成——这在未来也将继续。这种行动通常在掌权的小集团之内引起非议。那么我们要问：党内及其领导层是否还有能力采纳一个改革的方案？在这个党内是否还会出现修正主义？民主的反对派是否能够在党这个排外的小圈子内发现一个同盟？

50 年代出现的修正主义是党内复苏运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现象。很难想象，现在有一个运动仍然将采用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原则，或者其中一些元素，来推进今天的波兰改革。因为这种教条已经成了没有生命的东西，一种空洞的姿态，一种官方的仪式。它不再能够刺激讨论和点燃热情，它不可能引起内在的张力和分歧。

尽管这样，我相信党内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在成千上百的党员中，有人对辩

证唯物主义毫无兴趣，对他们来说，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仅仅是参与波兰公众生活的一个先决条件。他们当中也的确有人是强权政治、实用主义和经济改革的信徒。他们的政治信仰和决定受着公众舆论和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地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利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与赞同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结局不可能事先预见。

党的实用主义者应当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能成为民主的反对派的一个伙伴，他们可能达成一个政治上的妥协。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盟友。我认为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民主的反对派不去区分党的机构之内不同取向，这也许会导致无视现实，变成狂热的最高纲领派，误入政治上冒险主义的歧途。如果是将自己的目标等同于党内实用主义的一翼，可能使得我们重复修正主义的错误，建立虚幻的联盟和失掉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个性。民主的反对派不应该对“明智的”党的领导人抱有过分的希望，或者屈服于这种争论——“不要对现今领导人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换一个上来将更坏。”民主的反对派必须提出自己的目标，只有通过自己手上的这些目标，而达成政治上的妥协。例如，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政府宣布它要和造反的工人“商量商量”，而不是组织一场流血事件。民主的反对派不要以为这是（政府）真正的让步，（“但是他们没有开枪”），也不要以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幻想。相反，民主的反对派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公共生活中出现，必须通过组织群众的行动来创造政治现实，必须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否则一切都是幻想。

知识界的责任是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更确切地说，我希望这些知识分子能够续上二十世纪之初“不服从”的知识界的传统。这个传统中的著作者有斯坦尼斯瓦夫·伯佐佐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亚尼斯基、斯蒂凡·热罗姆斯基和佐菲亚·娜乌科夫斯卡。我感到自己和这个传统中的人们是心心相印的，尽管我也许是过高地估计这个传统的最后一人。但是，这些声音尽管是微弱的和零星分散的，但无论如何是真实、真诚的：以其打破常规和反对派的思考，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公众舆论。这项事业被后来不同的传统和社会阶层所继承：前修正主义（包括这个圈子里的作家）、前实证主义和1968年以后变得觉悟起来的人们。

年轻一代所采取的思想方向——同样也是波兰和其它东欧国家政治改变的流向——要建立在知识分子团体和工人阶级活动的交汇点上。当自由的出版和独立的组织不存在，这些团体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比在其他任何时期都显得重大。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责任，反对派分子必须放弃物质利益和官方的评价，这样波兰人民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真相。在寻求真理的活动中，或者用克拉科夫斯基的话来说“生活在尊严中”，反对派的知识分子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每一个挑战的行为都将帮助我们建立起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它不仅仅是一个宪政结构，而是真正的、日益改进的一个自由人们的共同体。

说明：“译者按”中关于当时历史情况的描述，参见《东欧剧变的根源和历史教训》，刘祖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5年12月。下同。

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访谈雅鲁泽尔斯基

亚当·米奇尼克

(1991)

译者按：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1923年7月6日出生于卢布林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5月志愿参加在苏联创建的波兰武装部队，经历了解放波兰、直抵柏林的所有战斗。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之后，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历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1981年2月12日被议会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10月18日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2月13日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时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该委员会于1983年7月21日自行解散。1985年11月6日在九届议会首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6年12月在同记者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口号，试图使“多元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88年8月27日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分两阶段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上主张“工会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并同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导致“圆桌会议”的召开（1989年2月4日——1989年4月5日）和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1989年4月17日）。1989年6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但雅鲁泽尔斯基于同年7月19日按照“圆桌会议”协议精神由议会众参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以50%以上的得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1990年9月19日致函议会议长科扎凯维奇，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按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以防止社会动乱”，10月1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获胜后于12月11日在电台、电视台发表离职的告别演说。

1981年实行军管法之后，米奇尼克曾经是雅鲁泽尔斯基政权长达5年多的囚徒。两个昔日的对手今天终于坐在一起。

这场谈话中伊始，米奇尼克首先承认自己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认识，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化，即对于军管法的认识。谈话主要集中在这一话题进行——是不是实施军管法是不可避免的？

雅鲁泽尔斯基的解释是，从总体上来说，是防止进一步扩大的事态，从而引得苏联军队前来干涉，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拯救波兰的唯一途径；而选择在那个时刻，是为了度过那个艰难的冬天，在这之前，因为苏联和东德制造的麻烦，使得波兰没有足够的煤。保证苏联的坦克不出现在华沙的街道上，这同样是米奇尼克们所要遵循的界限；而事实是，俄国干涉的威胁始终总是存在的，在那个时刻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如果当局“只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只想用自己手中抓住的牌挡住对方的要求，便不具有举行一场平等的、敞开的对话的诚意。从根本上，这个政权首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自我保存。所以，不惜一切手段回到原来的状态，是它一贯逻辑的必然结果。

但是米奇尼克同时也坦诚地表达：如果谈判破裂，他们这一方同样具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圆桌会议期间，米奇尼克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米奇尼克对于雅鲁泽尔斯基说，“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而雅鲁泽尔斯基最终仍然以“两种恶中较小一种”来为自己开脱。

雅鲁泽尔斯基：我到达共产主义走过一个如此曲折的道路。在一种深刻的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培养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然而你，出生于共产主义家庭，但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怎么发生的？顺便地说，我忍不住要指出，你的父亲也许比你更加生错了时代。但他选择共产主义时，他是冒着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危险；和你一样，面临着牢狱之灾，但是他没有你指望的社会支持，也没有教会和西方社会的支持。

你是否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国会的见面？我希望你也就此谈谈。

米奇尼克：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更让我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我绝对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掌权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这种确信主宰了我当时的政治理想。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我记得和团结工会的同事们讨论时，有人对我说：“当涉及到雅鲁泽尔斯基时，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和盛怒。”盖莱梅克 i 经常争辩说，你不想以实施军管法的人进入历史，于是你必须有所作为。我认为他是错的。还有，我不可能站在军队一边；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 1989 年春天，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里的確是很担心的。我看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来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阅读他的演讲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确形象的。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公共形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我对于历史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相似的传记，但是无可与之匹敌。一个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年轻人战争期间却身处俄国，以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然后又突然进入部队服务。并不具有天生的政治倾向，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家。接着，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他要任命拉可夫斯基为代理总理，这个人在党内并不受欢迎。更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军政治部主任，他控制着 Zolnierz Wolnosci (“自由战士”，波兰一老战士组织），这是一块彻头彻尾的可鄙的招牌。他被认为是清教徒式的和孤僻的。他经常借助于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经常伴以这种短语作为佐料：“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将要抵制”。我现在所有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我将他视作主要是和武装部队首脑有关的政治家。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是新鲜的。再者，我不能理解这种局势，我所能做的只有猜测。我后来得出结论，人们必须相信这位将军所说的一切。如果说，他不想放弃权力，我也要认真对待。而无疑，雅鲁泽尔斯基不可能着手与团结工会恢复友好关系。

1984 年，有一个朋友前来对我说，“我刚刚会见了一个雅鲁泽尔斯基身边的人，他问起你有没有指名道姓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 ii，而这正是比耶乌什科神父被劫持和被谋杀的时期。我立刻出现在 BBC、《世界报》和《德国镜报》上面，从未有过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因为我视他们为必须移走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

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对时，在 1989 年克拉科夫的纪念五月事件的群众集会上，

我把它大声说了出来。我对那些稍早时候前往苏联大使馆投掷汽水瓶的学生说，我改变了对于雅鲁泽尔斯基的看法。接着我在电视上和报纸上也这样说。

所以，和你正在谈话的这个人，曾经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也是极端地反对雅鲁泽尔斯基的。有一件事情除外，即对于军管法的估价。1983年我写道：“也许有一天真相大白，这些以黑墨水写在波兰历史上的人，最终是从苏联入侵手中拯救波兰的人。”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坏人设法去战场盗尸时，他忽然发现一条金链子，他把这个身体拖了出来，他救出了该书中一个英雄的生命。于是，我写道：“1981年的波兰，存在着真正入侵的危险，存在着军事政变的危险。波兰必须反对来自入侵和党内保守派的暴动，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集团拯救了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品德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知道当俄国人到来时，会把他们一脚踢开”。

至于我个人的历史，即是非典型的又是典型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母亲战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父亲也是，父亲来自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

雅鲁泽尔斯基：他在牢里呆过吗？

米奇尼克：呆了八年。他是1934年Luck审判的主要被告。这次审判的臭名昭著是因为对被关押着施行了酷刑。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不及我父亲，我在牢里呆了六年，最严重的是两次有拳头落在我的脸上。

人们通常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而我不。因为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制度。因为是我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批评政府，因为这是我的政府，而如果它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可以批评它。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波兰有人对政府拥有坏的看法只是不这样去说。我的勇气来自缺乏想象力。

1965年第一次蹲监狱时，我18岁。说那时候存在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的社会支持，纯粹是虚构的英雄故事。我们被认为是（需要）回避与之接近的偏离常规的疯子。人们说我们如果不是一些内奸的代理人，便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愚蠢的人，但是我们却在发动一个过程，其尽头是镇压和紧缩。

雅鲁泽尔斯基：我被称作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你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联系波兰当时的情况，它们不是空洞的标签。

米奇尼克：真的？1968年，反德国的歇斯底里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当时塔·马佐维耶茨基在德国报纸上做了一个非常拘谨的谈话，引起了一片喧嚣，甚至连他的朋友也在问他为什么要对德国人说这些。而我呢，没有人认真对待“帝国主义代理人”这样的东西，但是德国争论具有一种冲击……

请允许我们不要神话教会的作用。反对派可以算出只是在12月13日之后才得到了教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不是绝对的。教会也许是反共产主义者，但是它不相信共产主义会走向垮台。相反，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于是要求教会方面审慎地对付。我并不是抱怨我们的主教们这样做，从他们来说，这是十分理性的。我所反对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年后，教会的历史被改写成一股牢不可破的民主的反对派。

这同样适用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说战前的波兰共产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化和他们将自己视作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也是不确切的。在1928年，共产主义者已经获得了一百万张选票。他们相信——至少到1936年至1938年那场公开审判之前——他们正在加入服务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历史似乎也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大多数西方聪明的知识分子支持共产主义，Gustaw Herling-Grudzinski于1948年出版过一本书《一个分离的世界》，但是很少有人读过。

雅鲁泽尔斯基：它已经被翻译成 11 种语言。

米奇尼克：那又怎样？它由反共产主义组织出版，因此变得不值得考虑。1976 年我访问了一位加拿大朋友，一位哲学家。我注意到他有一本关于卡廷的书，当我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时，他说，“那是一本法西斯出版物。”对此，我回答道：

“左翼出版家为什么不弄出一本关于卡廷的书来？”这就是由让-保罗·萨特总结出来的那种逻辑：人们不能剥夺 Billancourt 工人的希望。如果你批评苏联，他们就会失去希望。

我父亲的转折是在 1936 年。在莫斯科公开审判和那之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同时他痛恨被称之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切。他在党内一直呆到 1968 年。他不相信反对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他认为我是一个堂·吉珂德。而只有当 KOR 成立，他才知道我并非发疯。

比较我和父亲的处境孰好孰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这一代人的经验是不可相比的。他们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一场其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个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压迫的世界。这是一种信仰。

我反对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我从来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共产主义除了是苏联的一个诡计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一个由人类成员构想出来的前景并且得到数万人的赞同。至 1936 年，我父亲真的相信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可能性，而我却相信完美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

雅鲁泽尔斯基：你的演变对我来说十分清楚。到 KOR 出现之前，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楚的。而 KOR 却不是，我将之视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它似乎威胁到我们发展的步调，尽管有过挫折，但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进程方向。潜意识中，我也意识到了某种相当的尊重，而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具体。

我弄不明白甚至在道德上觉得黑暗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团结工会是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运动而出现的。简言之——包含了右翼，甚至带有民粹主义、左翼社会经济要求、保守的和地方性的政治。我想激怒你，因为这些深深卷入的人们，像你一样，是在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认同这个运动，这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同盟军，你们会以一种类似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那种同盟而终结，于其中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空间，从耶日·杰耶提克到库隆，为了反对更大的邪恶。但是对你来说，后来变得纠缠不清，因为前联盟现在正在执掌权力，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坏。你曾经说过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

我要问你——同时也以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如下问题：怎么能够否认这些人的贡献——他们相信由雅尔塔条约建立起来的框架，将比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孙们更加持久？这不是朝向莫斯科进军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都身处其中的框架，是扩展它和造成更大自主程度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波兰比其他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做得要好。我指的不仅是教会，包括农村这个私有制的堡垒，还有比如科学、文化甚至军事，都有着它们自身独一无二的位置。

你拒绝了解这些。你将我们视作拥有一切权力只是拒绝使用它们。当然，我们是否做到将足够的精力放在拓宽这个框架，还是可以讨论的。我马上就要提到我们的军管法，毕竟，这是为了一个争取更大的主权国家斗争的一部分。首先，我要解释我的行为；其次我可能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当我环顾四周的世界，我想起阿勒克塞·托克维尔所说的：“如果很多捍卫政府的保守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保存各种各样的特权和地位，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看上去反对它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它们。”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为什么共产主义对于反对派有这么贫乏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十足的谜。KOR 的成员是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鲁莽急躁，大多数他们也没有统治欲。

你在 KOR 成员面前提出问题：怎样在一个由雅尔塔和勃列日涅夫教条所划分的世界上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我和 KOR 的其他成员如库隆、扬·里提斯基、齐别根纽·拉曼泽维斯奇当时都写下了答案。但是一个人必须带着良好的信任去阅读它们，而不是听信警察的报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团结工会是反对邪恶的一个联盟。其中有三个大的政治文化：天主教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的民粹主义——换句话说即社会经济的要求，包括人的尊严的要求，第三是如此根植于波兰知识界的民主文化。

团结工会中存在着宣称反犹太人立场的人们。我们始终坚决地反对这种倾向。但是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是一个理性的榜样，像反对希特勒的同盟。对斯大林是何许人也，邱吉尔不存在幻想——尽管罗斯福可能有一些——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于是欢迎任何反对他的盟友。

我们一直在谈论精英阶层，但是团结工会是一个上百万人的群众运动，起因于最原始的政治良心。他们想要生活得更好一些。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但所有这些并没有造成一个政治纲领。团结工会具有一种精神氛围。它的纲领是不屈服于共产主义，学会如何培育已经打开的自由范围。社会危机更多的体现在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上面。

雅鲁泽尔斯基：这就是希热潘斯基教授所说的“消费者的造反”。

米奇尼克：如果希热潘斯基教授曾经像洛兹的纺织工人那样生活一个阶段，很有可能他会说这是饥饿和贫穷的造反。我认为他们是对的，和他们在一起是我的责任，尽管我知道他们的斗争缺少方向。

如果我们谈论团结工会造成的联盟，那么我必须说，从一开始，便有一些我不可能参加的某些人们所卷入的运动。但是我认为，因为我在为民主而战，我必须运用民主的方式。比起“真正的波兰人”或者玛丽亚·尤兹克，我更担心掌权的共产主义。因为自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 1968 年事件以来，我已经对党的“战无不胜”的能力不存在幻想。许多人认为我是冷血动物，而我仅仅是现实主义的。

事情有个先后顺序（某些事情是事先考虑的。）有些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你不视它们是首先需要对待的。我指的是在 12 月 13 日之后，在支持和反对专制制度人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稍后讨论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或者“民族民主运动”（而不是在那个时刻。）

在 8 月争论和 Bydgoszcz 事件（从 1980 年 8 月到 1981 年 3 月之间）期间，我相信我们在分担对于国家的责任，想要寻找一种真正的一致。但是当我听到“正常化”这个概念时，会感到不寒而栗，“正常化”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捏造出来的一个词，意在回到专制。我担心你想要把团结工会拉回到 PAX（一个注册的天主教会和政府的合作组织）的道路上去，你想要使其适应于共产主义专制。

你说过，“我们既需要造反者图劳加特，也需要和俄国调停的维罗波尔斯基。”这条理性的思路与我如此接近。但是，为什么它在现实中却变得如此荒谬？维罗波尔斯基宣称“我们波兰人必须和俄国人调停因为我们过于弱小不足以反对他

们。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在这个框架之内力所能及的建设一个美好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又说：“我们正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最美好的制度，任何人还想要别的东西就是反对波兰。”

在 1981 年 12 月 13 日之后，谁宣称我们可以谈判协商？是团结工会。谁说谈判不解决问题？是共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协商是前往科特达祖尔 iii 还是签名效忠，要不直接进监狱或者让别人诅咒我。从这个立场看过去，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认为这个制度不是掌握在波兰人手中，我们认为掌权者是一个异化的小团体，苏联化的波兰人。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反对将共产主义者和维罗波尔斯基相提并论？维罗波尔斯基说出了真相：“如果我们组织一场造反，我们不可能赢，肯定会完蛋。让我们尝试达成调停。”而共产主义者却说：“苏联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正是我们所要朝向的目标，她是进步与和平的捍卫者，免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如库隆、米奇尼克等人的破坏。”

你采取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你在报纸上这样做。不管我实际上对其含义明白多少，这仍然使得我倒抽一口凉气，因为这纯粹是暴力的语言；意识形态暴力和权力语言。你并没有说为了波兰需要做什么，仅仅说如果保全你自己而反对正在到来的人民的波涛。

这就是为什么军管法仅仅扩充了你作为国家首脑、你统治的范围，而给予社会的自主性以沉重打击。直到 12 月 13 日之前，我一直在分析权威们的确信和他们的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困境。但是在 13 日，这种冲突不存在了。

雅鲁泽尔斯基：我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被当作一个怨恨的前政治家的话来理解。我接受所发生的事情，我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感。我希望当时的改革是成功的。我认为目前的的挫折感和失望应该归因于这个事实，人们太多理想和幻想，认为一旦我们身处自己的家园，每一件事情就像有魔棒触碰似的得到改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悲惨的缘故。

至于 1980 年代初期，可以说情况非常糟糕。但我们仍有权说，我们开始了在当时看来是可行的经济变革。前制度是在违反经济规律和漠视人类良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在那里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和道德的原则。我并不是说那些各种各样的扭曲和肮脏的交易，让我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我任总理时，我向议会提出的第一个讲演中提出了政府所要承担的十项最重要的任务。现在，当我翻阅这个演讲时，我对自己说，你真傻！这十项包括保证食品的供应、医疗保障等。我并没有抛弃这些承诺，我尽最大可能实现它们。在论及我本人和前制度时，我希望不要忘了这些。

问题在于，是否我们必须采取我们正在谈论的某种捷径，像以南美洲那样一种方式来结束，还是采取来自劳动团结工会的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建议？这条道路更加漫长但是付出较小代价，能使我们摆脱失业和给人们提供教育、文化和医疗健康的基础。

米奇尼克：也许我看到的图景有些曲解，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历程是容易的和愉快的。1989 年选举竞争时，我处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他们说我们不必提出一个充满谎言的纲领，而是去答应保卫我们公民同胞和他们的公民权。从这点来看，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掌握政府。也许现在有人宣称他们当时就预见了所要发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遇见过。我当时听到一些批评，说这是“粉红色的人和红色的人联手所为”，说这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尝试”。

当我写“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一文时，我是在建议团结工会和共产主

主义者达成一个特别的调解，我受到我的同伴们的攻击而不是来自你们那一方。他们说我疯了。我记得和塔·马佐维耶茨基有过一次谈话。我们在华沙散步，他富有耐心地向我解释形势：“如果我们掌权，我们将摒弃所有旧人员，他们会毁了我们；我们还将不得不对付难以解决的经济危机。”

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将事情朝向一个特殊的方向。我相信圆桌会议可以表述成我们的西班牙式的，于其中双方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将尝试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并肩工作。这个协议强有力的一点是，人们相信团结工会的巨大力量，它作为一种神话或者一个运动深深根置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根植于不同的年龄和社会组织，并且和教会、教皇的力量携手共进，后者的权威可以被用作困难的转折时期中发挥稳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协议有着巨大的弱点，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其结果是大多数团结工会的精英都不愿意赞同圆桌会议的哲学。他们宁愿采取“去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我强调，如果认为修辞学比实际去做来得更重要，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幻觉，认为“去共产主义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什么也解决不了。“团结工会”的“团结的哲学”打开了通往“分裂的哲学”的道路，至少对于持续的改革来说。

当然，此时天主教采取了一个转变，我至今都不是很理解这种转变。我想采用法国一本著名的神学著作的书名来说明——《从事项举要（Syllabus）iv 到梵蒂冈二世》，那么教会的转变可以说成《从梵蒂冈二世到事项举要》。

我不认为——至少从一开始，我们便允诺了奇迹。我们真的不想掌权。

雅鲁泽尔斯基：我也是到了 1981 年才涉足此领域。

米奇尼克：当时在团结工会内部，我们的战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我支持罢工是为了保卫工会，而我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我最担心的指责是，像我这样的人，仅仅把工会当作一门政治上的大炮，而阻挡意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所有自发性努力。我没有听说过由工会核心领导所支持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罢工。

但是团结工会是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与工人阶级社会和经济不幸相吻合的是民粹主义这一翼，它是难以想象的强大，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巨大同情。一位来自洛兹小城的诺瓦夫斯卡女士曾经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她将前期团结工会的路线定位为全部经济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在工厂里，存在着这样巨大的竞争——看哪个组织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许诺）。团结工会屈服于这种压力。

团结工会的领导面对下列二难困境：和经济要求的联盟保持距离，冒险与官方的某个分支或者阿尔比·什瓦克 v 相衔接，要不就是在在一个独立联盟的框架里与这种倾向并存。当然，有人真的相信当局拒绝屈从他们的要求是因为不想这么做。在团结工会内部，所有官方政策都被理解为其目标在于毁掉这个联盟。权威们通常用“过激分子”、“反社会主义因素”给这些团体命名，旨在试图分裂团结工会。每一个人都在担心这种讨论将会被导向何方，对这种讹诈引起的反应通常是往后撤。

政治提供了这种形势的钥匙。但是集中在政治危机上的结果是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人们感到全部时间都被另一方用作政治游戏，如同苏联的压力和操控一般。对你的草根支持者说一些并非流行的事情，而你又不能拿出具体的变革方案，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回声是，反共产主义宣传宣称在共产主义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所有宣传的本质。

人们很难习惯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现在被拿走，而很容易适应他们刚刚得到的东西。1980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乘早班火车从洛兹到华沙。当我往火车站走的时候，天仍然很黑，但是人们已经在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尽管实际上要到11点才开门。为了将手中的肉票换成一块肉，人们必须早晨5点钟起床等到11点。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肉，同样也习惯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护照，习惯不用签证就能到欧洲旅游，你只要买一张票就能走。同样习惯于不要按时按点收听欧洲自由电台，因为报纸已不存在审查制度。但是人们不能习惯这样的事实——当然我理解他们——为孩子们准备的夏令营现在泡汤了。

你提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当人们在牢里时，会诅咒自己的命运，但是在牢里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睡觉，他吃什么；他知道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两星期他可以去监狱商店里买东西，以及每周两次刮脸。而一夜之间，他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为他的自由洋洋得意。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睡觉，不知道他吃什么或在什么地方洗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生活。

你刚才提到作为总理，他的责任是提供医疗、图书馆等设施，是十分典型的。我不会投票选举这样的总理，因为他欺骗了我。他允诺我某些东西，我便做好记号等待着他的兑现。但另一方面，这个制度没有分派我照顾自己的责任。其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结构出现了：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所有责任感。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

共产党人国家将自己与图书馆、学校联系起来，但是我提出否认的论据是一—什么样的书会在那样的图书馆里找到，而什么找不到；在那些学校教什么而不教什么。这是这个国家的家长制统治模式。与此相反，目前正在运转的国家，就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方面来看，是卷入了一场家长制的模式和为成年人提供的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前者是根据幼儿园的原则，根据小孩子和老师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

雅鲁泽尔斯基：即使这样，正如这个总理所说，当时我们的情形好过我们的邻国。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们都曾经是旧制度中的异端孤岛。在一个采访中我说，“你们走得太快，而我们走得太慢了。但是这些都是现实。”

米奇尼克：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兄弟、康斯坦丁王子想要和波兰人缔结一个协议时，他遇见一位波兰人知识界的领袖安德热依·热蒙斯基并问他：“我能为你们波兰人作些什么？”热蒙斯基答道：“从这个地方撤离。”对此，康斯坦丁的反应是：“这是我们不能为你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接受当时最大多数波兰人的问题是渴望一个主权国家，那么这正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相匹配的情景。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1980—1981年期间波兰人的要求——最低限度的社会、民族自治、真正的多元化——这些对于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来说，真的是过分了？据我所知，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比这更多。我相信，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当权者有一个政治创建的巨大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而同时部队正在聚集，库里戈夫和克鲁赫科夫正好坐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如果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再来一个总罢工，那么这将比12月那一次更加危险，因为此时团结工会像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样发挥作用。军管法——尽管你坚持认为这是最消极的做法——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过程，不至于完全失去了方向。

从战略上说，你们都是鹰派，我指的是你们都相信从长远来说，这个制度必须被推翻。但是在战术上，你们都是鸽派，尽管你们其中有些人如库隆有时候会兴奋得大叫。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分析。

雅鲁泽尔斯基：库隆有说那些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的习惯。当我们见面和听你们说话时，库隆令我想起一个难以控制的咯琅施塔德 vi 的水手，除非由他来执行绞刑。

米奇尼克：他从来不想伤害一只苍蝇。

雅鲁泽尔斯基：你像一只蜥蜴和老虎之间的杂交品种。蜥蜴狡猾灵巧，而老虎只想吃掉我们。

米奇尼克：我们相信——正如 Holy Scriptuers 所说——将播种和收获的问题分开。我们好战的欲求也是针对制度，从来不曾针对个人。

雅鲁泽尔斯基：在我看来，你们的运动是由鹰派所主导，包括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方面，或者毋宁说是战略上的鹰派，战术上的傻瓜。

米奇尼克：也许，但是还有瓦文萨……

雅鲁泽尔斯基：他实在是难以描述。如果有人早上说一件事情晚上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他，那么就难以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向全国提出经济形势的警告；我们有统计数据。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每样东西都建立在煤之上。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东德都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失掉了数十年建立的契约。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当我翻开那时期我的笔记本，我所看到的是“煤，煤，煤。”

我承认军管法之后，我们缺乏重新对话的勇气。无疑地，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和更快。而另一方面，1981 年的形势是另外一副情景。我们经常在讨论建立一个联盟，由各界和政府的代表组成。但是你们拒绝作为分支和一个独立的联盟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这里的民主到哪里去了？也许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可疑背景。今天，我至少可以谈论 1981 年 11 月的三方联盟会议是我发起的，而它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民族理解阵线”。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反团结工会的阵线。一个拥有 9 百万人的联盟坐下来和这个单个的联盟平等地会谈，就像我建议你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坐下来和莫祖西这样的 KPN（独立波兰大会，一个政党）交谈。你肯定会被这种傲慢激怒了。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存在一种真诚的对话的要求，那么人们将能够互相交谈，如果说的话。因为他们并不想开枪或者互相挥拳。

米奇尼克：在军管法公布之后差不多两年之内，我每天都在头脑中和你说话。我经常说：“将军，这么做完全不值得。你不可能永远地在恐惧和冷漠中维持一个社会。让我们一道来吧。”然后我捡起报纸，阅读你的回答，将军，它令我想起了所有逝去的一切。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正在谈论军管法。

米奇尼克：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战术上采取后撤，但是它不会永远忍受国家的非极权情形。当时，你在所有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想象倒退到 1947 年和准备动用部队。”这意味着您想再往前推进一步，当然这是更方便和更有效的。你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而只要你还不想谈论政治，你便不具有我所说的可信性。对我来说，结果表明是严肃的党的争论，都围绕着如何对付团结工会。称之为改革的一翼从来也没有试图认真地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

雅鲁泽尔斯基：团结工会很少承诺关于自由、民主，至少在公共场合，却最大地承诺关于未来更大的社会公正。但是，就最广泛意义来说，战前的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曾经的许诺。谁在这个国家根除了极度贫困？谁为上百万人避免了一

种植物般的生活？我生活在深宅大院里，但是我曾经被极度贫困的人民所包围，他们的小屋中地板肮脏，十分悲惨。我只访问过他们一次，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进一步的访问肯定不合适。今天我住在郊区，和成百上千个农民住在一起。这是所发生变化的一种尺度。我曾经是这个国家将近四年之内的总司令，将近十五年的国防部长，十年之内的重要人物。顺便地说，我不是在抱怨我自己的处境。

米奇尼克：党的第一书记住在 Bytom 干了什么？或者是为了他的责任或诸如此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先前在谈论在武装部队中将军和上校被分派的权力，是你把问题整个扯到别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不要把他们说得比事实更坏。因为他们要忠实地服务于他们的上司，如果波兰还没有崩溃的话。

米奇尼克：但是谢拉科夫斯基和图劳加特起义了。

雅鲁泽尔斯基：让我们不要提及因为他们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米奇尼克：同意。但是我对你的主要谴责在于，你从来没有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我们说话，而总是像对待幼儿园的孩子那样“不要碰那朵玫瑰，安迪，你会扎了自己。”一次也没有，除了 1956 年有过一个短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正常对话。除了报纸的语言和模棱两可的话之外，什么也没有。从这点看过去，我开始在想，在统治集团内唯一持续的是要求统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正在谈论的在其观念中有一个主要的罪：一种将社会理想化和将一切负面的因素归置于共产主义的影响，包括认为第二共和国是美好的。但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必须说：“可爱的波兰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是值得尊敬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是请记住覆盖你的阴影不是 45 年而是 450 年。”一个人不应该沉湎于任何陈旧的庸人角色，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波兰人。你说罢工在宣布军管法之前就停止了，这不是实际的情况。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在罢课，在卢布林，甚至有些中学也在罢课。当时的情况令我想起华沙起义：那些怂恿起义的人事后说：“因为年轻人已经被激怒，他们想以自己的方法击退德国人，这是没有选择的。”

米奇尼克：我猜想十年之后，或者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现任总统那里听到如下解释：“整个民族都在等待，它有弱点，总统也有问题；比起沃拉迪斯瓦夫或者毕苏斯基国王，他不可能做得更多。”我是最不为我的农民兄弟感到愧疚的人。在 12 月 13 日之后，我经历了一个和民族记忆休戚与共的短时期。然而，你不会发现我在第二共和国的记忆中所发现的东西，我将它们表达在军管法之后我写的文章以及目前我编辑的报纸上。

冒昧地说，现代波兰仍然根植于谋杀纳鲁图维奇总统《春天之前》这本书所描绘的关于热罗姆斯基的丑闻、以及 1926 年 5 月的军事政变事件之中。但是，在 40 年内，你端出来的是一套内战时期的罕见的谎言表述。将一个民族理想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我基本上反对根据民族的劣根性来对波兰历史作出分析。必须作制度分析和分析波兰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谈论民族的劣根性将我们导向神秘性或者遗传学。这些我不懂。德国人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波兰人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真正的 Polnische Wirtschaft（“波兰处理事情的方式”——一种德语的贬义词），你将要访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当然，在波兰历史上贯穿着这样的问题——一度时期由年轻人的激情占了上风，主宰某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我视作团结工会源泉的力量——事实上，这吸引了年轻一代，而你却视作一个威胁。这是很有意思的，里普斯基

当时说过同样的意思：“当我看见这些年轻人时我很担心，因为华沙起义时我也在场，我知道这会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但是我现在套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说，这就是生活事实——聪明人视作危险的，年轻人看到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法，你认为情况会是怎么样？我知道关于军管法有很多意见。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或者说后团结工会仍然以一种如此主观、英雄赴难的眼光来看军管法，这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说到底，越是将军管法妖魔化，人们为自己绘制的图景就越得到提升。

我们不知道未来关于军管法的争议如何，认为它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你涉及到西班牙的经验，那里的人们同心协力，同意对于过去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争论，不管谁对谁错。当我要强调我当时所说的这些时，我再一次意识到我曾经是个压迫者而你是一个被压迫者，我想在政治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道德的意义。

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在拉多姆开完团结工会的民族委员会会议之后，我没有乘坐一架飞机前往格斯坦克，此时瓦文萨说“痛击所有的共产党人”而令我们感到吃惊。我可能对他说：“阁下，请吧，我恳求你，我坚持——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也可以问问瓦文萨或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给我们递一个信，以便影响在拉多姆所谈论的，以及什么是他们不想面对的。否则，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去格斯坦克，或者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理解瓦文萨此时在工会的地位已经削弱——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米奇尼克：为什么你把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拉多姆？它只是昙花一现。

雅鲁泽尔斯基：接下来就是瓦文萨在拉多斯克工厂所召开的大会，在那里他说不可能达到一致，因为没有谁能够和谁一致。

米奇尼克：但是基什查克将军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采纳军管法是在两个月前就决定了的。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并没有到我们必须摁下按钮的地步。温度在升高，国内外都是一样。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我们也尝试赋予临时权力的合法性，例如，包括在正在来临的冬季制止罢工。有人对此有争议，认为我们不必等待一场罢工而需要运用紧急状态法来抓住机遇和重整秩序。顺便地说，这并不包括解散团结工会的措施。我意识到你们那方会发现紧急状态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你们必须理解我们将之视为拯救这个冬天的唯一措施，在 12 月初，我给斯坦尼斯拉夫·兹泽克写过一个字条“为了防止灾难的发生，我建议在大城市将几个地区的居民集中到一个地区，只有这个地区可以拥有中央供暖。”他很认真地对待。那时我们无法不这样想。当然，还有莫斯科的存在。

只有你把所有这些事实都加在一起，你才知道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压力之下，和所感到的责任感的份量。我们周围——从库比亚到兹瓦克 vii 都十分赞同，不管他们实际上存在的分歧。当我最终摁下按钮，我感到如释重负。

存在着两个看问题的角度。第一，它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是，如何避免？第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结果？我是在两种恶之间选择了较小的一种，所以不得不批评其后所发生的。

米奇尼克：假如可以说，五月政变（1926）没有发生，那么，“民族民主运动”便不可能引进一个权威秩序，我们也就不会有波兰人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知，在这种事情上并不存在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确存在一种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中，存在着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如果你将哥缪

尔卡和纳吉放在一起比较，你就会发现存在多么大的机动空间。

你说你们所有的人达成了一致，从库比亚到兹瓦克。（这样）我们可能被指责说——这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这种结果是我们自己招致的。我对此看法不同。我要说，当权者们虽在战术上有所不一致而在战略上基本是一致的，即自我保存。不惜一切地追求“正常化”而已。从拉科夫斯基到巴采科夫斯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信息。

你提到分派责难的问题。我对此有不同回答。在 12 月 13 日之后我的文章中已经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应该被谴责，因为他们是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置于死地。

我的第二个回答——私下里对库隆说过——我们也是应受责备的。我们两人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当时就可能举行自由选举，那是在 1981 年的秋天；我则认为有一种妥协是可能的，即采取两个议会的立法机构，其中一个按照共产党人的原则来选举，另一个根据团结工会所认可的原则。

我的第三个回答是在 1991 年春天的莫斯科，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不惜一切代价，你们要寻求与戈尔巴乔夫达成一致，因为如果在俄国实施军管法，他将得到西方人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多么正确，停止去想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此时我说了我从未说过的话：——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需要为军管法在波兰的实施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谈判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在圆桌会议期间，我的政治立场来源于 1980—1981 年之间妥协破裂这个事实，感到现在自己要使得妥协成为可能，记住它先前的失败。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于假如没有实施军管法这个问题，不做出简单的回答。从什么地方给出我的论据？在我看来，1981 年上半年有着妥协的机会，后来却释放了对抗的动因。哪一方都不相信妥协是可能的。依我看，其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

对我来说，军管法的真正结束是在圆桌会议。这意味着我改变了自己的推论。如果波兰共产党人像他们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放弃权力，我们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军管法和它的怂恿者。在圆桌会议上，我承担起与一个特殊人物达成了某种和解的责任——基什查克。我曾经写过一封言辞恶毒的信给他。如果我现在所说的不同于以前所说的，仅仅是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是一个卑鄙小人。我完全知道基什查克过去承担过什么责任。但是，假如在圆桌会议上我对基什查克说，如果我掌权的话，他将因为军管法被送进监狱，我现在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光彩的。

在波兰有人说圆桌会议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必承认共产党人的合法性，而必须做一切事情获得正义。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圆桌会议，多少人将失去生命。我很高兴自己为促成这样一种局势而出过力——这个转变没有流一滴血。并且对于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出的贡献，我也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我这一代人经历的许多事情是永远难以忘记的，我将永远记住 Wujek 矿山事件 viii，因为我感到对这些人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两种恶中较小的恶。一种较小的恶，并不是在 12 月 13 日的语境中我可以认同的概念。

如果没有实施军管法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对这个问题要么无解要么有好几种解释。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和消极的说法。如果我们逐个分析在那一周内导向军管法的所有事件，也许可以说，形势并不有助于达成某种一致。时间也不允许。

但是必须说在那段期间，没有人询问真正的问题所在。雅鲁泽尔斯基是否抵达格斯斯坦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不管他在那儿说什么，俄国干涉的威胁总是在某处伺机等候。主要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谈论两种恶中较小的那一种，那实际上应该是共产党人部分地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是实施军管法。

有人认为团结工会走得太远了。团结工会应该受谴责的是——他们要求得太多。这些说法也许是对的，团结工会的政治思想受激情、恐惧、憎恶、夸夸其谈所支配，在战略、政策和方案之间缺少区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戒严的当晚，团结工会正准备起草一份特殊的东西，我称之为“有组织地反共产主义”。我指的是马里安·尤泽克，他宣称用绞刑架来威胁共产主义者，并说在政治局中是犹太人控制了波兰，他知道他们当中有谁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有谁隐瞒了其出身。

我记得（政治局成员）斯蒂凡·奥泽夫斯基对这番话的回应。他并没有提及有人热衷反犹主义，而是简单地指出这个错误，因为不管是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基什查克都不是犹太人。我坐牢的时候曾经写过一封信，这样形容军管法——一群持枪暴徒袭击疯人院，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甚恰当。

说到底，关于责任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假如我感觉自己的决定会令上百人致死、千百个弱者踏上不归路，我将会怎样行动。

人们仍然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并没有沿用这条思路，而仅仅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这种论辩的方式在别处类似的地方已经很容易地被接受，比如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人们赞同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法而谴责皮诺切克是一个暴君，或者赞同皮诺切克把智利从共产主义中挽救过来却谴责军管法是一个罪恶的行动，这些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两种看法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所不能忘记的是，智利和波兰都曾经避免内战，在从专制制度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由某个将军所实施的军管法。

不管是在智利还是在波兰，我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专制，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现在是停止所有各种讨论的时候了。如今军管法是历史学家、报界人士、作家、牧师、道德家和忏悔者们的一个话题，而不再是提出公诉的一个主题。

雅鲁泽尔斯基：其中每一个论题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整个一生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决定。我说过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是这不应按照字面上来理解。我不再面对二难困境。衡量所有有关事实，都将我带向“较小的恶”面前。人们不应滥用这个概念，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处形势的一种简洁描述。

团结工会采取了某种自我夸张、自以为是的语调。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我们也经常说：“社会信任、期待和要求”诸如此类。甚至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权利说这些东西，因为社会从来不是整板一块。

米奇尼克：你认为大多数波兰人想要军管法？

雅鲁泽尔斯基：我不想用大多数或者极少部分人这样的概念。

米奇尼克：绝大多数人并不想要军管法；他们想要达成协商。

雅鲁泽尔斯基：他们想要协商，但是如果协商不能实现，他们想要安宁。人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们，但是可能不喜欢其中的某个人，甚至视他为十足的坏蛋，但是如果我落水了而这个坏蛋把我救出来，我会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坏蛋，但是谢谢你救了我。”

米奇尼克：我唯一准备接受的事情是——臭名昭著的军管法令上百人死亡、

数千人受冤屈，但是波兰存活下来，而不是苏联入侵。在这一点上，我的想象力停止了，因为那会在波兰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布达佩斯。这时，所有的争论便失去了基础。

雅鲁泽尔斯基：当时的掌权者相信保卫这个制度是必须的。

米奇尼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拿波兰的任何一年和 1981 年比较，虽然法律意义上的多元化尚未存在，但是我们有着事实上的双重权力——每一个人都感到他们正在发挥作用，他们实际上处于某种当家作主的状态。米奇尼克：那你为什么不试图将这种双重权力付诸制度化？

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你没有做……

米奇尼克：我们试过，也许是不成功的和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但是你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有权力。如果煤的问题真的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没有一次来和我们来谈谈煤和党的领导作用。

雅鲁泽尔斯基：我认为你不能否认，在 1980 年和 1981 年 9 月之间，当团结工会发展壮大时，我们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所有的趋势都朝向一个方向。

米奇尼克：不，现在请听我平静地和富有善意地说，在 1956 年和 1970 年，存在着两次大的巨变。每一次都有可能不是导向恢复旧秩序。

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都没有能够。

米奇尼克：不完全。但总是回复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刻板垄断。就没有回到恐怖而言，1981 年 10 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再度出现了政治犯。当年哥穆尔卡把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关押起来，是因为他们给大学的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雅鲁泽尔斯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米奇尼克：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我们将这视为共产党人臭名昭著的平衡规则的体现：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复到平衡状态。

雅鲁泽尔斯基：这是一种有色眼镜的结果，而并非是准确的表述。当时，我们正在对付没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在其后做支撑的自发运动。1980 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性质起了变化的新的团体，一个实际上比党还要强有力运动。

米奇尼克：但是你想运用你的间谍网来瓦解它。你可以问问基什查克将军，在 12 月 13 日之前他在团结工会领导层安插了多少代理人。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他这样做，也只是想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米奇尼克：并不仅仅是刺探情报，而且是制定政策。每次我问自己，共产党人如果不用军管法而使得我们偏离轨道该怎么做，我就想起米科莱泽兹的处境，想起那样多的代理人进入农民党内最终把他赶走。我绝对相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罗科西用“香肠战术”来描绘你干掉你的敌人的过程，一次切掉一片。这正是你要做的。先是莫祖尔斯基，然后是库隆和米奇尼克。你在整个运动中安插了你的代理人。我先是在马佐沃兹地区发现了这个，后来达到一个几乎占大多数人的一个程度。去问问热比谢克·布亚克吧，他那里的人们几乎将他打翻在地。我是如何知道他们都是代理人的？因为你颁布了军管法，他们对此毕恭毕敬并从此消失。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我们还想谈得具体一些，我对团结工会与其他联盟 1981 年 11 月大会的结果感到很失望。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拒绝。你们一方中断了会谈，仅仅因为你们想在筹建的工人团体中占据七分之三的席位。

米奇尼克：你是否想说引进军管法是要保护其他联盟分支？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借口。

雅鲁泽尔斯基：不。但是你说过我们没有朝向正当方向跨一步，我正在说的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你们没有回应。大主教能够和我们坐在一起，而你们不能。出乎意外地，你们所有人如此关心自己的手是否干净。

米奇尼克：你并没有回答我主要的问题。在整个时期，你只想谈论卷心菜，而不是政治。

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这样的。一个新秩序的确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民族理解委员会”想要成为一个论坛，于其中我们可以讨论重要的问题。我必须说——因为我有权利自卫——后来的发展表明我们是对的。说到底，每个人都坐到了圆桌会议面前。但是我们怎么能无视在拉多姆发生的情况呢？

米奇尼克：你讲得不准确。在实施军管法之后，结果是团结工会完全不再准备任何对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支枪，没有一枚手榴弹，没有一只盛满汽油的瓶子。我们实际上能够谈论什么呢？拉多姆仅仅是我们不想再往后撤的一个象征，而不再有其他。现在我理解你的处境：你接受了这个会议的传抄本是团结工会正在谈论痛殴共产主义者，于是你有权利感到愤怒。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考虑，瓦文萨只是担心自己被孤立，于是他破釜沉舟。但是实际上，这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 × ×

米奇尼克：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完全有可能的是，如果在比亚沃文卡的卫兵抓住我试图逃跑，他们会杀了我。而如果在 12 月 13 日这个民族剧变的时刻，我住在临近你、基什查克将军和拉可夫斯基总理的隔壁，而我又可能有枪，我自然会把目标对准你们。

而另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我们都赢得了胜利，我视这个为拥有巨大意义；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论所有这些，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各自过去的真实。如果波兰有机遇——我相信她有这个机遇——她将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雅鲁泽尔斯基：两种恶中较小的一种，这种想法在当时整个占据了我。我仍然相信当时所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今天知道人们必须尊重争论中的另一方。但这不是一个白相对于黑的问题，而是试图去理解另一方。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在任何问题上和另一方达成一致，而是我们可以相互理解。这是最重要的。

注释：

iBronislaw Geremek，团结工会顾问。——译者注

ii Kiszczałk，人民波兰最后一任内务部长。——译者注

iii Cote d'Azur，法国东南部度假胜地。——译者注

iv “事项举要” Syllabus，指教皇庇护九世于 1864 年所列 80 条及庇护十世所列 65 条异端教义、行为或制度。

v Albin Siwak 代表了党的内部较少反对团结工会的这一支。——英译本注

vi Kronstadt，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

vii 即从改革的共产党人到党内顽固分子——英译者注

viii 1981 年，在扑灭 Wujek 矿山罢工时，警察杀死了 9 名矿工，这是军管法实施期间最严重的暴力。——英译者注。

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

——约翰·肯尼访谈米奇尼克
(1988)

译者按：米奇尼克在某处说过，他不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是社会运动中一名知识分子，此话的分量不可轻估。知识分子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的视角与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人们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为了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抗议，它们是从生活的根部生长出来的，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和催促；对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自发的力量导入理性的轨道，将来自不同方向上的不同人们其不同要求，做成一个宽广、结实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进行磋商、调解，而不是使用任何一种强制性力量来解决。这就是米奇尼克所说的“公民社会”——让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每一个人拥有与君主相同的权利。所以问题不在于由瓦尔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如果是那样，什么也不会改变；相反，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在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头脑而不是不停地陷入眼前和局部的争执，这是无比宝贵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在与肯尼的这场谈话中，米奇尼克表明了自己公民社会思想的来源：哈维尔、乔治·奥维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和加谬，尤其是波兰传统的四位人物——诗人米沃什和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牧师卡·沃依蒂瓦，后者即后来的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约翰·肯尼 i (下简称“肯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你将戈尔巴乔夫称作一个“伟大的反改革家”，他影响了不可避免成为危机的那些改变。你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获取什么？ 米奇尼克：所有这些改变着眼于维护苏联的帝国，或者令这个帝国走向现代化。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相反，他希望苏联变得更加强大。他必须就这样三个发展作出回答。第一、苏联共产主义经济力量已经崩溃。苏联经济像一个建筑在沼泽地上的一所巨大的老房子。每一天它都往淤泥里下沉一点。房子仍然站立着，它并没有经历革命或者灾难。每件事情看上去仍在运转。但是在下沉二十五年之后，房子的地基已经毁坏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特殊问题。他并没有面对一个工人革命或民族反抗。他将面对一个新形式的革命，一种更加沉闷无味的革命，不可能用通常的办法加以解决。当人们反叛我们的制度时，可以派警察或者军队前去镇压。但是下沉的房子并不害怕警察或者军队。它并不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它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条来加以解释。因此，戈尔巴乔夫正在寻求一种方法扑灭经济上的匿名的反叛——支撑着它尽可能缓慢地沉入沼泽。

戈尔巴乔夫还同时面对一连串国际问题。苏联有两个强大的世界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在缓和破裂之后，美国被确认为主导性超级大国的地位。里根政府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因此如何面对苏联现领导人是个基本问题。无疑，里根总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之父之一，他迫使苏联放弃其战略——建立在双边关系之上的缓和而在其边界进攻西方。克林姆宁宫面临着由于对整个西方世界开放带来的真正危机。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寻求新的武器竞赛，这会在全球化的年代将苏联

拖入危险。这项战略得到了近些年中所发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支持。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们正在产生出可观的物质财富，同样在改变着其国际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改善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迫使当今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的可能性。

波兰是戈尔巴乔夫第三要考虑的。波兰所发生的事情给苏联领导人上了一课，除非他们继续进行国内改革，否则将要有什么事发生。如果团结工会被视为有能力摧毁极权主义制度的一项改革运动，那么戈尔巴乔夫则是反改革者。他想通过改良这个制度保存它。1981年12月13日，在波兰强迫实行的军管法，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反动。它被认为波兰的危机仅仅是波兰特殊的复杂错误所导致的，而修正的努力就在于实施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稳定安宁，在那里没有危机。雅鲁泽尔斯基集团在12月13日之后所有的举动，都是在波兰创造这样一种秩序。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是：“不！不存在仅仅是波兰的危机。这是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瓦解了雅鲁泽尔斯基集团的意识形态，使得后者处于由莫斯科所释放的改革的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对雅鲁泽尔斯基始终有着抑制性的影响。雅鲁泽尔斯基被迫返回到改革的修辞学，他不能实施建立在压迫基础上的政策，因为它们会被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相比较。

肯尼：在西欧和北美，关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和平攻势”和波兰社会经济改革的极度要求之间，有相当的讨论。许多人相信，戈尔巴乔夫私下里向雅鲁泽尔斯基极力推荐在经济改革的方向上往前推进，因此迫使他寻求和培育社会支持。这就出现了谈论民主、民族和解、1986年9月的大赦和经济改革的“第二波”，以及1987年9月的公民投票。你是否接受西方人对于当前波兰事件的解释？雅鲁泽尔斯基是否在从事一种“和平攻势”和认真进行经济改革？

米奇尼克：谈论雅鲁泽尔斯基的和平创意是一个笑话，就好像皮诺切克将军或者南非总统也在着手和平一样。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有可能通过与其民族的和睦相处，而开始一种真正的和平，但是他志不在此。无疑他需要社会支持，不仅是金融的经济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恢复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从皮诺切克到卡斯特罗，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社会支持。然而雅鲁泽尔斯基的关键问题是，在过去六年中他试图挽救波兰经济危机的努力失败了。当他如今夸口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翻译成普通语言来说，无非是对普通波兰人生活水平的一次剧烈冲击。雅鲁泽尔斯基知道他站在一个活的火山口上。所有他的宣称和改革动机因而有着双重的含义：欺骗自己的民族和为了赢得贷款而向西方世界撒谎。

肯尼：你认为这些伪改革是不可行的，并不能导向波兰制度的“自由化”，如同许多西方观察家所希望的，其理由是什么？

米奇尼克：雅鲁泽尔斯基的天真打算是在波兰用美元建立共产主义。他的“自由”的姿态全部用来适应这个目标。在这样一种上下文中来理解“自由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是重要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种族隔离之上的一种制度。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因为有色人种而存在着歧视。在共产主义制度之内，歧视是因为政治观点、宗教和党派所属所造成。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否想要通过在人们中间培育平等意识来废除我们的歧视制度。与南非的白人统治相比，它意味着核心领导层的垮台。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想要废除我们的歧视制度。他为了维护统治集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核心领导层。因此，他瓦解了任何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这种不受约束的支配性的核心领导层权力，是共产主义经济当下的不合理和危机的根

源，我们整个经济屈从于由小集团介入的这种僵化和任意性的计划指导，而不是受法律的约束、市场力量或者民主进程的引导。

肯尼：追随密尔顿·弗瑞德曼的波兰“新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有同样的抱怨。他们的争论在于引进市场机制，以此为手段来改进生产效率、产量和分配额。为什么你批评他们的观点？

米奇尼克：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是不现实的。他们想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变为皮诺切克将军。他们想要他保持专制的政治权力并保证充分的经济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核心领导层不可能放弃他们对于经济的控制，因为这是他们权力的来源。此外，皮诺切克经济上的成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在智利，一个自由的市场伴随着贫困、和持续的经济危机。

肯尼：如果在波兰发生了某些事情，出现了以皮诺切克将军取代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可能性，将会怎样？

米奇尼克：如果一定要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皮诺切克将军之间选择一个，那么我会选择玛丽莲·黛德丽。这种选择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我作为在专制制度中为民主而斗争，如果要我选择，是选择以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来坐牢。如果是在智利，我也许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坐牢；而在波兰，我却作为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坐过六年牢。我对这样一种“多元论”不感兴趣。问题是在波兰没有起码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而政治改革没有一种长远的计划，来废除我们的歧视制度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改革的前提是认同团结工会作为波兰前途的对话者。没有这个，所有雅鲁泽尔斯基通过对话谈论改革都是毫无意义的。

肯尼：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够公开发布波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波兰的大部分水不能饮用；洛兹和华沙没有一套净水设备。旅行所到之处空气闻起来是有毒的。波兰十分之一的版图上，居住着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正式宣布为“生态危险地区”。这副图景真实吗？

米奇尼克：我不是一个生态学专家，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有关。波兰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从官方的观点看来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社会不被看作有能力组织自身来捍卫自己的具体利益。因此，解决我们生态问题的钥匙也同样是解决我们其它经济问题的钥匙。我们需要有能力保护环境的机构，当然，生态问题涉及到经济。对经济来说有效益的，对生态来说则是有害的，越是自发的社会，其环境退化得越快。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对立的价值，我不能想象在一个社会秩序中，所有价值都得到平等和谐的实现，但是冲突只有在它们得到真实表达时才确实。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恰当的命名这些冲突，使冲突获得发言权。

肯尼：我很想知道波兰社会当前的冲突。比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对于它们我更熟悉一点——这里的人们拥有更高的公开表达和尊严的水平。我的表达是否准确？自从1980年—1981年事件以来，社会信任是否降低了？波兰社会是否感到失败的危机？

米奇尼克：你所观察到的变化是肯定不可逆转的。1980年—1981年的事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革命，是有脊椎动物权利的一场庆典，是挺起脊柱来的人们持久的胜利。不管发生了什么，这个民族二十世纪以来不可抹杀的一个事实是：极权的共产主义秩序在波兰倒塌。匈牙利革命之后的六年，已经不存在这场革命的痕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六年，已经不存在布拉格之春的痕迹。但是，宣布军管法之后的六年，在这个国家，团结工会伴随着一个公民社会而存在。现在

有地下出版、地下文化、地下科学，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地下结构。人们不再感到恐惧，他们挺起了腰板。我们给共产党人上了一课，这是团结工会最大的成功。但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我们需要谈论未来。

肯尼：在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团结工会已经不再构成对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威胁。用来支持这个观点的是大规模的游行已经消失。是否团结工会被逼为守势？

米奇尼克：如果说团结工会是一场数百万人的运动，如同军管法之前的日子所显示的那样，那么现在它当然趋于减弱。百万人卷入的运动仅仅在重要的革命关头才是正常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和西方的社会运动有相似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团结工会已经不再构成雅鲁泽尔斯基的麻烦。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允许团结工会正常运转呢？

肯尼：但是街上的游行是不是少多了？为什么团结工会反抗这个国家的斗争变得看不见了？

米奇尼克：原因之一是社会已经厌倦了游行，厌倦了仅仅是导向与政府相冲突，因而归于无效的斗争。波兰人不可能用脑袋和手中的石头赢得一场对苏联的战争。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今天最糟糕的举动是阻遏在苏联境内所发生的变化。这在波兰有过先例，1863年波兰的一月起义，阻碍了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因而导致这位俄国人从亚历山大·赫尔岑转向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米哈伊·卡特科夫。1956年，赫鲁晓夫的改革被匈牙利革命所阻遏。而苏联当前的发展的确提供了共产主义阵营之内转变的更好的一种真实可能性。因为我们帮助刺激了这些改革，因为改革的深化离开团结工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并不想令其中断。因此，我们转向地下出版、戏剧和电影来继续，而不是街头的暴力。团结工会和这个极权国家斗争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借助罢工和游行，一个是转过背去，像马采伊·波莱茨基所说的那样，通过大海般的沉默。一个处于沉默的社会看上去是容易控制的，但事实上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它对国家的制衡显得迟钝。瓦文萨喜欢提出这样的问题：“鱼缸里的鱼和汤里的鱼有什么区别？”他的回答是：“鱼缸里的鱼可能转变为汤里的鱼，而汤里的鱼无法转变为鱼缸里的鱼。”这个微妙的笑话概括了当前雅鲁泽尔斯基的问题。如果他拒绝承认团结工会，他就把社会看作如同汤里的鱼。而他如果想要社会成为鱼缸里的活鱼，正如他的改革想要成功必须做的那样，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团结工会给了这个社会真正的活力。如果没有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的手便被捆着，尽管团结工会并不能在一纸之令之下号召一场总罢工，这就是波兰局势的秘密。而六年以来，雅鲁泽尔斯基一直坚持以为团结工会不存在，而令自己陷于瘫痪。他反对团结工会的行为非常像和大海作战而归于失败的薛西斯一世ⁱⁱ。雅鲁泽尔斯基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是现实地认可这个国家独立社会中的团结工会其至关重要，还是相信——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通常所做的——团结工会将要消失的奇迹。

肯尼：因为强行宣布军管法，在西方政治家中一直存在着如何最好地对待波兰政权的争论。你怎样估价西方官方对待波兰的态度，尤其是美国政府？

米奇尼克：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美国对待波兰和东欧国家的政策通常是不明朗的。在军管法宣布的第一年，我很喜欢里根政府对待波兰政府的强硬政策。而最近，我对布什副总统在波兰电台的讲话留下深刻的印象。布什说他已经见过瓦文萨和其他团结工会的领导（本人有幸忝列其中），他认为直接建议波兰社会怎样去做是不合适的，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其它国家，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一个来源是对于人权和多元化的尊重。布什十分清楚地宣称，美国的朋友不

是波兰国家，而是独立的波兰社会。当然这些发言是一种连贯政策的粗线条表达，而事实上，这次会面发生了，使得这些说法变得非常重要。副总统布什所获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撒切尔夫人更早些时候在莫斯科电视台对苏联人们讲话的一个结果。而十年之前，所有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卡特总统因为致信萨哈罗夫，从而引起了美国和苏联关系的紧张。而今天，如果美国副总统访问莫斯科，不会见萨哈罗夫是不可能的。这是新的和重要的进展。以前苏联的原则是国家之间只讨论武器、军队和军事问题。而现在甚至苏联也不得不讨论人权问题。对我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有足够的勇气去做，而英国工党和工商联盟议会没有去做，这是令人羞愧的。人权的问题和独立的商业联盟也是他们政策的中心。这并不仅仅是保守党的问题。西方公民和西方国家不能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这将不仅毁灭波兰民主的可能，也将危及整个东欧的民主。

肯尼：波兰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正如作家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所指出的。今天波兰制度存在许多特殊的面貌——一个强有力的、拥有声望的教会，农业方面是私有制的，具有广泛的文化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你仍然把波兰政体说成是极权主义。在这个语境中，你说的极权主义是什么意思？

米奇尼克：我最后一次在西方是在十三年前，在西班牙的佛朗哥专制最后期间。行业联盟和政党的运转已经近似合法化，也存在着广泛的文化自由，一个独立的教会，独立的农业，甚至一个独立的市场。即使这样，没有人把它称作人性面孔的法西斯主义。每个人称它为一种分崩离析状态中的法西斯主义。今天我们在波兰经历的也不是有着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而是暗哑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制度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极权主义制度，其中的“自由主义”是它虚弱的标志。由汉娜·阿伦特表述的极权主义秩序的古典分析不再能够准确地描述我们的状况，它只适用于国家机构本身。（今天）的波兰制度是由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伴随着一个不能以极权主义方式来控制的社会所合成。国家是想施行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被迫与生活和解，其结果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临时的平衡。自从斯大林去世，极权主义的教条并没有改变。国家仍然想要集中化；因为教会是人民的鸦片，它仍然想要取消波兰教会，但是它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这个目标。但无论如何，它强调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则：“党的领导作用”。

肯尼：这里有一个潜在的混淆。在西方，极权主义仍然基本上用于描述一种残酷的谵妄的政体，它要求大众狂热的献身，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的制度。你的意思是说这种分析已经不能够适用于波兰社会因为它的权力较少谵妄而更加精打细算——还经常是失灵的。因此你说这个制度是极权主义是在这样修订过的意义上：它持续地阻止独立于党的领导政治秩序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米奇尼克：的确如此。国家要求每一个人——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党员和非党员一视同仁——歌颂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领导集团的伟大，而把他们的错误归结为坏运气。

肯尼：公民社会的概念在你对于新形式的极权主义的批判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在《狱中书简》中，你说团结工会的诞生是和某种复辟是同义词，一个公民社会有能力与这个国家达成妥协，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是首次。当你说公民社会时意味着什么？这个古老的十八世纪的概念如何与今天相关？

米奇尼克：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最早复活了这个概念的先驱之一，它是欧洲最富有洞见的作家，他揭示了极权主义主要是家长式的统治。在极权主义秩序中，

国家是一个教师而社会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有时候它就转变为一座监狱和一个军营。相反，在一个公民社会，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者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公民社会的概念诞生于十八世纪用来反对封建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是二十世纪后期、一种更野蛮的封建制度。因此，反极权主义的反对派采用古典斗争的形式来争取一个民主秩序，就不足为怪了。其关键在于，作为公民，我们这些民主的反对派并不想被看作孩子或者奴隶。反封建运动的基本原则在于人权，是这种理念——每个人和那些君主拥有同样的权利。只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想要每个人享受和雅鲁泽尔斯基一样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肯尼：你们的行动展示了一个深刻的对于民主的承诺，它有着多重性和在近来遇到多重批评。到底你的民主的含义是什么？在你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中，有什么来自波兰传统的特殊的东西？

米奇尼克：我是从波兰民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四个最重要的代表——作家米沃什、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和来自克拉科夫的牧师卡·沃依蒂瓦（Karol Wojtyla）ⁱⁱⁱ——对我理解民主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动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视民主不仅仅建立在政治原则之上。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的权利。它提供了一副宽容的图景，一种对于文化传统重要性的理解，于其中有可能冲突的人类价值都可以得到培育。对比之下，政治上的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之上的秩序。它可能并经常与人的权利相冲突，仅仅在保护所有人们的立场——包括少数人——的秩序之内才能实现。按照我的理解，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但是，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曾经指出的，自由赋予我们超越自身的力量，它因而使得我们去行善或者作恶。尽管这种自由是上帝赋予的，但是仍然会令我们放弃真理和善。我们拥有拒绝两千年基督教文明的自由。但是我们也有自由来询问自己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什么样的其他价值允许我们如此拒绝。因此当我听到我必须去反对我的文明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时，我必须问：拿什么东西来代替我正在拒绝的东西？沃依蒂瓦主教教我发出这样的提问。自由的原则也提出了宽容的需要——这是米沃什所提出的。我的文化力量必须借助多元论还是一致论？波兰只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吗？还是将她变成一个武器垃圾场？抑或她必须创造另外一种文化财富？她不只是所有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疆界之内的地方，不只是为波兰天主教徒所准备的，也是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犹太人、吉普赛人、浸礼会会员所准备的？最后，我所理解的民主原则要求人们询问自己——这是赫伯特提出的：如果大多数人屈从于胜利的极权制度，像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那样的，那么，我就必须跟随他们么？而我如果选择了民主，相信自由、宽容、我的文化传统、我的人类尊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失败？我视所有这些问题为民主的核心。

肯尼：在关于民主的这些重要结论中，既不承认暴力也没有革命政治的位置。在波兰的反对派中，你是坚决主张避免运用暴力的人。在《狱中书简》中你曾经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在其他地方你也指出过，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为什么你视暴力如此危险，认为它是对于民主的主要威胁？

米奇尼克：我对于暴力和革命的思考，是由我对于极权主义起源的思索所激发起来的。我在乔治·奥威尔、汉娜·阿伦特、曼杰施塔姆和阿尔波特·加谬的著作里寻找答案，得出这样的结论：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

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 8 年牢狱之灾，那是在 1930 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答案是暴力毁坏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卡斯特罗想要一个自由的古巴，但是在反对巴蒂斯塔 iv 的斗争中，他被自己的权力所腐蚀。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

肯尼：一个共同的观察是，革命是一种拥有改造作用的经验。人们从中体验到自身的力量。其内在感情的空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人惊讶地，他们在自身之内发现无边无际的力量。他们体验到决心行动和改造这个世界的力量。参加革命成了一切对于未知世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你的著作检视这种经验和着眼其未曾预料到的结果。例如恐怖和报复。对你来说，革命当然也是一种眼花缭乱的经验，但更主要地带来了清醒的结果。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

米奇尼克：说得对。这是在每一场革命中存在的问题。正如向往自由的英国革命和产生奥列弗·克伦威尔一样，为了 *the droits de l'homme* 而斗争的法国革命也走向断头台。在二十世纪，俄国、中国和古巴的革命都是这种规律在起作用。伊朗革命不是，它是一场反对现代专制的保守革命。革命的产儿是霍梅尼，比传统的伊朗国王更坏。我并不希望在波兰出现这样的后果。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可以假设，如果明天由瓦尔萨或者库隆来取代雅鲁泽尔斯基，什么也不会改变。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肯尼：你提到民主是由文化传统所孕育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波兰天主教。天主教会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它对于波兰反对派的支持，但这在西方一直估计偏低，尤其在左派那里，存在着对于天主教的误解。一个教会来捍卫民主的自由，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同样还有罢工工人复诵着万福玛利亚。这种怀疑论者相信教会是反动的。在《教会和左派》一书中，你试图解释在波兰条件下，天主教意味着某种如此特殊的东西。在波兰，天主教如何成为一种驱动力量——一部社会抵抗的发动机，独立于国家机构，并在公众社会中享有深深的尊敬这样一个有力的机构？

米奇尼克：那些不理解波兰教会特殊性质的西方人需要认真考虑爱尔兰历史，这样有助于他们理解一个贫穷的国家和一个强有力的帝国处于对立时，天主教会所具有的重要保护作用。波兰的教会作用很简单：它是波兰民族身份的保护者。在极权主义压迫最困难的岁月中，教会保护了人的尊严和文化认同，包括崇拜的自由。在斯大林时代，教会是人们唯一听不见谎言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人对它保持忠诚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当今极权主义制度认为每个人是国家的财富，而教会认为人类成员是上帝的一个孩子，上帝赋予了他天然的自由。这种上帝赋予的尊严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仅仅能够崇拜上帝而不是国家。由此看来，在波兰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宗教是人们面对国家权威极权主义讹诈时的一副解药，尤其是教会建立在对话基础之上而不是权力基础之上。当然，波兰的教会也存在着一些危险，这里的天主教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它们。波兰教会试图重建祭坛和主权之间的联盟。所有这些来自梵蒂冈的冲动无疑强烈反对在国家和教会之间的联盟。约翰·保罗二世的教会将目光停留在一种人权的哲理性辩护上面，

不仅适用于天主教而且适用于所有人。

肯尼：无论如何，许多西方人包括天主教徒，抱怨教会的某些教训中缺少普遍性。它们对“天赋自由”的这个限制性概念提出疑问。禁止离婚和对于避孕的性别歧视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米奇尼克：恰恰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对于西方人如此执着于天主教会的性伦理而不是苏式体制对人权的侵犯感到十分惊讶。让我们考虑一下天主教会在离婚中的位置。教会说：如果你想生活在与教会的协议中，那么你不能离婚。它并不是用警察和军队来提出这样的观点。此外，教会对于人们期待比性道德要多得多。它号召人们爱他们的敌人——这是比禁止离婚更难以做到的。它提醒这个世界真理就是真理，善就是善。它知晓我们可能不能获得真理，但是它强调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要知道自己失败的必然性。关于性的教条从这个角度才变得可以理解。教会不可能事事满足人们，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一个说出真相的教会，即使这个真相很难追寻和令人不愉快。无疑，教会是一个保守的机构。当然，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这样保守的机构只有一个——在波兰我们并不存在这种威胁性可能——那么教会的作用将等于墓地或一所监狱。而无论如何，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个没有保守机构和价值的世界。人类是从保守和竞争的持续冲突中建立结构，而它们当中任何一位缺席，多元化将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倾向一个国家其性道德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在教会的训诫中是严厉的。

肯尼：在关于戈尔巴乔夫文章中，你提到莫斯科的改革加强了政治妥协的一种新的哲学——妥协被理解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调节国内冲突的方法和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途径，例如在波兰和苏联之间。对许多西方读者来说，你强调妥协是令人惊讶的——尤其是它来自某个有着如此鲜明的民主冲动的人。说到底，妥协的主题根植于更早时期的现代保守传统。“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柏克说：“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你怎样将你的民主要求和妥协要求结合起来？是不是冲突着的双方都认真需求妥协时，谈论妥协才变得有意义？什么样的迹象表明，波兰国家有能力来调解，或者它正准备和一个力图致它死地的组织妥协？你是否认为，只要苏式制度仍然呆在波兰，一个自由的波兰就是不可能的？

米奇尼克：当然，我的妥协图景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起点。地缘政治学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强大到在波兰赶走苏联红军。并且，我的妥协图景还拥有另外一个起点。它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相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从一开始，左派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它缺少一种有节制的前景的理解。

肯尼：在欧洲，在左派和右派之间，传统的区分实际上在于对于保守派立场的不同认可上面。传统的右派认同审慎地对待未来和尊重过去，而左派则力图推翻过去和建立现在，通常对未来抱一种不加约束的乐观主义。而你通过妥协来表达的民主的社会变革的要求，是否割断了和这个传统区分的联系？

米奇尼克：是的。革命党人总是将保守主义等同于约瑟夫·德·梅斯特尔 v。他们不去考虑埃德蒙特·柏克拥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实际上，在法国革命中，释放出两个保守主义传统。梅斯特尔是一个反革命者。他是一名白卫军，努力想要抹掉法国革命的所有痕迹，从而回到波旁王朝。柏克是一位反改革者。追随孟德斯鸠的步伐，他清楚地意识到由大革命提出的复杂问题。他争辩道，大革命的价

值必须被迫通过妥协途径的改良所吸收。《在法国沉思大革命》一书清晰地分析了自由和革命的悖论。不幸的是这本书迄今在波兰被禁止。如果我精通英文，我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作为礼物送给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教会他们妥协的哲学。

肯尼：你将怎样把这种起源于柏克式的通过妥协来改革的理念运用到当今的现实之中？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你的一种新妥协的希望在哪里？以粗线条来看，新妥协是什么情景？

米奇尼克：我视戈尔巴乔夫给萨哈罗夫打电话为苏联帝国时代一种新妥协的可能的象征。戈尔巴乔夫面对着一个基本的选择。要么他意识到在苏联社会中存在着不能除掉的冲突，因此而致力于建设一个建立在妥协之上的社会秩序——与鞑靼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拉托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包括其他少数人比如知识界一道；要么他试图动用警察和军队来解决所有冲突。对苏联来说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妥协，要么回到斯大林时代。为避免后者计，戈尔巴乔夫必须要求和少数民族的领导人达成协议。他必须发展出一种框架，鼓励少数民族的人们停留在一个苏联多民族联邦的框架之内。

肯尼：在波兰，如果才能到达一种新的妥协？雅鲁泽尔斯基具备这种调解的能力吗？

米奇尼克：这个问题得由雅鲁泽尔斯基来回答。他必须决定他是进入与团结工会的对话，还是倒向哥穆尔卡或者盖莱克一边。我看别无其它选择，尽管也许他还能拖上个两三年。波兰民族能等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不能肯定雅鲁泽尔斯基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有人认为只要他们把枪架在我们的脑袋上，他们就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是不真实的，正如盖莱克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雅鲁泽尔斯基必须做出决定：是作为引进军管法的人被历史所记载，还是一种新的和解的设计师？所有迹象表明，雅鲁泽尔斯基的政策是以苏联改革的崩溃作为前提的，它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可能妥协，波兰的新妥协因此就要求他放弃权力。瓦文萨曾经说过，有人必须在这个国家负起历史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团结工会的手总是伸出来要求妥协。我们准备好了妥协，但是我们并不允许投降主义。我们仍然呼吁妥协，然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妥协的方式。也许我们不得不再次来到街头，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那么我会感到又一次机会被白白浪费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尽管这真相令我的朋友和当局两头不愉快。这个真相是，如果我们再次被迫上街，那么会出现流血。我愿意为避免这种可能性去做一切事情。我始终感到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流血，而只有雅鲁泽尔斯基的愚蠢使得流血可能出现。

肯尼：你因为参与写作和散发《给党的一封公开信》而第一次被捕，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份东西以解放工人阶级的名义公开批评政权，署名为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今天你如何看这份文件？如果由你来起草另一封给党的公开信，你会怎么写？

米奇尼克：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如今对这封信感到羞愧。他们认为这是一桩智性方面的错误。我对它的感觉稍好一些。这是一份具有高度历史意义的文件，象征着某种政治思想模式的终结。它认识的起点是：俄国革命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然王国的飞跃，并重复着托洛茨基呼唤劳动者的革命以反对丑恶的官僚阶级。这些作者反对教会但是尊重圣经。许多西方的团体仍然在运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批评布尔什维克。对我们来说，这种语言已经寿终正寝。它属于一段封闭的历史。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之间的争论已经不能表述我们的现实。关于如何改进社

会主义的争论已经变得离题万里，因为在波兰没有人知道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如今的争论代之以我们如何取得自由。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的这封信是重要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挽歌。恩格斯关于革命通常收获与其初衷不同的东西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适合于这封信。这是波兰彻底反对现存制度的第一份文件。它讨论的是一场真正的劳动者的革命，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真正公民社会的开始。

肯尼：如果你今天写一封给党的公开信，将包含什么样的建议？

米奇尼克：只有一个建议。我将重复我在《波兰的荣誉史》一书中提出的某些话。在狱中写的这本书中，我引用了波兰诗人尤里安·图维姆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这句话可以用来对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者说：“亲亲我的屁股。”

注释：

i 这篇访谈发表时，John Keane 用了一个笔名 Erica Blair。John Keane 现为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1999 年出版哈维尔传记《一出六幕政治悲剧》。

ii Xerxes, 519?—465BC，波斯国王，镇压埃及叛乱，率大军入侵希腊，洗劫雅典，在撒拉米斯大海战中惨败。

iii Karol Wojtyla 主教，即 1978 年当选为 266 任教皇的约翰·保罗二世。

iv Batiste (1901—1973)，古巴军人，独裁者，两次任总统 (1940—1944、1952—1959)，1959 年被卡斯特罗推翻。

v 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鼓吹君权神授，反对法国大革命。

反权威的造反

——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
(1987)

译者按：访谈者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1946年生，引发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的事件之一“楠泰尔事件”的“肇事者”，“五月革命”期间的领导人和发言人。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到楠泰尔学院(巴黎第十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22岁的社会学系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中不提学生的性问题？”部长的回答是：建议“学生们跳到水中来败一败火。”科恩—邦迪反唇相讥：“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唯一答复。”学生群中突然爆发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3月21日，一个左派突击队为抗议越战，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被捕的六人中，其中有一名是楠泰尔的学生。22日，科恩—邦迪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五月二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科恩—邦迪等8名“3月22日运动”成员被要求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三日，索邦(巴黎大学)集会抗议。为防止楠泰尔事件发生连锁反应，警方关闭了索邦大学，500余名学生被带走，骚乱发生。人们用石块在卢森堡广场建起街垒，接下来的日子，烟雾、瓦斯、爆炸、叫喊、掷石战充斥了街区。萨特、波伏瓦、雅克·拉康、阿拉贡等知识分子积极站出来声援学生，五月风暴遂形成。该月中旬，法国政府发出对于“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科恩—邦迪的驱逐令，因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反对驱逐的抗议示威。邦迪后著有回忆录《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丹尼·科恩—邦迪现为德国“绿党”活动家，居于法兰克福。

当邦迪率领他的巴黎大学同学占领学院行政大楼时，波兰华沙大学历史系21岁的米奇尼克也正在经历着他人生中第一个暴风骤雨的阶段：为抗议哥穆尔卡当局禁演反俄诗剧《先人祭》而投入战斗。1968年3月4日，米奇尼克被大学除名。接着，为抗议也发生了大学生们占领学校校舍的事件。表面看起来，有多么相似的地方——在当时波兰的官方报纸上，用来咒骂邦迪的语言和咒骂米奇尼克的语言是一样的（“祸根的犹太人”！）因此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1976年米奇尼克受萨特邀请去法国时，邦迪经常与他在一起。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有机会真正看清楚他们是如此地不同，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如此有分歧，而当年却浑然不觉。

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对话，一位东方左派和一位西方左派之间不停地“掐”。于其中米奇尼克谈了他自己思想和实践经历的道路：如何从一个共产党背景的“国际主义者”，变成诚挚地认同自己的“波兰身份”；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变成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从一个在知识分子圈子中长大的年轻人，变成能够与波兰工人同甘苦、与社会运动共命运。

有关“左派”的话题不时地浮现。用米奇尼克的话来说，在东方的左派和西方的左派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谬的联系。”在包括雅尔塔条约、越南战争、教会的意义，以及什么是冲突着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米奇尼克会指出对方在某个问题上“是一个典型的左派的荒谬”，同时又承认说他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像一个西方的左派”。言谈之中，西方的左派对于东方的左派多少有一些

艳美，当年也是“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邦迪居然说出：“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像你在波兰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至于不能面对坐牢的威胁。”这话有点“露怯”了。米奇尼克回敬说：“我像你一样热爱生活”。

作为“六八”年的老兵，东西方的左派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反权威”以及对于生活保持诚挚。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六八”年人是否有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发展出富有生长性的命题？而不是把自己打扮成比如“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同样可以询问的是，西方左派的立场，能否成为中国新左派的“原教旨”起点？

丹尼尔·科恩·邦迪（下简称“邦迪”）：亚当，在谈及你自己时，你总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位波兰人。我发现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想过我的民族性有这么重要。

米奇尼克：如果你住在德国的某处而阅读托马斯·曼、歌德、席勒、黑格尔和康德是不被允许的，你会发现德国在某个意义上是不可想象的。我认可我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或者一个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和被羞辱的，波兰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这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不论是好是坏。事实是在波兰有人将我看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是波兰人。

邦迪：你是否能够说说这是怎样发生的？

米奇尼克：我的个人经历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波兰人的经历。

邦迪：这没有关系。

米奇尼克：我来自一个通过共产主义而波兰化的犹太人家庭，一种红色同化。所以我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性的感觉，和当今的民族符号并无什么关系。例如，在波兰家庭中，男孩子总是被带往教堂，而对我来说，我是在任何传统之外长大的。在今天波兰，通常一个家庭不是建立在波兰独立战争就是国民自卫军(AK)的背景之上，而在我的家庭中，它们都不存在。我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在牢里度过八年，此后他不想再扮演政治角色。他整个的知识构成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甚至当他为反共产主义者或者反苏联阵营者做辩护时，他所使用的语言仍然是他从前从党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语言。

邦迪：这种破裂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时候？

米奇尼克：十分悖论地，在六十年代，我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一个小圈子之内。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我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相信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事业就是谴责不公正。而我也是这样。一般的波兰家庭不会让孩子这样成长，通常是教导他们生活在苏联占领之下，任何不正当的想法都会被密探告发，所以一个人必须小心翼翼。波兰的孩子担惊受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恐惧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因此我是勇敢的，我敢说。例如，在学校里，我站起来提问：“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在卡廷i (Katyn)发生的事情？”教授的反应是觉得难以置信。仿佛地震一般，每个人都感到害怕，而我被赶出了教室。

邦迪：那时候你多大？

米奇尼克：十三、四岁吧。在我的生活中有过两次震惊。第一次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党员，在集中营里呆了二十年之后回到波兰。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好的共产主义者被送往西伯利亚，这是我不可能理解的。第二次是震惊是我的一个表亲嫁给了一个因为参加自卫队而在西伯利亚呆了十年的男人。于是我的天空

着火了。这是由一个叫做扬·帕莱诺夫斯基的人所写的一本著名的波兰书的主题，一个波兰年轻人的良心危机。从此，我一直在探索在考虑信仰的含义，是否信仰上帝和圣三位一体更好一些，而我不愿意像被共产主义者的上帝欺骗一样，再次被欺骗。

邦迪：哦！哦！

米奇尼克：我和上帝谈话，我说：“我信上帝，而不信教会。”

邦迪：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

米奇尼克：上帝欺骗过你吗？而共产主义者却经常这么做。

邦迪：他的信徒们总是欺骗我。

米奇尼克：我并不是说你必须相信那些信上帝的人，但你总得信上帝。

与此同时，我的一个朋友办一份叫做 Po Prostu 的杂志，把我带进了华沙的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Krzywe Kolo，在 1956 年之后它仍然能够保持（关闭于 1962 年）。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验，因为华沙最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克拉科夫斯基、沃泽米耶日·布鲁斯、斯塔尼斯沃夫·奥索夫斯基、塔杜施·科塔宾斯基（都在这里。我才十五岁，仍然是一个学生）。

也是在这里，我有幸遇到了后来在我的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我仍然欠他的情），当代波兰最杰出的人之一扬·茹泽夫·里普斯基。

我必须说我是童子军的一员，这是有些特殊的，因为自从 1956 年之后童子军在波兰已经死了。……在我的年代，童子军带上不同颜色的领带：黄色、绿色、白色、红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色是被禁止的，只有一个团体可以带红色的领带，库隆是这个团体的领袖。我属于这个团体。后来在 KOR（保卫工人委员会），我们意识到有百分之十五的人，都是带过红领巾的人。

我的政治意识来自两个传统：造反的共产主义，由库隆所代表；另一个是独立的、世俗的知识分子，像里普斯基这样的。

邦迪：《致工人党的公开信》发生在同一时间吗？

米奇尼克：不，这个在前。这时库隆仍然是党员，认为只有在党内才可能做些改善。我比他更年轻一些，感谢上帝。这就像你和你弟弟相差几岁一样。而我为什么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原因也在此。

当我十五岁时，里普斯基建议我和朋友们弄一个讨论的俱乐部。这不难说服我，因为我精力充沛而且无所顾忌。我找到了亚当·沙夫教授对他说“沙夫先生，我想做一个讨论小组。”沙夫是波兰的安德烈·日丹诺夫那一种人，在年轻的时候很有想法，战前积极参与地下运动。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老人，但是我必须和他接触，因为他说：“好吧！如果你想要一个俱乐部，你可以做一个。你可以遇见华沙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里的。如果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这是在 1962 年，没有人有胆量可以忽视沙夫。这样，在他的保护之下，讨论的俱乐部诞生了。一些年之后，党组织和警察还记得这个俱乐部，他们称之为“修正主义者苗子”，同时惊讶为什么它不被禁止。

我被认为与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某些派别有联系，但这不是真实的。我只是幸运，因为笨人总是幸运的。就这样，这个俱乐部有差不多上百个高级知识分子，许多来自共产党家庭。

邦迪：你们在俱乐部里做什么？讨论些什么话题？

米奇尼克：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共同的：我们非常活跃乃至十分天真。但是这种天真也是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勇敢的原因。

我们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里会有什么事情落到我们头上。在知道了我父亲的朋友和我的表亲的故事之后，这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早该知道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美国入侵古巴猪湾，我在大学里游行，无精打采地喊一些反美口号。但是我回家时却感到非常自豪，对父亲说我参加了一个政治游行。他的脸马上变得像纸一样白，问我：“谁带你去的？”“库隆”。我父亲说：“去告诉他，你肯定是一个笨蛋而他是一头蠢猪。以他天才的头脑，他应该到苏联大使馆前游行，抗议入侵匈牙利。”这就是我父亲的共产主义。而我的共产主义使得我说：“你会看见的。时机一到，库隆会在苏联大使馆前游行的。”结果证明我们俩都对了。

在我们“修正主义苗子”的俱乐部——我们将之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我们讨论一切被禁止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真的被禁止，因为我们有沙夫的保护。

邦迪：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吗？

米奇尼克：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自由；苏联入侵匈牙利；1939年9月17日；在波兰会发生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吗？

克拉科夫斯基此时对我说：“亚当，听着，不可能有在全国范围之内的第二次革命，使得第一次革命恢复元气。”但是我当时听不进他的话。

我们也讨论波兰共产党消亡的原因；莫斯科大审判；托洛茨基主义，封闭的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等。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那时候说所有马克思主义都属于一个关闭的门背后，我认为他是在说讽刺话。在六个月之内，每一件事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结果表明自由有其局限性。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也是这样。华沙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要求我们修改我们的讨论提纲，被我们拒绝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不是按照良心来行动？……但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根据他们的良心来行动，所以我们的俱乐部便被解散了。

我最初投入政治，开始于1963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哥穆尔卡点了我的名字。当时我快十六岁了——对于东欧来说这是一个年龄段。在我要升十一年级时，我们的俱乐部被关闭了。因为我在寻找矛盾，所以我自然没有时间学习，我必须花点力气赶上物理课，要不就不能毕业了。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库隆，他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到你。”我结结巴巴地说：“听着，库隆，别拿这种愚蠢的东西烦我。我还有物理课的功课要做。”从那时起，库隆老是爱说：“哥穆尔卡同志没有任何物理课的功课要做，他有时间去烦心这些愚蠢的东西。”

那是在1964年，我毕业了。但先是发生了著名的“34人公开信”，由34名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联名签署的给总理的公开信，抗议审查制度。这封信引发了轰动。哥穆尔卡的反应非常暴烈；他视此举为如同北约军队入侵了波兰！他开始惩罚一些人，禁止一些人的名字公开出现。其中有一些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回应，一些学生组织了一个游行，来声援他们的教授；这是我此生见到的第一次游行。

邦迪：你是见到了还是参加了？

米奇尼克：当然，我参加了，尽管我还不是一名大学生。布罗尼斯瓦夫·巴泽克如今是日内瓦的一名哲学教授，他在大学的院子里阻止我。我在“矛盾的寻找者”俱乐部里认识了他，他也知道我的父亲。他拎着我的耳朵把我从游行队伍里揪了出来，对我说：“你现在必须考虑你自己毕业的事情。你可以进入政治，也许那是你想做的，因为所有的白痴都进入了政治。我就是证明。”

我平生第一次出国就是在中学毕业之后。虽然只有三个月，然而是很重要的经验。我遇见了很多人，读了很多书，和波兰的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员和法国的托派有过交谈。我回来时已经坚定地明白自己要做什么。我拉下了一学期的课程。

我在历史系遇见了一位叫做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的朋友，说好了三天之后再见。卡罗尔警告我“我不能确定来我家和见我的朋友，这对你是否有好处。”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谁要见我？我想引起卡罗尔的注意是因为我想充做内行，他在大学里非常受欢迎，学生们喜欢他，女孩子欣赏他。但是最终他没有让我到他家去，而是约了我三天之后在大学图书馆见面。我按约来到了那个图书馆，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最终大怒而归。后来去他家，他母亲告诉我他被捕了。库隆和其他一些人也是同时被捕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主显节：我意识到自己属于哪些人的圈子，尽管有些与众不同。就这样我成了莫泽莱夫斯基和库隆的热心信徒。我从来没有完全同意他们的纲领，但是我感到和他们很亲近。48个小时之后他们重获自由，重新运作公开信的事情。那时我们关系十分密切。1965年他们把那封信交给了党。他们给了我一份复印件，这样就可以在整个世界散发。复印件藏在我住所的外面，警察不至于发现它。

警察首次造访我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当时我十八岁。我以为我被抓只有48小时，而事实上延续了两个月。我坐了两个月的牢。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对我说：“亚当，你必须明白，波兰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想要抓谁就是谁，而放人却不那么容易。”许多年之后，我的脑海经常浮现出这句话。

“公开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库隆在这之前就因为他的少先队的活动而很有名气；莫泽莱夫斯基早就是一名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而我还不到十九岁，我也变得很有名。每个人都在谈论我，这变成了一个中心话题：我是有名的并正在从事一项事业，尽管共产党人还想抓我。换句话说，我把这一切归功于共产党人——我不敢确定，如果不是因为这二位在，我是否还是会做这些事情。

接下来的三年——从1965—1968年，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在大学里有了一个注册的名字。

邦迪：我可以问你两个进一步的问题吗？你是如何找到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的公开信的？你在理论上是怎么看待它的？

米奇尼克：事后批评并非是一件体面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当库隆头一年写它时，我在牢里。在“政治犯保护周”期间，库隆写了一封短文章发表在Kos这个杂志上。于其中，他解释了我与他以及与莫泽莱夫斯基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对待波兰独立的态度；二、对待议会民主的态度。我当然希望看到波兰独立和恢复议会民主，但是如果要拿无产阶级专政替换议会民主，就必须放弃法国革命给欧洲所带来的（成果），即主要是人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库隆在他的文章中回忆了这一切，他这样做是对的。除此而外，这封信还有一点与我有关：对它的语言我感到十分亲近，这是一种与共产主义竞争的语言，对生长于爱国主义传统的波兰年轻人来说，有些陌生，我本人属于共产主义传统，像前面说的。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对我来说非常熟悉。

邦迪：从1965—1968年之间，你的生活中有哪些最有意思的事情？

米奇尼克：我整个生活都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时期是在团结工会期间。我没有因为其他事情而错过它。（为此）蹲十六个月牢是值得的。65—68年这三年期间是有意思的，因为一些朋友和我在一个不允许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制度内，从事着合法的反对派团体活动。这归因于大学，我们才能够这样

存在。当时的形式已经变得十分复杂，许多教授拥有自由观点，包括中立的教授和一些党员。那些视我们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人，也视我们为十足的傻瓜。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共产主义是苦难的根源，而我们却跟随着提出改善的图景，显然我们精神错乱了！但是他们的忠诚和尊严促使他们要保护我们。因为我们这些抗议者，尽管不是他们的学生，也拥有和他们一致的合法性。我们代表他们进入历史。我们使得他们的存在成为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保护我们，尽管有时候犹犹豫豫。

青年团在大学里组织了晚间讨论会，关于这样一些主题比如“苏联五十年来的和平外交政策”。每一场讨论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我们也事先碰头和分配任务：雅纳克，你谈论关于匈牙利入侵；约泽克，你谈论卡廷；斯蒂凡，你谈论芬兰；而你，你谈论关于莫斯科审判或者南斯拉夫。大的官方组织的讨论在大学的大讲堂，哥穆尔卡的秘书瓦莱里·纳米特耶维奇也会出席。我们围着屋子坐好。他先做一个回顾苏联五十年来为和平而斗争的报告，接着我的朋友约泽克就发问了：“这个和平中是不是有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他回答：“这是挑衅。你没有资格讨论这样的问题。”于是我就站起来，喊道：“不，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资格！你听着！”他回答道：“矛盾并不能吓唬党。”我继续道：“后果是看得见的！”一阵骚动接着而来：雅纳克谈起了匈牙利，约泽克谈起了芬兰，斯蒂凡谈起了南斯拉夫，末了，我引用了卡斯特罗的话。

邦迪：你不感到遗憾吗？

米奇尼克：是的，实际上为此遗憾的。难道你没有做过令你遗憾的事情吗？我只是跟你讲大致的事实，或者说真相？……于是我引用卡斯特罗的话，苏联和平合作所要达到的是，保证没有炸弹落到在莫斯科或者华盛顿头上。但是它们可以落在越南头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知道炸弹每天落在头上，你感觉怎么样？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是因为你不想做任何事情！

这位秘书同志说不出我是站在共产主义一边还是反对它。处在那个位置，或许我两者都不是。另一次事情是米·拉科夫斯基——一个自由派，现在的外交部长——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问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批判的理论？他说“是，当然。”那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信上帝吗？“不，不应该。”那么哥穆尔卡同志是一个人类成员还是一个上帝？“当然，一个人类成员。”那么，作为一个人，他是不是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不，不可能。”那么请问，拉科夫斯基同志，他们为什么不能发现哥穆尔卡同志的一个错误来进行批评呢？……如此等等。

邦迪：这是一种反权威的革命。

米奇尼克：完全如此。

邦迪：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经历。

爱娃·库里可ⁱⁱ（别林西的妻子，比米奇尼克小12岁）：这是只有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典型的经验。米奇尼克：这一代人给波兰的反对派带来了某些十分特殊的东西。

邦迪：对于反对派来说，他们之间的观点有时候也会处于对立之中。当然，也许并不相反，只是不一样。

米奇尼克：是的，邦迪。事情正是这样。所以我支持1968年法国的五月运动并非偶然。对我父亲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他总是在说：“这个邦迪是个法西斯的暴徒。”我的回答是：“不，要是的话把我也算上”。他说克里维纳和他的

乐队是斯大林分子的分部，塔里格·艾利这个英国的巴基斯坦人是一个苏联的代理人，汤姆·哈代是克格勃的代理人，我说，“要是的话，这些我都是。”我可以据实说，我和父亲之间偶然也为了原则问题而争论。

1968 年你在电视访问中，称法国共产党为“斯大林分子的渣滓”。我对父亲说：“你应该像这样。”他回答：“是的，他偶尔是对的，但是他的立场是错误的。因为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我不是。你的兴趣是这些观点，而我想知道的是人们的对错。”

邦迪：不讲这些陈年往事了。是什么导致了 1968 年的发生？

米奇尼克：在 1965——1968 年这段期间，一些寻求矛盾的人在大学里聚集。这只是一个团体，谈不上非法组织。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将自己发展为一个非法组织，但是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两年多之后，我们的组织面世了。

这个期间我们主要是寻找一种能够帮助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框架。我们试图建立两个方面的联系：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和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这说明我身上存在两个东西：一个是由西方左派打下的烙印，另一个是天主教教会的古典倾向。这也意味着我完全缺乏康德的那种要求，我是非常地前后不一致。但是我想，如果哪天我发现自己前后一致，我就死了。

我的老师克拉科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做《为不一致感到自豪》；我当时也这样想。我想此时我最大的错误是在 1966 年，反对波兰主教对于德国主教的那个动议。

邦迪：你是说关于奥得—尼斯河边界 iii 的那个动议？

米奇尼克：在那封信中，波兰主教给德国主教写道：“我们宽恕和乞求宽恕。我们宽恕纳粹的罪行，也请原谅因为我们的仇恨所导致的由你们付出的代价。”我想这是一个正当的、理性的和有远见的姿态。但是当时我根本不能理解。以我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背景，我是民族主义的反德国宣传的激烈的对手。（其实）这里没有更好的人和更坏的人，也不存在要诅咒人们。德国人并不为纳粹负责，这种责任由纳粹来负。圣经中说过十个人就足以挽救一座城市。而十个德国人像托马斯·曼、亨利希·曼、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赫尔曼·劳申琴、the Scholl sisitors 就能够拯救德国。所以我应该喜欢波兰主教写给德国主教的这封信。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向来被告知，所有天主教的东西都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和不可靠的。现在每当我想到自己当时的反应，就感到愧疚。我的书《教会和左派》，就来自于这种愧疚的感觉。

当我到德国的时候，海因利希·伯尔对我说这封信令他想到救世主还会重现。

还有一封天主教反对派的信，但是我还是留给天主教徒自己评价这件事情好了。我仅仅捍卫自己的立场就够了。波兰人有这样的坏脾气，他们总是要为他人的罪过而辩护，而我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有责任仅仅就我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第二个我感到愧疚的事情是越南。我们在大学里最初散发的关于越南的小册子中，将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入侵匈牙利相提并论，但是两者是不可比的：越南是一场反对极权主义的战争，匈牙利是一场反对自由主义的战争。至少这是我的观点。

邦迪：南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Ky 将军代表了什么？你可以说这是两个极权主义它们之间的战争。

米奇尼克：南越是一个腐败的、反动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邦迪：你的意思是说那种政体不是极权主义的？

米奇尼克：不，不是的。难以忍受的军事专制和集中营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邦迪，如果你们不懂这个区别，你们就不懂共产主义。而你应该知道。

邦迪：你是应该对此发言的人，不是我。

米奇尼克：但是你说了一些事情。

邦迪：我问过一个问题。

米奇尼克：你不能光提问题而不说什么。

邦迪：问题如下——如果是今天来选择，你是否支持美国在越南，像许多法国人一样？我指的是理论上。

米奇尼克：是的，当然。

邦迪：你自己做一个解释吧。

米奇尼克：我会反对越共，并在南越建立民主抉择。

库里可：美国人没有弄清楚的是，南越领导人只顾自己想要的。

米奇尼克：这不仅是对美国人来说太糟糕了；而且对他们的责任感也太糟糕了。我跟你说吧，邦迪，如果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选择黛德丽 iv。

邦迪：好吧……好吧……

米奇尼克：不，这不是 OK 的问题。因为你装成斯大林代表了一种较小的恶。我告诉你吧，如果斯大林输了那场战争……

邦迪：我没有那样说。我说的是从越南的观点来看，越南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米奇尼克：请允许我对此质疑，如果是那样，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越南难民想要离开。

邦迪：对民族解放阵线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不能理解的是北越人有自己的其他利益。

米奇尼克：你认为他们不能理解？

邦迪：没有一个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现在是越南的领导。

米奇尼克：好吧。他们咎由自取。任何将自己贡献给共产党的人，都会落到如此下场。我跟你说这个，是因为我也是和他们有着同样的血肉。

邦迪：对你来说，这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经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从越南人自己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米奇尼克：好吧，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我们都不知道越南人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邦迪：我和一些越南人谈过。

米奇尼克：我也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

邦迪：但是他们不是……我的意思说，在波兰的他们不是难民。

米奇尼克：但是这儿有越南的学生，当他们吃饱喝足了，他们会说出真相。

邦迪：对波兰人来说真实的，并不必然适用于越南人。我认为越南人是在解放之后才经历了共产主义。1968 年，大多数越南人还在和美国人作斗争……

米奇尼克：少兜圈子，直接点说吧。

邦迪：他们甚至并不是赞成共产主义，只是反对美国而已。

米奇尼克：你怎么知道？好吧，你说的有部分是真实的；美国人对此负有部分责任。

邦迪：如果这会令你高兴的话，我要说 1967 年，我们曾经写了一个小册子，和你的托洛茨基朋友作战……

米奇尼克：你们并没有足够地痛击他们。

邦迪：我们的小册子说，由斯大林主义者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没有前途，因为 1947 年他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镇压了农民起义。对我来说问题总是这样的：如何保护越南的独立要求而不去为共产主义辩护……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米奇尼克：我有另一个问题要问：为支持越共你们在美国大使馆打碎了多少窗户；其中有多少是为了越南的难民？

邦迪：在最后几年内，我参加反对苏联的游行，和参加反对美国的游行一样经常，我也许打碎过后者的一些窗户。

米奇尼克：但不是因为越南？

邦迪：在苏联大使馆因为越南？不是。

米奇尼克：从来没有因为有人支持越南难民的原因，而打破苏联的窗户。只有法西斯主义者因为阿富汗而打碎过苏联的窗户。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邦迪，我们共同的错误。1976 年我在罗马出席苏联入侵匈牙利周年纪念大会，只有少数的传单而且是法西斯主义传单在纪念这件事。在意大利只出版了一本有关卡廷的书，而且还是一家法西斯主义出版社。这并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我们的失败。

邦迪：关于越南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我要告诉你。

米奇尼克：什么叫“越来越强烈”？它们存在过，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邦迪：这有点复杂。

米奇尼克：是复杂，但是肯定不是不值一谈的。

邦迪：让我们停止越南这个话题吧。

米奇尼克：好吧，够了。

这期间有两个事件吸引了波兰人。一个是国内的，一个国外的。国内的是亚当·密茨凯维奇的戏剧《先人祭》，国外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在 1968 年最早两个月，波兰整个问题都集中到华沙民族剧院的舞台上，用俄国作家贝斯图泽夫剧本中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里。对现在年轻一代人来说，国家正在被一群来自俄国的不法之徒所控制。”

布拉格之春也是同时开始的，我们喊道：“波兰等待自己的杜布切克。”

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我们期待一个民主化的新浪潮。整个辩论都围绕着这个触及我们民族特性的戏剧。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而密茨凯维奇不是。他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作家，但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是一个强烈的反俄国者，是在反沙皇专制的意义上。他为十二月党人写过一首诗：“给我的俄国朋友”。他很适合我们的头脑状态：他让我们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一个国际主义者，同时是反俄国的又是一个亲俄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了我们的一个新前景。

当《先人祭》遭到禁演，最后一次演出时，我们拉起了横幅要求继续演出，我们喊道“要独立，不要审查制度”。这些话具有双重意义。它会令共产党人相信波兰并不需要审查制度因为它已经是独立的。而传达给民众的不同信息是波兰要扩大独立自主，而不是扩大审查制度。

回顾我们早些时候所说过的话，我想到的是，如果歌德或者席勒的作品在德国被禁止，那么你会变成第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

邦迪：不一定，因为我对歌德、席勒没什么感觉。说到底，这是一个所受教育的问题。

米奇尼克：那么博马舍呢？或者伏尔泰、莎士比亚……随便什么人……海涅、Borne、莱辛。我是在谈我自己的教育……

邦迪：法斯宾德 v！如果没有审查制度，法斯宾德就可以上演……

米奇尼克：对了。忽然不可能再上演了，因为俄国禁止了它。你会成为一个

德国的爱国者吗？

邦迪：我会是一个自由的热爱者。如果我想要萨特的剧本在德国上演而俄国人禁止我这么做……

米奇尼克：因为密茨凯维奇是一个立陶宛人，我实际感到的是国际主义。

与此同时，少数共产党的持异议者也抓住了民族的旗帜。此前，一切都是抽象的和理论上的，而此时出现了波兰的民族性，波兰的血性。波兰神话并非一个烧焦的大地的神话，而是一个因失败而失血的神话。它并不是沙文主义传统，而是牺牲和烈士的传统。第一次，我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波兰人。正因为我是一个波兰人，所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也是在这时，我意识到因为我是波兰人，所以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不能做的。共产党人非常知道这一点：我们正在用密茨凯维奇来隐藏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被称之为降落部队，因为当党在某处组织一个游行，我们就像一支伞兵突击队一样降落在那个地方，捍卫我们自己的事业。

我们被咒骂为用密茨凯维奇来隐藏我们的托洛茨基—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有米·莫查尔可以担当此联想。当然，我不否认我们和托洛茨基主义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和犹太复国主义却没有。

我把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公开信的两个复印件送到了西方，一封给流亡杂志《文化》，另一封给了 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公开信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来自 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 的年轻人把自己看作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反对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正统。他们的想法有意思的是，他们同时是一个反苏联的造反派而又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以一种教条的方式对待现实。

我记得和他们有过一次争论：官僚是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还是一个阶级？根据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它代表了一个社会阶层，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吉拉斯认为官僚是一个阶级。对我们来说，官僚是一个阶级而不是社会阶层，因为定义为社会阶层意味着共产党国家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官僚现象只是堕落现象；而你如果承认它是一个阶级，你便拥有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而非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不同，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派（像你，邦迪）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执着于民族的概念；他们认为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我们是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托洛茨基派、国际主义者。事实上，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到好笑。

邦迪：停止托洛茨基的话题吧。让我们回到 1968 年 3 月。

米奇尼克：正像我刚才对你说的，两件事情标志着 3 月：禁演《先人祭》和布拉格之春。它开始于禁演《先人祭》，一出波兰古典戏剧；我认为在法国或者德国文学中没有可比性。在得知它被禁演之后，我们组织了一个政治游行。后来，我被指控严重叛国，因为我会见了一个法国记者并向他讲了这个故事。戏剧禁演之后，我和一些同学被大学开除。这种开除其实是非法的。我们组织了一个抗议，但我没有参加，因为这关乎我本人。我随后被捕，一年半之后被释放。

监狱对我很有教益。每次我看报纸，我就发现一些文章是由分管我的事务的警察所控制的。在 1968 年，共产党的波兰报纸运用这种类似纳粹出版物 Sturmer 的语气，这也是不同寻常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延伸为纳粹的反犹主义。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报纸上说我是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我的位置。当时我二十一岁，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

用波兰语写下这些句子。

我问我自己：我是谁？真的是这样吗？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应该离开波兰？后来我想到这不是由米·莫查尔这个苏联的代理人来决定的。他不能决定我是波兰人、犹太人还是中国人。这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无权决定我的民族身份。

同时我在思索我的知识分子身份。波兰共产党的反犹主义永远地切断了我和共产主义的联系，这是第一次确凿无疑的事实。

第二件事情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我从报纸上得知，在 1968 年 8 月 21 日，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的军队——包括波兰在内——进行了军事入侵。我第一次感觉像一个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波兰军队的参与令我感到如此羞愧。

我认为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取决于这个人为罪行发生而感到的羞愧。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愧的是一个波兰人。1968 年 8 月 21 日，我尝到了民族羞耻的苦涩。波兰的道德、波兰的神话在这个句子里表达了出来：“为了自由——我们的自由和你们的自由。” vi 但是共产主义者却把它改写成“为了囚禁——我们的囚禁和你们的囚禁。”

被盘问是我这段期间的第二种经验。和库隆一样，在审讯中我什么也不说。法官只能永远重复着我是犹太人，我必须离开波兰。他们总是说“米奇尼克先生，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我回答道：我是想去，但是他们必须先去莫斯科。”

判决是在一年之后。主要的指控是朝向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的；第二才轮到我。我被判坐三年牢。这并不是很多，我本来以为还要严厉一点。

邦迪：这是在 1969 年？

米奇尼克：是的。我记得在我监禁期间，法官对库隆十分恼火。因为他总说自己是犹太人。这让法官厌烦到了极点。根据他们的说法库隆是由犹太人操纵的波兰人。但是库隆不喜欢被当作一个傀儡，因此他总是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犹太人，你们的警察太糟糕，连这个都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我的律师在第一次和我见面时，还说起你邦迪在监狱期间，想到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库隆—莫泽莱夫斯基”。

邦迪：这不太确切。我并没有说我要改名字，但是当法官问我的名字时——在审判中受审者必须报出自己的名字——我说我叫“库隆—莫泽莱夫斯基”。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什么，什么？……你的名字叫库隆—莫泽莱夫斯基？而你的名字叫科恩·邦迪。”

我回答说：“好吧，既然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还要问我？”

米奇尼克：波兰报纸谈及法国 1968 年 5 月时的腔调，常常令我感到惊奇。他们也用这样的腔调来写我们。其中最糟糕的一个记者是伊格纳西·卡莱斯茨基，他给 *Zycie Warszawy* 写的一篇关于法国 1968 年 5 月的文章中，称你为“祸根的犹太人”，他也这样称呼我。

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们为同样的事业而奋斗的原因。很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事情不是这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对西方愤怒的青年来说，是越南。但这只有在越共胜利之后，越南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之后，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不同。但是我在心里还是为 68 年 5 月保留一份柔软的地方。我经常和我的教授克拉科夫斯基争论：他感到这个运动有法西斯主义性格，而我感到的是另外的东西。

邦迪：他是怎样看西方学生运动？

米奇尼克：当他被任命接任阿多尔诺时，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的学生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不要担任此职务，因为他是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需要一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也写了一份公开信作答，他写道他并不想阻止教授和学生之间的阶级斗争。我认为克拉科夫斯基是对的，但是我也同情学生。

我坐了 18 个月的牢。对我来说这是一所大学。我学到了很多现实的共产主义：我是在其所作所为中观察共产主义，而不是在笑话中观察。以前我在理论上的了解，如今都变成了现实。我经常想起华沙流行的一则笑话：在一部名叫《我的奋斗》的反法西斯电影问世之后，莫查尔和哥穆尔卡在谈话。哥穆尔卡问莫查尔：你看过《我的奋斗》这部片子吗？回答是：“小说要更好一点。”哥穆尔卡说“电影的改编通常不如小说好。”牢里的 18 个月，也是非常特殊的共产主义经验。我开始想在共产主义内部基本的关系不是阶级冲突，不是不同阶层的斗争，而是被关押者和看守之间的关系。

被指控的罪名有两点。第一，我是一名秘密组织的成员，这只是一个谎言。我从来就没有属于这样一个组织，这样的组织甚至不存在。后来在团结工会期间，我倒是属于一个肯定是地下活动，但是在当时这并不存在。第二个指控是我与波兰有敌意的外国组织有联系，并试图从事对于波兰有害的活动。这项指控至少判 5 年刑期。这个可疑的组织叫 *Le Monde*，其代表人物其记者伯纳特·冯古伊里特，为这次会面我得搭上 5 年。

现在我得感激为我捏造了这些行迹的人们，这让我学到了许多东西。监狱更加坚定了我的原教旨共产主义倾向：我对自己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我感到波兰是我的祖国，而我是这个国家的爱国者，不像他们：他们背叛了波兰，而我捍卫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履行了这个诺言，但我尽所有自己的力量去做。

1969 年 9 月我重获自由。此时正在掀起一股狂热的移民潮，而我的许多朋友却留了下来。我的双亲催促我离开。我父亲说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原谅我所说过的话。我曾说过仅仅因为我在牢里，所以我不能参加大规模的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游行。而当法官问我为什么在坐牢期间拒绝作证，我回答说，这审判除了想搜集某个共产党人的材料，没别的（我心里想的是爱德华·奥恰 vii，而不是库隆。）我深知斯大林分子审判的作用，所以我拒绝作出说明。

我从中学起就认识爱德华·奥恰的女儿，我帮助她复习历史以便通过考试。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奥恰被问道，是否米奇尼克真的帮助过他女儿准备考试。奥恰和我父亲在战前一同坐牢，牢房里的友谊是神圣的。他很生气并且答道：“米奇尼克是帮助过我女儿的历史课，他做得很好。”此后不久，他就辞职了。

在监狱里，我有机会读到哥穆尔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讲演；我推测自己会在牢里呆上 8 年。你会说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当我读到《古拉格群岛》中的句子：“感谢监狱，它造就了我”，我完全理解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意思。如果我没有坐牢，我也许现在是像米·拉科夫斯基或者耶日·乌尔班那样的混蛋。18 个月之后，我成为一名工厂的工人。

邦迪：为什么？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做别的事情太难？

米奇尼克：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想继续学业，我必须在罗莎·卢森堡工厂干两年钳工，这个工厂生产电灯泡。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最先爆炸的灯泡是我造的。

因为波兰是由工人阶级统治的，于是我对自己的说：天哪，我终于有权了！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我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和工人阶级打交道。

邦迪：那么这个阶段也可以被称之为你的被迫的毛分子的阶段？

米奇尼克：不，不是毛分子的。

邦迪：被迫的毛分子！你被送到工厂，正像文化革命期间一样。

米奇尼克：他们认为这必然是一个伤害的办法，但是他们想错了。罗莎·卢森堡工厂的劳动力基本上是由女性组成，华沙最漂亮的女孩。我在她们中间非常受欢迎，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更好的地方。1970年12月我住在这个工厂，我支持和组织了一个抗议活动。尽管不是政府的意愿，但是他们把我送到了这个工厂，实际上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党的报纸攻击我是一个煽动者，我的同事们却通过一个决议，把我选为团结工会罗莎·卢森堡分会的荣誉会员。

这是在1981年5月，这个工厂举行了一个大型游行，纪念1968年5月事件。

“格鲁沃德爱国者联盟”，这个经常称我是试图控制工人的犬儒主义犹太人的组织，也参与其中。工人们站出来要他们离开，并说“他（米奇尼克）曾经和我们一起工作过。整整两年，他教会我们保护自己和组织抗议游行。他属于我们，我们希望他来代表我们、与我们说话。因为他不像你们是苏联的代理人。”多次这样的时刻，我对自己说，你这一辈子没有白过。

邦迪：在你和工人之间，一开始就这么直接融洽，还是经过了一个怀疑的阶段？

米奇尼克：怀疑？从来没有。这是因为生性羞怯。但是在不管是好色之徒还是政治的道路上，我从来没有迷失过。

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也在这时候重获自由。这已经是1970年12月。哥穆尔卡已经由爱德华·盖莱克接替。我又返回波兹南继续我的学业。盖莱克决定这是一个稳定化时期。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反对派运动，我们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定的联系——是不同于此前的某种新东西。

邦迪：谁是“我们”？

米奇尼克：库隆、雅纳克·里辛斯基、塞维里·布鲁姆泽塔杰、莫泽莱夫斯基。这也是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组织之间首次出现的个人友谊。

邦迪：你是指工人的反对派？

米奇尼克：不，工人反对派此时尚未出现。我视作朋友的那些工人们她们倾听我说，借阅国外出版的书籍等等，但是并没有从中产生出政治行动。当然，也有例外，1970年12月的罢工我曾经为此写过一个决议。瓦文萨总对我说：“你应该了解，因为你做过两年钳工。……”这期间的反对派是由知识分子和为了知识分子而组成的。

也是在这期间，我成了斯沃尼姆斯基的秘书。他是具有道德权威的伟大的波兰诗人。他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反对派，但是也能为政府所接受。

我和斯沃尼姆斯基的关系是无价的，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他教会我波兰知识阶层传统中的方方面面。第二，他帮助我解决了身为一个波兰犹太人的问题。第三，他像一道屏障保护我。在我给他当秘书期间，我享有某种赦免权。我并没有富有自我牺牲到这种程度——如果我被逮捕却无人知晓。我父亲经常对我说，他了解共产主义俄国，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囚犯可能失踪，“就像被大地所吸纳”。我想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落到我头上。我不想仅仅是消失。我想要戳穿他们的喉咙。所以我对父亲说，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被抓——它会升级为一个丑闻。我说到做到。

盖莱克于七十年代期间在国外有一个不错的形象。吉米·卡特，包括他之前

的尼克松和福特都喜欢他。德国汉密尔特·施密特总理如此喜欢他，乃至想要带他进入自己的政府。甚至吉斯卡尔·德斯坦也欣赏他。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他。结果表明我们是对的。现在当我想到汉密尔特·施密特说想要盖莱克当他的经济部长，我为德国人庆幸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当时组织了哪些反对派活动？我们将思考政治的人们聚到了一起，和组织了不同的行动。在早期秘密研讨中，我们阅读的是托尔斯泰、保罗·斯维奇、奥斯卡·朗格、卡尔·马克思和卢卡奇。在后十年内我们阅读的是米沃什、Herling-Grudzinski 和汉娜·阿伦特。我们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而是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也和天主教圈子建立了最初的来往（你的朋友斯泽谢托夫也在其中）。我们再一次询问自己：教会真的是我们历来认为的反动力量吗？在波兰谁是真正的反动派？是天主教徒还是民兵？带着这些问题，我写了《教会与左派》一书。我试图将反神权的、世俗知识分子和天主教徒糅合在一起。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对波兰的教会有很多同情。我的女朋友巴莎，为此挑剔我，不让我去教堂。她认为我少和教会直接接触，对我来说更容易喜欢它。在这个意义上，她并没有错。我也这样认为。

邦迪：你们怎么讨论，以一种世俗左派的眼光？一方面，教会谴责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它坚决反对避孕和堕胎，乃至全部教会传统的道德支柱，你们怎么看？所有这些如何构成你们讨论的话题？

米奇尼克：当然我们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一旦教会对这些事情采取适中的方法，每件事情就都不成问题。

邦迪：你说“适中的方法”是什么意思？

米奇尼克：当教会仅仅是对天主教徒这样说：“你们不能离婚，不能流产”，如此而已，那么不成问题。这不同于将违反天主教戒律的行为提交法律诉讼。

邦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争论。例如在西方，教会十分希望将流产的人判坐牢；要求流产的妇女接受审判和被判有罪。教会仍然保留已经取消的这种法律形式。

米奇尼克：这是可能的。我想在这里，天主教徒将会为了离婚和流产的权利而投票表决。如果有人并不想离婚，那么没有人能使他们这样做。离婚的权利并不是强制离婚。说每一件不被禁止的事情，便是强制人们要这样做，是极权主义的哲学。这是荒谬的。

邦迪：我希望你会有足够的自由与天主教会公开讨论道德和社会问题。

米奇尼克：在波兰这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教会说天主教徒不可以离婚和流产，但是天主教徒们并不向教会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团结工会期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些将十字架挂在工会门口的人们，在决定是否罢工时，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而非主教。波兰的大主教吁请停止罢工，但是天主教徒们却聚集起来坚持罢工。

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权力而非一个超越的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基督教的力量就在于，教会教导人们只能跪在上帝面前而不是世俗权力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基本上是反极权主义的。

邦迪：这仅仅是在一个世俗极权主义中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极权主义利用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在教会内部存在着分裂。智利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在比如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以及纳粹德国。庇护六世曾经在希特勒面前下跪。

米奇尼克：不是庇护六世而是庇护十一世。情况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典型的

左派的荒谬。我并不是一个庇护十一世的辩护者，但是说他是亲希特勒的，你就欠揍了！……谁写了 *With Burning Intent?* viii

邦迪：庇护十一世并没有责骂希特勒。他一点也不像这里的教会可能成为反极权主义的一个堡垒。

米奇尼克：你对波兰教会的估计太乐观了。它也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邦迪：我并没有想在现在谈论波兰教会。

米奇尼克：如你所希望的。……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和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第一次会面。这非常有意思。他们看待我们如同贝利亚和斯大林的代理人，而我们视他们如同托尔可马达的宗教裁判所 ix。但是，过一会儿之后冰雪开始融化。他们开始阅读我们的文本，我们也阅读他们的。我们意识到互相之间有许多共同点。这应该是那些年内最重要的事情。正如民族社会主义结束了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传统冲突一样，共产主义也取消了在反神权的、世俗知识分子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是富有敌意的两个世界。

那段期间只有天主教报纸能够发表我的文章。塔杜施·莫泽维耶茨基只有用一个笔名在 *Wiez* 发表文章，鲍格丹·采维斯基在其杂志 *Znak* 发表库隆的文章。

我们开始发现基督教文学：阅读迪特夫里·鲍亨沃耶费尔（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他解释了如何当一个反极权的基督徒。

也是在那时候，库隆会见了斯·维辛斯基红衣主教。我鼓励他这么做。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库隆承认自己当了许多年的教会的敌人。

我们是“59个签名”的促进者。但是一半签名者来自天主教阵营，而另一半来自世俗阵营，这带来全新的形势。不久之后，我们写了更多的信，为改变先有制度而斗争成了所有波兰知识分子良心的事情。

而此前，人们不喜欢表明他们认得库隆和我这样的持异议者。我们不去人们家里，因为他们担心警察会随即而至。他们试图把我们限制在反对派隔离区之内。

这些信件证明了我们不再是孤立的因素，像斯沃尼姆斯基、安德热依维斯奇、赫伯特都参与了写信，与我们一道在上面签名。这种新的氛围使得我们反省 1976 年拉多姆事件时我们自己的态度。

你必须知道，知识分子受一种复杂的情绪所折磨，这也就是他们在 1970 年 12 月工人流血时保持沉默的原因。如果我能够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当时不是一名知识分子，而是一名“工人—持异议者”的杂交品种。最终这些都有了结果。在 1976 年拉多姆和乌尔苏斯事件之后，随后而来的是工人的游行和被羁押，库隆宣称我们都再次背叛了工人，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他是对的，我们说到做到。

这就是“保护工人委员会” KOR 的建立。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

我记得 1976 年参加一次关于乌尔苏斯的审判；我听到了不公正的判决。我看妻子们在哭泣，感到巨大震惊。我意识到丢下这些人不管是不能允许的。我很快写了一封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抗议信。这是知识分子第一次站出来承担工人的事情。接着，库隆写了一封公开信，我所属的一个小圈子起草了一封给西方知识分子的呼吁书，要求捍卫波兰工人权利。这个文本出现在 *Nouvel Observateur* 上面。海因利希·伯尔 x，君特·格拉斯 xi、依纳齐奥·西隆尼和索尔·贝娄和其它人都做出了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事情不得不改变了，于是 KOR 诞生了。这是 1976 年 9 月。当时我并不在波兰。很难解释我为什么这时处于局外。我接到了保罗·萨特去法国的邀请。而当我去办官方护照时，每个人都说我疯了，我不可能有机会

得到护照。但是这个疯子很幸运。拉多姆事件之后，政府推测我在巴黎要比在华沙较少危险。他们给了我护照。库隆被收编到部队里去。他们想用这种办法让我们变得无效。库隆对我十分埋怨，他视我的离开为背叛。也许他是对的。但是我一到国外，就拼命做每一件事情，使得自己的行动不可能也不会被视作一种逃跑。一到了西方，我就像疯子一样行动，没有一个想要回东欧的人会那样做事情。此时没有人认为我想回波兰。鲁迪·杜泽克对我说，我是一个白痴；吉瑞·派里坎称我为一个痴呆……

邦迪：你在国外都干了些什么？

米奇尼克：我与人会面，参加游行，不记得了？你邦迪也在嘛。在我之前没有人敢作这些事。但是我感到自己必须像一只活生生的水雷，像一个敢死队队员那样去行动。因为我要向库隆证明，我不是一个逃兵。我和左派成员谈话，这是一件新鲜事。因为通常参与反共产主义行动的人，他们和反共产主义的右派打交道，而我却说：“我是一个左派，想和左派的人们交谈。我希望他们采取行动。”

于是我和鲁迪·派里坎、吉安卡罗·帕杰塔以及劳动联盟的人交谈，我也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交谈，我会面了本提诺·葛兰西，我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意大利的工人是否准备帮助波兰工人，是帮还是不帮？”

因为我的头脑配置是一个 1968 年的左派，所以对我来说很容易和布鲁诺·特莱订交谈，他是意大利钳工联盟主席和一名共产党员。

在罗马我会面了维辛斯基红衣主教，我问他我是否要和意大利共产党人谈谈波兰。“当然”，他回答道。不幸的是，主教的担保并不管用，当我回到波兰，非 KOR 的反对派即谴责我是一名共产党人。

在西方的时间让我更多地理解西方的左派。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左派，一个西方左派。与此同时，我知道在波兰存在着更重要的区分。当我被问及 KOR 是左派还是右派时，我给予两种答案。一个是援引弗拉迪米尔·布科夫斯基所说的：“我们既不是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右派，我们来自集中营。”第二个是从皮特·凯利那里借来的：“我们是全新的。”

邦迪：她说的是“我们是超前的。”

米奇尼克：她也说过“我们是全新的”。或者也说过如你所说的，不记得了。无论如何，基本的理念是，这是某种全新的东西。此时我也意识到在西欧和东欧之间存在着悖论。我这一代的人们，经历了 1968 年的人们理解我，但是他们并不打算站在东欧的立场上来；他们想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但是与我同行的那些著名的来自东欧的人们，诸如布科夫斯基、安东尼·莱姆、鲁迪·杜泽克、沃尔夫·比尔曼对此并不十分敏感。我不知道今天他的情况怎么样？

邦迪：你们还是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你们对待女性的态度。

米奇尼克：我对待女性的态度有什么让你感到不安的吗？

邦迪：不，只是某种类似显而易见。我喜欢沃尔夫。

米奇尼克：我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是知道被警察监视是什么滋味的人。我们很处得来。“青年社会主义”当时的主席约索斯是怎么回事？

邦迪：他是一个秘密共产党员。

米奇尼克：真的？我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对他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的区别。他视我为汉密尔特·施密特自由社会联盟坚决的辩护者，而我对此的主要批评在于与东欧的关系。维利·勃兰没有勇气见我，他想这会伤害到与盖莱克的关系，我相信他是对的，而他对我的态度令我想了很多。勃兰特害怕会见一个 KOR 的代表，使我

意识到 KOR 只能指望自己，并且说到底，波兰人民也只能指望他们自己。

甚至即使波兰人被雅尔塔条约出卖，也没有人站出来要帮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和西方的持异议者有着悖论的联系。两者都想要瓦解雅尔塔条约，但是出发点完全不同。我想有两点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第一，援引切·格瓦拉的话来说，即“如果世界是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死在自己的床上”；第二，我们都不想要雅尔塔条约。

邦迪：不幸的是，为了相反的原因，许多西方的左派想要废除雅尔塔条约时，并没有对其东方的部分提出质疑。

米奇尼克：是的，我们感兴趣的正好相反。当时我十分相信芬兰化。如果欧洲都要芬兰化的话，那么为什么不从东欧开始？于是我考虑在波兰进行这种试验，建立一个议会政体来取代共产主义制度。

邦迪：自我限制的独立？

米奇尼克：是的，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在这之后，我们可能与西欧对话。但是很少有人相信我。吉安卡罗·皮杰塔告诉我自由是相对的，英国的自由完全不同于塞内加尔的自由。他也说到了对波兰来说，没有比模仿西方更加危险的了。

邦迪：皮杰塔后来没有这么说。

米奇尼克：我对他说，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意大利共产党执迷于苏联。当时我在克拉科夫斯基家里，他告诉我，他曾经做了 8 年纳粹的牢。克拉科夫斯基问他：“那么你是在牢里得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 xii 的了？”他回答“是的。对我来说，接受这种东西很困难，但是我还是希望红旗飘扬在柏林上空。今天的结果就是如此。”我加上一句：“它飘扬在铁丝网的上空。”

整个旅行对我来说是有意思的。对我震动最大的是与海因利希·伯尔的会面。和所有波兰人一样，我有点排斥德国人，难道不是德国人曾经把波兰变成集中营？尽管从理智上我知道不应该是反德国人的，但是感情上难以抑制。谢谢海因利希·伯尔，他让我开始喜欢德国人。在我们会面期间，他告诉我，他会在任何时候帮助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的工人。西方没有人像他这么立场鲜明地表达。他说到做到。任何时候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他总是出现。当他去世时，我却在牢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我没有机会为了他所做的向他表示感谢。

我回到波兰是 1977 年 5 月。准确地说，距今天整整十年。克拉科夫斯基在我离开之前的前一天晚上从牛津给我打电话，问我：“明天你就就要走了？你感觉怎么样？”“这就像第一次做爱的头天晚上”。“那怎么样？”他问。“我不记得了。”我答道。

当我回到波兰时，许多人都前来欢迎我：一些朋友、知识分子和持异议者，也有令人难忘的警察和民兵。

在我回来之前，KOR 已经视我为一个成员。当我在西方时，我并不想成为其中一个成员：因为我在西方所说的话，仅仅涉及我个人（而不代表 KOR）。但是，事实是我已经是一个成员。

当我在巴黎时，库隆让我带一个油印机回来。我想他是疯了。这玩意儿在波兰我们把它藏到哪里？是他的住所？还是我的？……

我刚回来时，完全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一头雾水，难以接受。已经发生了某种氛围的变化。KOR 在爱德华·利宾斯基教授家里举行会议——他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传奇人物。1905 年，当盖莱克没有出生时，他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盖莱克不能把他怎么样。警察也不可能进入他的家里。某些事情改变了。对盖莱克来说，他十分想给那些外国元首等人留下好印象，于是

他也不想再抓人。这给了我们一定的自由，我们充分利用了它。所有人都对我们说，我们是在做梦：“你们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之内不可能有反对派。”我们回答道，尽管不可能，但是我们已经存在。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是“代理人—内奸”，我们反问：我们受谁挑唆和为什么受人挑唆？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与中央委员会的某一个派系在合谋。对此，我们问道：哪一个派系？我们被告知这个派系是存在的。我们问，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回答，如果没有这个派系，我们便不能存在。事情很清楚，这像是笛卡儿的逻辑。

我有两个星期的自由。我回到波兰是5月2日，两周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便被捕了。我们的被捕与发生在克拉科夫的事情有关。一个叫做斯坦尼斯拉夫·皮杰斯的学生，也是KOR的一个合作者被杀害了。我们去克拉科夫参加他的葬礼，我们的车被拦截了。一直到7月23日，我才重见天日。从巴黎回来直接进监狱，在我是一个恐怖的经验。在我回来之前不久，我与玛丽安·格拉芙·迪奥霍夫在汉堡有过一场谈话，主题是“我在波兰的位置”。我说，回波兰因为那是我的祖国。迪奥霍夫是个非常好的人，她问我想让她问的那些问题，我的回答也已经口授给她了。从她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姿态。Die Zeit是一份十分严肃的报纸，但事实仿佛是伯爵夫人私下里会见了一个像我这样不严肃的人。

在我坐牢时，访谈发表了。警察盛怒。尤其是我说到政治和经济的交流，有待于波兰政府的人权记录。在整个侦讯中，这个访谈成为整治我的一个借口。我被说成是想要饿死波兰人。“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要饿死我的人民？我想要的是波兰政府尊重人权，这是它答应了的。”警察回答道：“米奇尼克先生，你十分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波兰政府不可能尊重人权。”我回答道：“这话只有你能说。如果我说的话，就要被指控为诽谤国家。”

我已经三次入狱。我对自己说：事不过三。但是古话并不能阻止我必须在牢里再呆上三年。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使得我完全被KOR的成员所接受。此时的氛围十分特殊：一年到头，人们总是要在牢里呆上48个小时什么的。而这时，我却在巴黎、罗马、汉堡和伦敦喝香槟。没有人喜欢有人在别的地方喝香槟。因此，就像我此前不得不为自己离开波兰而辩护，现在我不得不为自己呆在国外喝香槟而辩护。我不想跟你谈KOR的细节，你可以去阅读里普斯基写的书。我只想告诉你KOR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一种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这时候人数不是很多。KOR大概有两千人左右。但是后来发展为团结工会的上百万人。

这种现象基于某种原型。某种在后极权制度之内的政治反映模式，一种公民勇气的模式和独立机构的启示。这并不容易。

每两周我要在牢里呆上48小时。最坏的不是在牢里的时间，而是等待去那里；我们知道我们将要被投入牢房，但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种糟糕的情况毁了我的性生活。我不可能算好日子，事情刚刚有些眉目，我就要在牢里呆上48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喜欢共产党人？

实际上，1980年8月（团结工会）之父是库隆。自从在KOR里，我主要是与知识分子联系。我为地下报纸写作，在“飞行大学”里工作，还忙活一个地下出版社。我不再和工人发生联系。在1980年8月之前，我只见过一次瓦文萨。

我根本不喜欢他。他看上去野心勃勃和聪明伶俐。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事情是发展的，最终我和他好得不得了，厌恶转变成了爱。

说实在的，库隆是 KOR 唯一一个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人。他总是在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危机，而我总是同意他。但是当他把下周就是那个危机说了三年之后，我不再理他。他的预言令我厌烦。

当 8 月来到时，我并没有想得很多。

库隆决定取消每一个人的假期，因为大事件已经发生，那是 8 月初。再一次，我懵懂无知。当卢布林举行罢工时，我在山上散步甚至没有听说它。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之内反对派生活的文章。三年以来我第一次发现有东西可写。我准备写 8 页纸，对共产党人、反对派、KOR 做一个总结。但是 8 月的事情来到了，我的文章也扔进了垃圾桶。

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库隆问谁想去格但斯克，那里的罢工已经开始，是由我们的一位朋友也是 KOR 的一个成员鲍加·波鲁塞维奇组织的。我自愿前往，因为我对自己呆在山上而没有参加工人运动感到愧疚。库隆接受了，他相信我。

库隆和我都担心格但斯克人们的要求。我们发现一种独立的和自主的联盟，在实践上是过分的和不理性的。我们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这是行不通的。于是，我们前往格但斯克是要去解释，工人们不可能坚持他们的要求。因为人人都知道我，我也许有一个机会说服他们。

幸运的是，我又被捕了，所以我没有能去，我没有说服他们，团结工会产生了——在没有我们并且反对我们的情况下。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仍然相信团结工会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是非法的。

邦迪：从政治和社会的立场来看，后来的 16 个月如何改变了你？团结工会给你留下了什么烙印？了解你在 1981 年 12 月 13 日之后的所作所为是很重要的。

米奇尼克：在法国工作的著名的波兰遗传学家皮奥托·斯沃尼姆斯基曾经告诉我，生活在 1968 年 5 月是一个恩典的时刻。对我来说也一样。团结工会的时代是一个恩典的瞬间。同时也是一个有关尊严、自由、正义和受苦的学徒期。也是我的收获期。我参加工人们的集会，他们鸣掌欢迎我。我要说它塑造了我，就像 68 年 5 月塑造了你。为了这 16 个月坐 6 年牢是值得的。

邦迪：你对工人们说什么？

米奇尼克：许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对他们说，波兰社会正在自我组织，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拥有者，这个国家是他们的，工厂和国家都属于他们，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和掌握这个国家。你认为这还不够吗？

邦迪：不。

米奇尼克：我们也对他们说，我们会保护团结工会直到最后一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出卖他们。我们说到做到。我为自己没有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出卖团结工会，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不会出卖它，因为波兰需要它。如果说有人说，团结工会完蛋了，这就如同说波兰完蛋了。只有团结工会能够代表真正的波兰。

我不能客观地谈论团结工会，因为我离它如此之近，如此为它所感动。

邦迪：我并不是要你客观地谈论它，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谈谈。你的作用是什么？除了偶然地在集会中的演讲而外？在日常生活中……

米奇尼克：我属于一个反对瓦文萨的小圈子。我感到他要把一种狂暴、专制式的东西强加给团结工会。当我想要让他令人厌烦，我便在团结工会的院子里读到一篇文章，叫做“围绕斯大林的争论”。这篇文章编造了一个工人领袖的故事，

他正在变成独裁者，尽管他是讨人喜欢的，一个爱孩子并且有许多孩子的可爱的男人，长有一把大胡子和抽烟斗。换句话说，我想要把瓦文萨变成新的斯大林。

邦迪：工人们怎么对此反应？

米奇尼克：他们喜欢我的故事。瓦文萨是个重要人物，但是我也是。他十分受欢迎，但是他也招人恨和有敌人。我是属于安德热依·格维亚兹达这一派的。我感到瓦文萨允诺共产党人太多，而最终要出卖团结工会。12月13日之后我每天期待我的怀疑得到证实。当我意识到他并没有出卖我们，我对安德热依·格维亚兹达说（他在牢里和我关在一起）：“安德热依，看来我们要请瓦文萨喝一杯了。”

我出狱之后，抑制了自己的骄傲去卡诺沙看望瓦文萨。我们在位于索波特（Sopot）巴莎的屋子里见面。瓦文萨来到了，我们互相拥抱。我曾经是他最可怕的敌人。我对他说“我这辈子所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是误解了你。”他简短地回答：“我们别再提这件事了。”从那之后，我们好得像同性恋似的。

邦迪：不必再谈团结工会了。我可以想象得出那16个月的日子。接着是12月13日的军事管制。更早些时候，你发展出自限制的革命的理论。你刚才说，在1977年你相信从波兰开始芬兰化。在伟大的团结工会期间，你是否相信这个集合起来的反对派有朝一日变成合法的？你是否相信会有一个政治上的解决？

米奇尼克：不，我不相信会出现任何东西。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吧。有一个犹太人，叫摩西，他每天去教堂。他跪下……

邦迪：犹太人不跪下。

米奇尼克：你知道犹太人，我知道好玩的故事……他每天去教堂祈祷，说：“我的上帝，你多么残忍啊。我还没有在赌盘中赢得一百万，我妻子瑞蓓卡没有钱买新衣服。我的女儿莎拉没有钱买一部新的自行车。我的儿子大卫也没有钱买一辆小汽车。你多么残忍啊。”第二个星期五，他又去了，他说：“我的上帝，你多么残忍啊。我还没有在赌盘中赢得一百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教堂的屋顶忽然裂开一个小口子，有声音从那上面下来：“摩西，你给我一个机会，再买一张赌盘的票吧。”

我不相信，但是我买了一张票。我要给上帝一个机会。所以我并不为买了这张票感到后悔。但是上帝是公正的。因为我买了这张票之后，团结工会出现了。

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种政治哲学；这是我们仅有的机会，我们没有别的。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赢得一场反对苏联的斗争，我们的机会在于苏联并不想要出兵波兰——如果那样的话，波兰会变成第二个阿富汗。

所以我捍卫妥协、自我限制和调和的原则。而如果俄国人一定要占领这个国家，他们必须知道，这会让他们流血。我最近在读里泽耶德·库克林斯基上校的访谈，其中证实了我的想法。

邦迪：谁是库克林斯基？

米奇尼克：实施军管法的头头。库克林斯基说1981年的罢工给了俄国一个它可以入侵的信号。与此同时，我说我们唯一的机会是接受妥协，而不要刺激政府。罢工给了俄国人一个概念，他们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实施军管法。

邦迪：什么样的罢工？

米奇尼克：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会演变成一个总罢工，但是只有40%的人参加。

由于我不断强调如果俄国人入侵的话，就要发生流血事件，我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分子。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发，但是我感到事情必须如此表达。但是事实上，我是如此温和，并不极端。和瓦文萨不一样，我认为实施温和的政策，并不

等于和共产党人暗中谈判。我相信温和的政策必须被了解和被团结工会接受。而这只有在整个运动了解苏联领导人的政策以及团结工会认真担忧苏联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出妥协的意义。

在最后几个月内，差不多是 1981 年 8 月之后，我感到自己成了团结工会的局外人。我成了瓦文萨公开宣布的敌人，库隆也是。我不理解他们的政治，我认为他们在不顾一切代价寻求妥协，而对我来说，这个代价不应超出我们不能付的，付代价不等于出卖。

12 月 13 日如同一个解放：我又一次和团结工会达成一致。

邦迪：对你来说，这个代价是什么？

米奇尼克：我担心我们会接受屈服于共产党人，团结工会会变成现存结构的组成部分，变得和过去官方的工会难以区分。我担心所有对团结工会提出的批评，都会变成笑话。我担心“真正的波兰人”会接管团结工会，这个“真正的波兰人”是一个小团体，其主要目标在于反对 KOR。他们用一种从纳粹那里借来的语言反对我们，诅咒我们是犹太人、托派、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有这些令我忧虑。我也担心，瓦文萨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谴责这个小圈子。很长时间我都在与瓦文萨唱反调。

邦迪：为什么他不去反对这些人？

米奇尼克：因为他视自己为整个运动的领导者，而这个小团体属于这个运动。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导人，而我是一名独立的知识分子。我承担这种责任并尽可能这么做。但是我非常理解，这在某些时候对瓦文萨构成了问题，尤其是政府也要求他和我们保持距离。对于 KOR 成员的排除，是和政府达成一致的一个前提。但是瓦文萨并没有咒骂我们——你应该记得，他只是要让我们出局。

邦迪：团结工会、或者说团结工会的经验，有没有改变你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乌托邦政治立场？

米奇尼克：我不认为有什么乌托邦的概念于其中。团结工会是一个反乌托邦的运动，一个没有乌托邦的运动。唯一的乌托邦是十戒和福音书，除了戒除通奸。

我想团结工会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新东西，我指的是它超越了乌托邦的思想，创造了一种实践的思想。后者建立在相信一个简单的理想的社会，但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团结工会为了一个本质上不完美的公民社会而斗争。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 12 月 13 日之后在牢里写的所有东西都在捍卫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不应该为一个完美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而斗争，而是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冲突在民主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解决。

作为一名 1968 年的老兵，当我现在问自己，我是否坚持对自己保持真实，回答是肯定的。我忠实于自己反权威的理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也反对瓦文萨，因为我想到，瓦文萨要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团结工会之上。

在一次私下见面时，瓦文萨对我说：“你知道，亚当，我佩服你。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而又不得不与像我这样的家伙打交道，我会拧断这个人的脖子。你是圣徒。你没有这样做。”

瓦文萨后来改变了，我也是。他变好了。而我呢，我不敢说。

邦迪：你先头说，在 12 月 13 日之后，你与团结工会和解了。我有一个感觉，在你的反对派活动中，在你的行动中，在你的坚定不移、你的身份同化中——用基督教的一个隐喻，你像一个殉道者。一个目光坚定的忠诚的殉道者。而在 12 月 13 日之后，你的行为应该说是有点严厉。

米奇尼克：我不喜欢“坚定不移”或者“殉道者”这些字眼。在这种角色中我感到不自在。如果有人把它们套在我头上，这是一种伤害。但是在你所说的当中，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如果你捍卫一个理想，你就要用行为来使它得到实现，你相信它，就要让它得到见证。康德说一个人必须始终如一，于是他就那样去做。当涉及价值秩序时，我不是始终如一的，因为我知道有冲突的价值存在；但是涉及我本人时，我是始终如一的。我的朋友和老师、伟大的波兰诗人赫伯特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在两条路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你必须总是选择困难的那一条。”

邦迪：用一个犹太人的笑话来说，“如果你只有两种可能性，那么选择第三种……”

米奇尼克：我选择了第二种，更为困难的那条。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如果选择了第一条会怎样，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做的。我也知道如果我选择了容易的那条，我会觉得有罪。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是我的责任——向团结工会提出妥协的方案之后的第二天，便是 12 月 14 日，这时候已经很清楚，我那样做并不是为了使得自己避免牢狱之灾。这种想法反映出某种生活哲学，也是政治哲学。我真实地相信，一种严重的对立在波兰会是一个悲剧。另一方面，我想劝说人们我是无私、没有什么可图的。于是我选择了面对我自己，呼唤一种政治妥协。

1983 年 12 月，基什查克部长，警察头子，把我妻子巴莎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她提出劝说我去国外。我有在里维埃拉 *xiii* 过圣诞节和再次入狱过上几年的两种选择。作为回应，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因此整个波兰人民都爱上了我这个属于小圈子的知识分子。

在我牢房的角落里，我写道：“我知道，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会选择里维埃拉，但是，这就是我和你们的不同：你们是猪，而我们不是。我爱波兰，甚至在我的牢房里也爱。我不想离开波兰。所以请别打这主意了。”

这封信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在圣诞节晚上播出，在节日的气氛中，波兰人听到了这封信。从此，没有人再说我是犹太人，因为我忠于波兰、服务于波兰。

邦迪：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你的这种态度变成一个负担？你在牢里呆了多长时间？

米奇尼克：6 年。

邦迪：从 1981 年 12 月 13 日起？

米奇尼克：晚一些，实际上不到 6 年。先是 2 年加 8 个月，后来是一年半；一共 4 年多一点。

邦迪：你不会时不时感到有些厌倦吧？你有没有抵达你个人的限度，我的意思是在那种环境中一个人所能够承受的限度？

米奇尼克：我因祸得福。在牢里我写了 5 本书。监狱使得我成为一个作家，在波兰受到称赞，在国外被翻译。我还抱怨什么？每个人现在都有点厌倦了。不必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的人，是不会感受到这一点。是的，有时候我感到疲倦。

邦迪：那么现在，你是否生活在再次被抓的恐惧之中，或者比起监狱来，你目前有一个相对自由但是十分真实的空隙，可以用来做点安排？

米奇尼克：你不能和命运讨价还价。我感到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幸运者。我有一个漂亮妻子，我写了几本书，我感到自己被我所爱的人而爱。为什么要制定计划？我唯一考虑的是——自己行得正，其余都交给上帝。

邦迪：“行得正”是什么意思？

米奇尼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至于其他，我相信上帝，那是他的事务。

邦迪：你还在买你的赌盘的入场券吗？

米奇尼克：是的，我每天都在买。这是我的哲学。

邦迪：最后一个问题是……

米奇尼克：为什么说是最后一个？你问的问题越多，越能激发我。这很好，因为我很少有时间谈论自己。

邦迪：昨天我们散步时，你说过这有点奇怪——凡是从 1968 年过来的人，不管拥有怎样不同的和互相抵抗的政治观点，都感到互相接近和倾向于表达他们的团结。你看，汤姆·哈代，他现在是美国民主党的核心人物，还有鲁迪·杜泽克和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彼得·乌尔，苏联的布科夫斯基……你怎么解释？米奇尼克：你说呢？

邦迪：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说你在大学里的行为、你的反权威的学徒期，对我来说都十分有意义。

米奇尼克：是的。在这个上下文中，用“反权威”这个词是一把钥匙。我们反叛不同的权威，其公分母是造反的感受。这一代人有一个历史机遇。我们可能抓住它也可能失掉。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抓。我们很幸运，可以对波兰的人们说起像邦迪你这样的人，而邦迪也有机会帮助西方人了解像库隆这样的人。帮助互相了解并不意味着你只能同意或者只能喜欢，但是你的确试图在理解。说到底，你也需要把其他人激情翻译成你自己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的语言。

如果我们不去互相联络，那么极权主义就在这里和你的国家赢得了优势。

邦迪：我只可能对我自己说话，我想共同的语言、激情的存在要过许多年和经历许多战斗。即使我们是在不同的水平上作战。我刚才说了在西方你是我最欣赏的这一代人的成员，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像你在波兰那样行动。我太热爱生活以至于不能面对坐牢的威胁。

但是你开始于反权威造反的经验，从六十年代到现在，我想到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从负面来说，是反权威的情感；从正面来说，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富有激情的民主的概念。

米奇尼克：我从来没有想要在监狱里写作，这是被逼迫的。但是一个绅士必须始终做一个绅士，甚至是行走在屎尿中。所以，在这里，我保持了作为一个绅士。这不是因为我想要这样做，而是我必须这么做。我是一个理性的人，理性的需要超过了趣味。我像你一样热爱生活，殉难者的角色一点都不适合我。12 月以后，当政府建议我们到国外去时，我的朋友中有一些人的确认真地加以考虑；但我从一开始就坚持我绝不离开。库隆也没有离开的意图，但他觉得值得谈论它。当他们把他带入我的牢房时他说：“亚当，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想想这个？”我说：“如果他们把你放到 Anders 将军的白马上，整个国家都在盯着你，你心跳得无法说谎。特别当你是个犹太人的时候。”

反权威和反极权是我们这一代的机会：它是联系东方和西方的纽带。

注释：

i 1943 年 4 月 13 日，德国纳粹宣传部长宣布，德军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一座万人冢，里面葬有 4 千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德国军事当局提出的调查报告宣称，这些波兰军官在 1940 年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被苏军杀掉后埋在该地。事实证明，这的确是 1939 年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地区时所俘虏的波兰军官。而在德国人宣布两天之后（1943 年 4 月 15 日），莫斯科电台宣布，波兰战俘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区服劳役，1941 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

他们落入德国人之手，被“德国法西斯凶手杀害”。继而德国、波兰、苏联及国际组织（包括美国国会）派出不同的调查组，发表了大量的材料。苏联方面于 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政府承认这是“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为”。1992 年，叶利钦政府向波兰方面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其中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40 年 3 月 5 日关于枪决 14700 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 11000 名波兰公民的决定。”很长时间内，波兰国内完全封锁了有关卡廷事件的调查。

ii Ewa Kulik, ,此次谈话的女翻译，比米奇尼克年轻十二岁，1982——1988 年曾是参加地下反对组织成员。——英译者注

iii Oder-Neisse boeder,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同盟国所制定的波兰与德国的边界。

iv Marlene Dietrich, 1904—1992, 美籍德国女演员，1930 年主演影片《蓝天使》一举成名，同年赴好莱坞拍片，在英国拍片期间拒绝为纳粹效力。

v Fassbinder, 1945—1982, 德国导演，同性恋、吸毒者，作品有《恐惧吞噬灵魂》、《玛丽安·布劳恩的婚姻》、《水手奎莱尔》《莉莉玛莲》等。

vi “For freedom-ours and yours”，这是波兰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句口令。——英译者注。

vii Edward Ochab, 此时为国家议会主席。——英译者注。

viii 此为庇护十一世的教皇通谕，关于教会和第三帝国，1939 年出版。庇护十一世 1876—1939，意大利籍教皇 1922—1939，同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条约（1929），同德国纳粹政府签订协定（1933），发表通谕谴责纳粹主义，鼓吹反共（1937），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公教进行会。

ix Torquemada, 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西班牙第一任宗教裁判官 1483—1498。任职期间以火刑处死异端分子约 2000 人。

x Heinrich Boll, 1917-1985, 德国作家，197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正点到达》，长篇小说《小丑之见》、《与一位女士的合影》、《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等。

xi Gunter Grass, 1927——，德国小说家，199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锡皮鼓》、《猫与鼠》、《狗年月》《比目鱼》、《遥远的年代》、《我的世纪》等。

xii 1939 年，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赴苏联，和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xiii Riviera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地中海度假胜地。

革命散记

亚当·米奇尼克
(1990)

译者注：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纽约时报》，1990年5月11日。在这篇面对西方读者的文章中，米奇尼克主要向世界介绍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深刻变革，是在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的背景之上完成的，他们是：萨哈罗夫、基斯和哈维尔等。

1989年岁末，共产主义时代走到了它的尽头。一度宣称代表着这个世界未来的社会制度，被埋葬在了罗马尼亚城镇燃烧的灰烬之中。无疑仍将有警察和军队的旧态复萌，无疑各式的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们仍将用他们虚幻的美好挑起人们的热情，用他们的诽谤挑起纷争。但是，这种“主义”已经死亡。就“共产主义”来说，它终于结束了。

1986年8月，我在波兰的巴切沃(Barczewo)监狱获释。我遗落了准备写一本有关纳粹的书而做的思考笔记，而就在我接邻的囚室里关押着耶里奇·科克(Erich Koch)，这个在战争时期曾身为东普鲁士的狗腿子的人，现在，将在波兰度的囚室中度过他的余生。

我在1981年12月13日被囚禁，当时，雅鲁泽尔斯基的共产主义政权刚刚实行了军管，镇压了团结工会。之后，除了中间有几个月的间歇以外，那些年我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对我来说，在监狱中的日子还不算坏。我写了几本书，它们被翻译成了几种文字。我还得了一些国际奖金。所以，当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毫无怨恨，在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望，充满了兴趣。

我发现，我的祖国正在发生某种重大事件，政府的镇压机制正变得越来越弱，可是，团结工会所建立的地下组织也是一样。而在苏联，体制正在摇晃并进行着缓慢的自我转型。那些曾在军管时期帮助过团结工会的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运用反苏联修辞学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描述这个世界。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时期的那些讨论，那些关于团结工会的存在的讨论。很明显雅鲁泽尔斯基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只是纯粹的表面文章。那么，是否应当利用这些改革中的一些有利因素，使得团结工会中的某些成分合法化，并试图着手组织一些真正的改变？当团结工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弱，变成了1980-81年那个风起云涌运动的一幅讽刺画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保持它的存在？

一些人公开背弃了团结工会的旗帜，另外一些则更为坚定地与它站在了一起，坚持它应当继续保持地下状态。还有一些人——他们被证明是对的——在示威游行时大声疾呼“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正是团结工会合法权利最终被承认导致了军事独裁的终结，并开创了民主转型之路。这些人认识到，只有当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公众视野之中的、活跃的运动，而不是一个地下的仪式，它才能够存在。

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团结工会最终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组织。这才使得1988年5月和8月的两次工人罢工，提供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的维度；也使得它能够坚持到次年二月与政府之间进行圆桌谈判；并寻找出一种妥协，使得最终选出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成为可能。感谢这一切，使波兰成为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国家。

这样的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团结工会的领导们能够理解发生在苏联变革的意义及范畴。他们懂得，这些改变，绝不仅仅是表面的，而是所有最深层危机的反映。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于将这些改变与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由于萨哈罗夫从流亡中返回才得以真正开始。

我只与萨哈罗夫谈过一次话，那是在 1989 年 10 月 16 日的深夜。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天的午夜，我就 43 岁了。萨哈罗夫和他好客、温和的妻子埃莱纳·邦纳（Elena Bonner），我们坐在他们莫斯科的公寓里，我感觉就像是在与经年的老朋友交谈；在只言片语中，在微笑里，我们相互理解。我感到我们仿佛已经共处了二十年，我们感受相同的希望与失望，相同的绝望与决心。

两个月后，当我和瓦文萨一起站在刚刚为挖好的萨哈罗夫墓室旁时，我回想起这些。我想到在萨哈罗夫二十世纪历史里以及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位空前三次被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属于俄国最精英阶层。

而他仍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人权的捍卫者——捍卫那些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遭奴役、受屈辱的人，那些自由的却身陷囚牢的人，那些健康的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因为被官方的谎言所笼罩而渴求真话的人。

萨哈罗夫让我们认识到人权是文明世界的基础。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战斗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价值。伟大的反极权的革命，它将人的权利刻写在它的旗帜上，火焰一样席卷了生养我的欧洲国家，它始于安德列·萨哈罗夫。

萨哈罗夫作风一贯——他捍卫所有的人，工人和农民，逃兵和移民，作家和画匠，犹太人和鞑靼人。他捍卫所有那些需要被捍卫的。他们称他为“俄国的良心”，人们说对了。

因为萨哈罗夫也是另一个俄国的化身：高贵的俄国，摆脱沙文主义的俄国，有着不凡才智和伟大勇气的俄国；对这个世界、对我的祖国友好的俄国。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那些维护极权秩序的人——国家机器、警察、谎话的宣传者——要在萨哈罗夫的祖国里批判他的原因。一些反共产主义者也批判他——那些试图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换为大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他被指为一个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天真的人文主义者，一个无国家观念的世界主义者。萨哈罗夫不赞成任何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还是掩盖在反共产主义外表之下的。他是一个相信欧洲民主政治的人，一个想要在他自己的祖国散播欧洲及民主政治价值的人。

人们也许会说，萨哈罗夫是把自己放在十九世纪俄国那场著名的论战中，找到了自己的立场。这是一场西方化论者和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进行的论争，是一场关于俄国是应当跟从西方的民主道路还是任由自己的专制传统自然发展的论争，后者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并以东正教派的习俗作为参照。这样的论争又一次在当代的俄国风行；事实上，它已成了这个国家里最重要的争执。而且，在东、中欧地区，到处都充满着它的回声。

我想那是在 1979 年 12 月，一队匈牙利人来华沙访问，他们中有一个高高的、黑黑的、身材修长的哲学家，我与他进行了彻夜的长谈。我们多少可以算是同宗：看过同样的书，在相同的价值体系中度过童年，都是 1956 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就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布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开始对他建立的体系进行初步改革。

我同扬诺斯·基斯 1 (Janos Kis) 的再次相聚是 1989 年，这次是在布达佩斯，为纳吉·伊雷姆 2 和他被暗杀的战友举行的葬礼上。纳吉·伊雷姆曾为匈牙

利的领袖，他在 1956 年起义之后被宣判处死，现在，33 年后，终于重获人们的尊敬。那时，基斯已开始了他多年的地下出版工作，已经写出了一些使他获得声誉的有关政治和哲学的优秀散论。他是匈牙利知识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匈牙利自由民主联盟的领导人。

基斯这个在年轻时代就将自己定位为左派的人，经历了中欧知识分子发展的各个典型时期。这样一些左派的价值始终是他思想的内核：理性主义、普遍主义的视角、反对盲目仇外、精神上的反对社会惯例。这些标准，引领他加入了匈牙利反对派，置被逮捕的危险于不顾。

对于包含“改革派”在内的共产党官员来说，基斯和他的朋友是最为危险的敌人，这毫不令人惊奇。他们的自由民主联盟代表着自由欧洲的政治文化。而与此同时，以“匈牙利民主论坛”命名的反对党，则被认为是具有“富有建设性”的，这个党在匈牙利民族传统中寻求其根源，以在邻国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派的危险处境作为起点。通过把自己掩盖在民族主义的虚浮言辞里，这个论坛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找到了共同之处。

“民主论坛”与基斯的“自由民主联盟”之间的论争——它已成为匈牙利政治论争的核心——常常被描述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争斗，但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最新版的匈牙利两种历史传统之间的斗争：都市的文雅和乡野的质朴，城市和乡村。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党派里的两种显著不同的情绪倾向，两种文化背景，两种精神本质。

我们这些中欧的人们，总的来说，因为两种基本因素而反对共产主义：第一，因其极权主义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亵渎；并且，它是外来的，是挑在苏联的刺刀尖上送来的。因此，它与我们的民族传统存在着分歧。

第二个原因则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内。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盲目仇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逃避某种责任感的窒息，即感到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羞耻负责。

民族主义总是导向自我中心和自我欺骗。所谓自我中心，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谓自我欺骗，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和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却无视同时也被伤害的其他人。

因此，一个匈牙利民族论坛的成员的政治思想起点是匈牙利民族所经受的苦难。而一个来自“自由民主联盟”的人，会尝试在一个更宽广的中欧的范围内来审视这些苦难，把他对匈牙利命运的关心，与尊重每个民族共同体、每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结合起来；认为一个尊严的、自由的生命，是在欧洲民主的框架中和符合人权宣言中，才得以实现。

当然，要想祛除极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向一个民族的特性回归是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问，那是一个怎样的根基和怎样的特性。就基斯而言，他涉猎到了各种的自由思想，以此来牵制那些保守的右派立场，他们披上“宗教—民族”传统的外衣，——表现得似乎是一种本土的传统，以便同那些外来的，应以祛除的相区别。而这一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推崇由少数精英集团所统治的强大国家。

为了反对这种立场，基斯着力强调他的民主观念，他并不希望回到战时的制度和精神氛围之中，我想他只是想要——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让他的祖国“重归欧洲”。

很长时间以来，“重归欧洲”这一观念对我来说好像是外来的。它意味着什么？欧洲并非只仅仅意味着议会制、公民自由、市场自由：它同时也与福利国家以及某种范围的自治相抵触。欧洲不仅是密特朗（Mitterrand）也是勒庞（Le Pen），不仅是魏扎克（Weizsäcker）也是德国共和党。重归欧洲的观念也许包含着激进的反俄国虚浮作风的态度（如同米兰·昆德拉所做的），但它同时也支撑着包含俄国在内的我们整个东部大陆欧洲化的信念。

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东欧“重归欧洲”的观念意味着将某种特征，交付给欧洲文化，将共产主义的极权教条替换为一种包含一种自我批判在内的立场，意味着尊重在公共生活里的宽容和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怀疑态度。

然而，这并不就意味着东欧诸国应该将西欧的政治经济秩序简单复制过来。事实上，这样行不通。西欧的政治舞台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直至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波兰，这一传统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摧毁了，这次革命同时也毁掉了这个国家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是什么东西将要在这片土地上兴起还不明确。也许新波兰的政治舞台将会是西欧与美国的交叉——两大党派，或者还有公民运动和全部丰富的多元化。

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我于 1978 年的夏天相识在捷克苏台德区（在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白山（White Mountain），我们的见面是非法的——一方是“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另一方是“七七宪章”的成员。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在一条山间的小路上，一张方桌，一条长凳，库隆与哈维尔进行深入的交谈。在这之后不久，是捷克斯洛伐克被入侵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我们谈到要组织某种联合出版社的事情。

然后，哈维尔和其他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被捕了，我们在波兰举行了教堂绝食活动声援他们。接着到了 1980 年 8 月，团结工会的运动达到了顶峰，在那段时期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公开为哈维尔和他入狱的同胞表示抗议——直到 1981 年 12 月 13 日，我们发现自己也被捕了。

几年以后，关于他出狱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消息才传到我的囚室，而在那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为他远在波兰的保护工人委员会和团结工会的被捕朋友表示抗议。然后，一切就在这样的循环中继续：被捕、抗议、在山间会面。

在波兰，一切都发生得更快，当团结工会与共产主义政府之间的圆桌会谈于 89 年 1 月在华沙举行时，哈维尔在布拉格又一次被捕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议活动席卷了波兰，包括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内的人，都参加了哈维尔的戏剧《谒见》在波兰的首次公演。那一次，我自己还上台读了几千字。

到了 8 月，我们可以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了。这次出访，我们的身份不但是合法组织团结工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波兰议会的代表，尽管此时安全部门仍在秘密监视我们的朋友，警察却也不敢靠近我们了。我们在哈维尔坐落于赫瑞达克山间小屋里走访了他。

如今，与我们见面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他是个作家、剧作家、思考的人，是过去二十年以来在反对极权主义立场方面的洞察判断最为深刻的权威。他的那篇值得记忆的“无权者的权力”是关于在中一东欧成功建立公民社会运动的最好哲学阐述。

根据他的传记来看，哈维尔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温和派。他从不屈服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麻醉剂，但也不会让自己封闭于教条的反共产主义之中。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中最为可贵的价值在哈维尔的文字里得到了表达——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尊重，幽默和自讽，宽容和刚正不阿。他从不使用过时的左派与右派

的分类方式。在建立“七七宪章”团体时，他能够用一种新的语言准确表述他的思想，从而为昨天的对手创造了共同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一个反极权的共同体，一个民主的城邦，小心翼翼地被构筑在极权高压统治的世界里面。

今天我不禁要感到奇怪，是什么给了这些人以力量？什么使萨哈罗夫、基斯、哈维尔多年来这样生活成为可能？什么使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哲学家、一个作家放弃了他们的学院生涯，牺牲了自由、平静及个人安全，去进行一场看似无望的同共产主义巨兽之间的战斗？他们当中从没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为信仰所召唤，或是自称为政治家。可是，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政治运动，担当了道义的见证人，并且最终战胜了靠着警察进行独裁的职业政治家。这如何可能？

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要求对于道德的一种有意识呼吁，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这就是为何在中一东欧出现了独一无二的“反政治的政治”的运动——以“十诫”作为政治纲领，以一个科学家、一个文人和一个哲学家所领导的一种斗争的骨气。

在波兰也一样，但又略有不同。很久以来，是教会在呼唤这个被奴役的国家起来抵抗：红衣主教斯蒂凡（Stefan）、维辛斯基和稍后的约翰·保罗二世。接着由作家与哲学家来阐述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反对派：米沃什和赫伯特，克拉科夫斯基和康维茨基（Konwicki）。在团结工会重要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中，是以这样的人作为背景：盖莱梅克（Geremek）和马佐维耶茨基（Mazowiecki），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

同样是在波兰——自 1956 年以来——转型的基本层面是工人的斗争。这些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1980 年 8 月那次——产生了莱赫·瓦文萨。瓦文萨是波兰平民历史中真正杰出的产物，是人数众多并强有力的覆盖全国的劳工联盟的工人阶级领袖。他将农民的聪明和坚定的信仰集于一身，一种坚韧、执着结合着走钢丝的人才具备的弹性与平衡。

同样也是在波兰，欧洲精神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发生着冲突，瓦文萨是这场斗争之中一个坚定不移的角色。他是宗教的民族的情感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相融合的象征，也是这个幻境中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典型。那是他力量的来源，他正在运用这些帮助开创一个欧洲的新局面。

很难说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欧洲，德国重新统一的进程已经开始，对波兰来说，这一进程将继续一种考验：他们是否准备接受生活在自己联合起来的国家中，由西德人带来的所有结果？

但这同样也是对德国人的考验：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在华沙而不是在莫斯科，处理波兰与他们相关的事？德国反对波兰参加“2+4 会议”（这次会议为德国合并而筹措）表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Chancellor Helmut Kohl）怀念以拉帕罗（Rapallo）或雅尔塔风格为主的外交手段。但波兰人记得，拉帕罗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通往对他们国家的侵略和占有。他们自己的事情正在被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波兰人必须出席。他们的出席也会对欧洲的民主制度有益。

但德国统一也只仅仅是关系欧洲未来的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苏联。谁知道在那里将会发生什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除了中欧共产主义的瓦解之外，苏联内部还存在着深层的民族矛盾，保守的官僚机构抨击公开化，其成员已经进入苏联立法机关的民主派则越来越强烈地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个危机局面的出现。

并且，许多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来自于上层的改革已经达到它的极限。有三个基本的任务——改革经济、与多民族建立新的关系、将制度转换成为多元民主——看起来运用那些手段无法实现。当大俄国民族主义传统正在逐步强大时，苏联将面临巨大的震动是越来越明显了。很难说这会给中欧带来何种影响。当他们抛弃极权主义的甲胄，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许多未知因素其中之一。在所有未来的陷阱中，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是最危险的。随着南斯拉夫内部矛盾的增长，很容易看到，它正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中欧的缩影。

民族主义的欧洲马赛克可以由一场边境冲突的大火清除。这是一些不幸的民族，在耻辱与损害中存在了多年的民族，强烈的情绪和怨恨一触即发。仇恨滋生仇恨，暴力滋生暴力。这样下去，摆在我面前的正是巴尔干之路。

最近，受加拿大乌克兰共同体的邀请，我在多伦多住了一段时间，我禁不住为这城市里居住的邻人们而感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波兰人和中国人，他们在不同的民族、宗教的背景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统一体。

对我这个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来自中欧的人来说，这是很有价值的一课。有两条路摆在我们以及我们新解放的邻居面前：一条路导向边境战争，另一条路是将边境的意义降至最低，使它们与路标类同；一条路导向新的用铁蒺藜丝网做成的围栏，另一条路是在多元宽容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秩序；一条路导向民族主义和孤立，另一条路是向我们的“素朴的欧洲”回归。

萨哈罗夫，基斯，哈维尔，就是中欧民主阵营的路标，是那些不接受共产主义极权秩序、也不想在种族仇恨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人们的向导。

在中欧的每个地方都有人这样去想问题。现在，对他们来说，是互相会面和交谈的时候了。谈什么？谈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

（戴宇新译 崔卫平校）

注释：

1Janos Kis 出生于 1943 年，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教授和系主任，匈牙利反对派月刊 Beszel? 的创办人，1988 年和人合作创办了“自由创制联网”，后来演变为“自由民主联盟”，基斯任主席至 1991 年。基斯的著作有《我们有人权吗》(1985, 布达佩斯)《匈牙利政治》(1989,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流产：赞成和反对》(1994, 布达佩斯) 等。2Imre Nage, 1896 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俄军俘虏，后加入红军和俄共（布）。三十年代曾定居苏联，研究农业问题。1944 年底回国，1951 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副总理，1953 年任国家总理，受到人民普遍欢迎。其做法包括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增加自留地面积，允许退社和解放生产合作社，重新发放手工业执照等等。不久引起党内斗争的公开化，被指责为右倾。1955 年被免去总理职务。1956 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发生，对匈牙利人民产生了巨大冲击，1956 年 10 月 22 日，波兰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让纳吉回到领导位置，苏军撤出匈牙利等，随后发生一系列社会骚乱和变动。10 月 25 日，监狱被打开，部分刑事犯、政治犯走上街头。27 日，纳吉宣布改组政府。30 日，遣散原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 7 人临时执行委员会代替主席团，纳吉派占多数。11 月 1 日，纳吉宣布废除华沙条约、匈牙利中立和呼吁请联合国保卫匈牙利中立。11 月 4

日，苏军出兵匈牙利，形势很快平息。事件中共有 2500—2700 人死亡，近 2 万人受伤，15 万人流亡。纳吉等人进入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后被送往罗马尼亚，1957 年押送回国审判，1958 年被处决。

1988 年，纳吉的女儿和与纳吉一起被处死的其他人的遗孀，组成“历史公正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为 1956 年历史事件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要求为被处决者举行葬礼，并树立一国家纪念碑。1989 年 6 月 14 日，纳吉被处死 31 周年的纪念日里，匈牙利政府举行了重新安葬纳吉的仪式，25 万人出席。

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

——访谈瓦茨拉夫·哈维尔

亚当·米奇尼克

(1991)

(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如何对待过去？作为个人，倾向于不追究，但无权宣布一个全国性的大赦。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对了。

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

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牌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天鹅绒革命已经两年，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崩溃。我记得1989年夏天在布拉格，在赫瑞达克(Hradecek)访问你，对你说你要当总统。你认为共产主义永远被推翻了，还是可能卷土重来？共产主义有可能复辟吗？

哈维尔：我想全球共产主义复辟，重返勃列日涅夫或斯大林时代这不可能。这个过程不可能倒转。然而，地方性的复辟有可能。我可以想象以一种略有不同的共产主义统治的存在。在这里或者那里，比如在苏联共和国的某个地区之一，党的核心阶层也许经由更加民族化的色彩打扮之后，运用先前党的统治集团创造出与前制度相似的东西。这种地方性的复辟是可行的，但是作为一个帝国或集团的整体是永远逝去了，历史不可能倒退。

米奇尼克：这里的一切——人民和制度——都曾经属于旧政权，你怎样看待这里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

哈维尔：我认为对于整个后共产主义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里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创造了这个政权，那些在沉默中忍受的人们，所有我们这些无意识地使自己与之适应的人们，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从上一个时代继承了这些巨大的、中心化的、垄断的国家企业和一个充斥着官僚的国家管理机构。这就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现在必须要对付的数不清问题和麻烦的源泉。它不是唯一的问题，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反对与旧政权有牵连的特殊人物或其他代表这不成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与普通公民的习惯作斗争。他们的确痛恨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同时，他们整个生活于其中，怨恨自己，他们习惯于这样做。他们习惯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之前，隐隐呈现着掌握一切大权和对所有事情负责的国家。他们认同一种家长制的态度对待这个国家，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消失的。你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所有由旧制度若干年培养起来的坏习惯。这份强有力的、麻烦的遗产是后共产主义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麻烦问题的来源。

米奇尼克：有两套不同的象征性表述用于对待与共产主义有牵连的人们。一种是波兰提出的“粗线条政策”。塔·马佐维耶茨基在他作为总理发表首次演讲

时，用了这个概念。他谈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一个粗线条，同时说评价旧政府官员只有一条标准即他们的能力和对新政府效忠。对一些人来说，这提供了一个根据——谴责他运用“粗线条政策”是要保护共产主义罪犯和窃贼。第二种态度就是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提出的“祛除”。这是对待这个问题的两种极端的态度，你怎样看由马佐维耶茨基提出的粗线条哲学和倡导祛除的原则？

哈维尔：这是另外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不触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腹背受敌的过程。我想这两种态度在其极端形式中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与过去的联系中，我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切除脓肿而它们还要继续化脓并毒化全身。对我来说，把它们切除和看到正义的实现，这是正当和自然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会出现我们稍后才谈到的另外一番景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是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我想这种要求是危险的——公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和秘密警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而不管是什么时候或为了什么。它是一枚随时可以爆炸的定时炸弹，以一种非法的、不公正的方式再次毒害整个政治气氛。

关键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文化的、文明的立场而不是逃避过去。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过去，给它们命名，作出结论和实行正义。但是我们必须诚恳地去做，有节制和得当，宽宏大量和富有想象力。如果是面对忏悔和表达悔恨，必须有宽恕的空间。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一种人道的立场，而不是新一轮的迫害和恐惧。人们在四十年中恐惧安全部门，他们必然不希望为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事情被挖出来之后而在下个十年处于恐惧之中。说到底，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偶然地卷入了某些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我们的祛除法采取保留和公开呼吁议会修正它。

米奇尼克：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吧。昨天我在布拉格听说，祛除过程威胁到著名哲学家卡罗尔·科采克（Karel Kosik），在布拉格之春中他曾经受迫害和被判有罪，陷入沉默多年。他将要为发生在二十多年之前的事情而受到起诉，1968年他是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你怎样看待这件事？

哈维尔：允许我先做点解释。这项法律通常被看作祛除法，它实际上的范围要比这宽泛得多，不只是涉及祛除。“祛除”这个概念涉及到检审在内务部存档的某人是否是这个部门的合作者。同时，这项法律在五年之内禁止一个范围的人进入公共机构。这些人包括过去四十年内“人民民兵”的成员，1948年和1968年期间共产党正式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某地区的委员会中非同一般的党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例外：在1968年2月和1969年期间党的官员除外。我想卡罗尔·科采克（Karel Kosik）是包含在这些例外的人们当中的，尽管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曾是正式委员会的成员，1948年被大学开除。

总的来说，我相信这项法令是非常严厉和不公正的。例如，某人在三十年前的某日成为“人民民兵”的成员，就足以阻止他取得某些位置。但这也适用于这样的民兵，他们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期间）于Vysocany抵抗苏军入侵。我并不是说这些人占大多数，但是他们是有重大价值的少数人。从道德的观点看来，即使只有一个无辜的人成为这项法律的受害者，我也认为这是一项坏的法律。因此，准确地说，不能运用一种集体罪责的原则而只能判断每个人的具体行为。

我给联邦议会提出修正案设想某人可以将他的情况上诉法院，法院可以宣称

某个人适合某个位置，因为某个针对他个人的特殊境遇。比如，假如他后来长期为人权而奋斗，法庭将有权宣布他的实际贡献而抵消了他在某个时期属于这个或者那个组织机构的罪过。有这种情况，人们被迫合作，或者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委派和政权打交道，可以想象得出五十年代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米奇尼克：这儿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听说斯洛伐克议会发言人伊万·卡诺古尔西（Ivan Carnogursy）指控前总理弗拉迪米尔·马塞尔（Vladimir Meciar）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马塞尔（Meciar）对卡诺古尔西（Carnogursy）提出同样的指控。在这种争论中，唯一有能力仲裁的是了解真相的某个人，换句话说，是安全部门的某个上校：对我来说，如果要安全部门的上校开始发放道德执照，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荒谬的境地。

哈维尔：是的，是这样。在我给议会的信中已经指出这一点。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是否适合某些位置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会在安全部门的内部文件中找到，这真是疯了。

米奇尼克：扬·卡文（Jan kavan）的情况在国外引起了不安。一个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的前流亡者，在他回到祖国之后，因为曾经和安全部门合作而受到谴责。我听说上周你卖弄般地和卡文（kavan）去了一家饭店，于是所有的人都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哈维尔：是的，我在一家饭店和他见面，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和他见面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彼得·乌尔（Petr Uhl）要求我和他谈谈，听听他那一方面的故事。我找不出理由不这么做，尤其是因为我作为持异议者和他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帮助反对派，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情形十分引起争议，我甚至没有理由不见他和他谈谈这件事。但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展示什么。

米奇尼克：你说我们在某种角度上正在驶向腹背受敌。你认为界限在哪里？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

哈维尔：这个界限的确立可能依据某些模糊的东西，某些不能诉诸于法律形式的东西，比如敏感、趣味、克制，谨慎和智慧，换句话说，某些人类品格。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受它们引导，我们可能找到界限。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界限难以界定，正如我们的祛除法表明的（对此我考虑一个抑止它的努力），尽管这是历经两年讨论的一个结果。这个法律显示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这个界限是多么地困难，而同时，又只能以法律的形式来界定，因为比一个可见的法律更坏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于其中每个人都可以祛除和公开地诋毁他人。

米奇尼克：在一次访谈中，你谈及你如何感到人们正在变得为过去担忧。当时我正在德国，正在和我的持异议者时代的朋友们谈话，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关于秘密警察。我有一个感觉，他们被这个问题牢牢占据了。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秘密警察的活动等同于一个灵魂的奥斯威辛。他们说人们必须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全部问题。如果某人被秘密警察所陷害，那么，他有权伸张正义，有权知道是谁陷害了他。这意味着他有权看到自己的档案，找出那个告发他的人。

另一方面，不久前我和西班牙作家Jorge Semrun谈及此，我问他，“在西班牙你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说到底，他们也是有过一个专制政权，有过折磨人的警察，告密者等等。他回答：“如果你想要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你必须试着去遗忘，否则所有户外的野蛇将在未来的年月里毒化公共生活。”

从他的角度，德国作家尤金·福契（Jurgen Fuchs）也说：“听着，我不是吸血鬼。我写诗，我不想和这个东西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不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个，那么它就会卷土重来，像纳粹。我们还没有消除纳粹的影响，它压了我们好多年。”

那么，作为一个捷克作家同时也是捷克总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想说我个人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同于我身为总统所拥有的观点。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状态及其要求。

我个人的态度最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当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上面列举着所有曾经向当权者告发我的同事的名字。但正是那天，我不仅把这份名单丢掉了而且也忘掉了写在上面的名字。这简单地说明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怎么毁人。关于此我曾经写过戏剧和文章，我以某种方式在我个人涉及的范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不需要因为某人没有经受过这种磨练而惩罚它。

然而，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因为人们感到革命没有完成。有些人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比他们更想从中摆脱。人们有这样的要求：检视过去，除去那些曾经威胁过民族和明显侵犯他们本人的人，将他们从现有的位置上赶下去。正像我以前说过的，面对过去和准确地为过去命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对待这件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

莎拉·冯德拉（Sasha 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区分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西班牙，同样还有匈牙利和波兰，另一方面是德国和捷克……

米奇尼克：我想莎拉（Sasha）夸大了某种哲学上的结构主义，因为在波兰，结果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关于清算的问题——谁也没有天主教的政治家喊得那么凶。只有（原先）可怕的、严厉的人如库隆或我才说，我们不能走过了头。另一方面，属于党派的政治家却用着天主教的词语，更倾向于说上帝是仁慈的。

哈维尔：事实是，在天主教内部有两个传统，创造了特殊的张力。一个是罪的传统，在这个面向上，天主教比新教来得纵容。问题的重心落在宽恕和赦免上面。天主教的第二个传统是关于调查。

马克·赞托夫斯基（Michal 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但是罪的赦免总是和告白、和袒露自己的内疚联系在一起，而调查则是寻找出这种隐藏的罪，它总是被看作是最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想我们都命中注定遇到这种特殊的辩证法。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有两件事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我永远不会加入一个老战士的组织，它给那些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人颁发勋章；第二，我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没有权力以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人的名义宽恕。”我想我们注定更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仅仅可以原谅加诸于我们本人的过失，而无权原谅加诸于别人身上的过失。人们有权要求正义。

哈维尔：这正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律背反。处在我的位置上，我不能表现得如同一个私人里的个人。我不需要审判“我的”安全官员或告密者。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每一个人行为之上的普遍大赦。

二、刚刚发生的能否称作一场革命？“战争结束了”，消失了五十年的旧的乱力怪神却出现了。

米奇尼克：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引起我的不安。你说到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才是这场革命的结束？

哈维尔：这很难说，这场革命不会在某一天结束，这里不存在一个简单的指示器，可以用来定义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一个集聚力量而又分散离析的过程，只有当新一代进入政治生活，我们才可以说这一切终于过去了。

但是现在仍然有那种革命并未真正结束的感觉。我们必须记住，比如说，我们的纲领呼唤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仍有95%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也一样，95%的法律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时期。同样可以说政治制度。要有时间给新人来替换我们现在的国家官员，但是现在一切事情仍然处于变动之中。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很难说现在革命已经结束。（目前）还仅仅是一个象征的时刻，而将一个大型钢铁冶炼厂转变为私有制的，则不那么简单。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哈维尔的新闻秘书）：原谅我，我想你总在绕开我们目前正在涉及的问题。的确，人们运用“革命”这个字眼是因为报纸在用，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并非是一场确切意义的革命。一场革命总是涉及暴力，如果有过一场革命的话，便会出现比如当下政体的中止和成立革命法庭。我们没有这么做，我想现在这么做也太晚了。

哈维尔：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称之为一场革命……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们没有那样称呼。

哈维尔：好吧，它只是被当作了一场革命，这个词可以意味着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比如现在有一场关于结束联盟（federation）和开始同盟（confederatin）的争论。作为作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仅仅是阅读，而且也是在创造词汇，我们知道某个词逐步拥有了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被称之为一场革命，不管这样称呼是否恰当，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不能同意。你的朋友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曾经说每一个词只有当它指示着一个特殊对象时，才有意义。否则，人们之间便无法沟通。当然，记者们可以写他们想写的，但是从“革命”定义中得出来的是，我们这里发生的并非是一场革命。

哈维尔：你的说法是学院式的，而非诗人式的。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马克（Michal），游行示威迫使极权主义制度让步和承认，这就是一场革命。其后发生的事件——记者们称之为“天鹅绒革命”是指产生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有人认为这正是我们的谬误所在，我们不应当遵循旧的法律规则，而应该诉诸革命手段——换句话说，无法无天——去彻底铲除共产主义。革命总是和歧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反对你的敌人，还是反对前政府成员——而法律却主张平等原则。这不仅仅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要不以法律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要不视法律为不存在。

我担心这仍然是可能的，某个既定团体比如前共产党人——将否定任何法律权利，如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对待富农和资产阶级那样。当我询问你说的“未完成的革命”是什么意思，我很清楚我所担心的事情：我担心革命将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关于革命的历史教训，开始时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到头来以专制主义而告终，从克伦威尔到拿破仑，从霍梅尼到当代的许多例证。

许多年前，塞姆普伦（Semprun）为阿伦·雷乃的一部电影写过一个剧本，《战争结束了》。西班牙战争结束之后，于是不再需要任何军事装备。当你说到“未完成的革命”时，我感到处于一种犹豫之中，是否该有人站出来说：“瞧瞧，

就连哈维尔，一个人道主义者，作家和哲学家，他在说我们需要继续革命。”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是继续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已经结束？共产主义者就在我们中间，但是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权利。如果他们犯罪，那么他们和其他罪犯一样得到处罚；如果不是，就不能因为他们某个时刻属于共产党而歧视他们。

哈维尔：我认为这些改变的实质——如果你们不想要称之为革命的话——是引进法律规则而不是开始新一轮的无法无天。某种社会压力正是这个无法无天的产物，那将永远没完没了，而这种压力的前方并不在于引进新的无法无天。举一个我的朋友的例子，*Standa Milota* 他曾经被判二十年和不能找到工作。现在，他有一千克朗的退休金——因为他不可能被提升，所以，他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的起点是很低的，而判他刑的人和阻止他正常工作的人，却有着五千克朗的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子和其他好东西。人们看到这种状态会说，尽管“上层”改变了，尽管检查令解除了，他们可以写他们喜欢写的任何东西，但是所有现实的、物质的、日常的不公正仍然持续。

真正的情况是人们并不是想要造反。不同于少数极端主义政治家，他们决不是受复仇的推动而是要求声张正义；他们要求道德和物质的满足。这不是任何一种雅各宾主义或不断革命。（目前的）问题是完成重建公共生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看到复仇或法西斯主义迹象，我会坚决予以阻止。

米奇尼克：今天，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的令人惊讶的现象。不久前我在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还能这么称呼的话。也许最好称之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台正在使用五十年前的词汇说话，我们认为死掉和埋葬了的冲突正在复活。比如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 Croatian Ustashe¹，在塞尔维亚，你听到关于 Serbian Chetniks²。

在别的国家，你也看到已经消失了 50 年的语言、象征和意识形态。在波兰，the endecja 正在回潮；在乌克兰，他们为 Bandera 制造了一座纪念碑；在斯洛文尼亚，有人为 Tiso 神父³ 恢复名誉；在罗马尼亚，一份为安东尼斯库⁴ 唱赞歌的报纸“Romania Mare”有着一百万的发行量；同样还有在匈牙利，人们正在颂扬 Horthy。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意味着什么？

哈维尔：我也为这些旧神怪的复活感到惊讶。这表明——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共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带向一种终结，带向结束在自然水平的意义上。（人们说着）形而上学的话语，共产主义是麻醉剂之一，目前正在从他们的前存在状态中恢复过来。这些社会在面对麻醉剂时突然倒退，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为不仅是你提到的坏的传统的复活、也有好的传统的复活感到惊讶。而尤其惊讶于年轻一代并没有在学校里接触过这些，他们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学习这些。在每一个小镇和地区，人们寻觅被销毁了不只四十年的传统。地方的意识正在觉醒，还有在地方之间的那种联系的意识，等等。这不只是坏神怪也是一种精神的复兴。这是真正令人惊讶的。

米奇尼克：在捷克传统中你最担心的是哪些神怪？

哈维尔：我想，最严重的发展是反犹太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在斯洛伐克你可以看到一种对外国人的憎恨，这在捷克地区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

例如，我们有一份杂志叫做“Politika”，上面有很多最残酷的反犹太人的文章并有着众多读者。这是自 1938 年以来从未见过的低级趣味的报纸，那是在被称之为“第二共和国”期间，在慕尼黑会议和德国人占领期间，当法西斯的组织例如 Vlajka 成立和有组织地袭击卡莱尔·恰佩克时期。它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复

杂混合——针对每个与众不同人的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恨。现在它采取了仇视越南人、古巴人、罗马尼亚人和吉普赛人的方式。于其中有一种“种族纯粹”的崇拜在内。这是一种倒退到捷克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它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而仅仅是捷克的。

另一方面，在斯洛伐克，存在着一种教士法西斯主义。对于 1939—1945 年年斯洛伐克国家的记忆正在复苏，这是反犹太人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些寻求支撑的不合时宜的乱力怪神。与极权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秩序本来就是非结论性、不确定、松散和不十分强有力的。这些只是一些必然现象。曾经全部生活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摸索这条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观察给那些渴望一只强有力的手的人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人们中间存在着要求“强有力的手”来统治的那种东西。要求由某人实现和恢复秩序。他们并不在乎他采取什么方式，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我想这种危险存在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

三、以前未曾注意到右派也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土壤。

米奇尼克：所有我们在共产主义时期思考的问题是否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从何而来？那些左派的传统、左派的语言、修辞学、价值系统，如何造就了粗暴的专制？在这段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左派专制仅仅是专制的一种面孔，而极权主义也可能从右派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难道你不担心这种危险还没有被我们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认识？今天，没有人再匍匐于左翼极权主义的口号之下；任何左翼的东西都散发着和极权主义制度相联系的气味。难道你不认为，反共产主义虽然采取了右翼的修辞学和呼吁民族价值，却有可能导致既不是我们的社会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危险？

哈维尔：我不得不承认我尚未意识到这些危险。我并不担心右翼修辞学的诱惑会产生新的极权主义现象。就我自己而言，我想我对于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免疫力，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怀疑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原因。当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存在某些右翼的、极权主义的迹象。我关注它们，但是不会让它们影响到我的行动。

米奇尼克：显然，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受专制的或极权的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你来自另外一些人们的榜样，这种人不会适应任何专制。你经常说，任何左派、右派的立场都不能说明你的状况，我也如此。更甚者，你说过——这也是我可以真正认同的——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展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但是，为什么在捷克大地上，在斯洛伐克和波兰，这种危机会重新浮现？为什么会有存在那些把自己看作左派或右派的人们？他们运用这些东西想说什么？

哈维尔：有时从报纸上读到说某人组织了一个右翼政党或者一个右翼党同盟，诸如此类，我就觉得有点可笑。我想这可能和要求多元化的政治光谱有关。人们知道在传统民主里，政治力量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于是他们试图把自己定义和置身于这种框架之中。目前，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右派支持者是一种时尚，出于许多原因，这可以理解。在打上所有左派标记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后，谁还能指望别的什么？这是完全正常的一种反应。

但是，一旦没有什么东西构成正常发展过程的障碍，政治的光谱就会变得完全稳定，这种自我定义的膨胀将大量消失。当实际的政治得以运作，给予具体政

治纲领付诸实践，谁的位置在哪儿就会逐渐变得清晰，而不在需要这种发布来宣称他们的联盟。所有这些对后共产主义纪元来说都是新鲜的。说到底，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它是一个新阶段，于其中大量不可思议的和戏剧性的事件可能发生。我承认每天都有一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危险的时期。围绕着这个时代的的政治寻求自己的道路，是一件令人精疲力竭的事情。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将会宁愿等上五年，直到这个离散的过程结束，再参与到政治中去。我们必须努力跨越这个阶段，不管它的悖谬和荒诞。

米奇尼克：我想问你一件令我十分迷惑的事情。为什么在斯洛伐克 Tiso 神父受到如此广泛的新的欢迎？也许我正在暴露自己的无知，但就我对于斯洛伐克历史的理解却提示，这并非是必须复兴的一种传统。

哈维尔：你说得很对。我完全赞同你。我想这是悲哀的和危险的。然而，我必须说，更多的斯洛伐克人并不要求复兴 Tiso 神父；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对此感兴趣。

但是你问及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它们是特别的和完全是非理性的。自从十八世纪，斯洛伐克便处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自己国家要求。而当共和国摆脱了匈牙利人的统治和马札尔化的压力之后，他们并未感到他们主宰了自己的国家。

战争期间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唯一独立的斯洛伐克时期。这个国家是希特勒的傀儡；他造就它，并试图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满足自己。所有这个国家的法律是模仿德国的，甚至走在德国前面。然而，和其他被希特勒蹂躏的国家相比，斯洛伐克遵循着一条相对中庸的路线——当然了，如果你忽视对犹太人的隔离或将他们出卖给德国人这个事实。当这个国家被战争的混乱所包围时，它的内部相对比较平静。在战争中斯洛伐克没有经历过波兰人所经历的可怖。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许记得这个时期是斯洛伐克唯一的主宰自己的时期，尽管那是一个傀儡国家。还有，斯洛伐克人不喜欢捷克人因为这个斯洛伐克国家而指责他们。他们认为这是由他们自己必须来解决的事务，捷克人无权干涉。

在具体的有关历史的意识中，存在着一些和特定人群相关的细微差别，它并非是——我重复一遍——一个广泛的现象。事实上，Tiso 的被处决是一个如此值得争论的事情，在斯洛伐克，人们相信，你不可能拿走一个牧师的生命，尽管天主教——不像我本人——并不始终地反对死刑。这种情形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有，审判完全是在计划之中进行的，他们算好了比如哪一天是将这个该死的人送上绞刑架的最好日子。

尽管存在着这种细微差别，我也不只一次公开表达自己对战时斯洛伐克国家的距离，和表示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可能与之打交道。

四、哈维尔补充捷克人的性格：“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 K，而我们也都扬·胡斯。”

米奇尼克：你谈了关于斯洛伐克复杂性的十分有趣的事情，现在我问你关于捷克的复杂性。我永远不会忘记 1989 年 11 月在弗罗茨瓦夫（Wroclaw）的谈话，那是在波兰—捷克“团结之日”之后，在场的有帕维尔·提格里德（Pavel Tigrid）、卡尔·斯切沃森伯格（Karl Schwarzenberg）、吉瑞·派里卡（Jiri Pelikan）和维勒姆·普莱肯（Vilem Precan）等。我宣称在捷克共产主义已经垮台，对此提格里德（Tigrid 回答道）：“你不懂捷克人。捷克精神生活介于帅克和卡夫卡之间。

捷克人不可能推翻共产主义专制，因为他们对于 1938 年或 1968 年不能保卫自己有着复杂的体验。而结果出来是，我对于捷克精神的了解比提格里德（Tigrid）和赞同他的人们多得多，我不必告诉你当时我是多么地高兴。

哈维尔：1989 年的事件证实了我很长时间感受到的某些事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不同的外国记者来访问我，每次他们都说，持异议者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很小的圈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从来不参加到他们中来，他们从来不奋起，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我们只是一些把自己的脑袋挂到墙上的疯子，诸如此类等等。我经常对他们说，“你能够知道什么？在这个社会的灵魂中蛰伏着巨大的潜能。”

经历了这么多令人惊讶的事件之后，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经历了 1968 年的欣快症，它导致了全民族范围之内的对于苏军入侵的和平抵抗。我感到十分惊讶是因为冷漠已经统治这个社会若干年。对人们当中仍然保留了这些。而不出一年之后，同样是这个社会再度被冷漠症所压倒，我再一次感到目瞪口呆。这些曾经赤手空拳对抗坦克的人们又在说，无所谓啊，我们必须好好照料自己的花园。此时我意识到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 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这些性格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同时存在。

五、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被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

米奇尼克：对于白痴来说，共产主义能够以最简单的术语来解释世界的复杂性。一个人仅仅需要知道一些术语，就变得比柏拉图、海德格尔或笛卡儿更加聪明。这套简单的解释世界的途径随着共产主义的垮台而垮台。现在存在一个裂隙，你不认为这个裂隙正在由一种低劣的、原始的民族主义所填充？曾经求助于共产主义概念解释世界的人们现在求助于民族主义来解释世界。

哈维尔：物理学告诉我们，自然厌恶一个真空，它总是试图消灭负面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以发生。民族主义处于过分简单化的、古老的意识形态的前沿，现在涌进来填补这个真空。但是无疑它不是唯一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真空实际上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一个意识到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结束的机遇。我正在完成一本书，其中我说至少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地区，存在着结束意识形态时代和打开新的大门的机遇。我想说的是，（那将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时代，一个我们都意识到全球的联系和全球责任的时代。这是一个非教条化思想的时代，不是每件事情都早已经被安顿停当。

现代纪元的一个特色在于倾向认为一件事情不可能和另外一件事情相矛盾，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封闭的、完整的世界图景。“世界观”的概念应运而生。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我真的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难道世界真的如此简单，可以用一种立场去看待它？

我认为建立在由笛卡尔时代提供的理性结构的现代纪元之后，是一个新纪元的降临，一个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Vaclav Belohradsky）⁵ 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一个非教条化的多元思想的时代。简言之，我想人类会更加适应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争端，都会有不同的对待它的思考方式，而不是仅仅具有一种方式。当然，拥有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立场，这就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回到真空的问题上来：这不仅是潜在的灾难，同时也是一个可能的大的机遇和挑战。

米奇尼克：意识形态时代真的走到尽头？这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

想法？在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正在抬头，种族意义上的纯粹国家的乌托邦正在重建，那是一个纯净民族的乌托邦，意欲摆脱一切外国的妖魔鬼怪及其精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教条，不仅表现在有关民族和国家上面，而且包括仇外心理，比如仇视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等。这是令人惊讶的东西。

在德国，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我听到的一个传闻很能说明问题。两个德国人，一个来自东德，a Ossie，一个来自西德，a Wessie——互相遇见了。这位东德老兄说：“欢迎，现在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对此西德的老兄回答：“是的，我们也是。”难道你不认为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哈维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如果去读近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是由没完没了的部落或王朝之间的冲突所组成，于其中主要的争端是双边关系。这告诉我们对于一般人们来说，属于一个民族比属于一个阶级的感觉更为强烈。大多数现代战争都是民族之间的战争。

民族纷争的吁求总是发现一个新的纪元，因为这是自我认同的最简单的尺度：比如你只要对别人说出一个词，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捷克人，还是匈牙利人。人们总是在寻求一条自我认同的道路，寻求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的民族性：作为一个捷克人，你不需要做什么；不必表现得聪明或者善良，你只需要出生在这儿。这也许是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吁求总是会找到回响的主要原因，别的姑且不论。吁求马克思主义，或者现象学、存在主义都没有如此回响，因为大多数人于这些概念中并不能给自己定义。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民族性。这是最简单的定义也是最危险的。

共产主义有强烈的造成统一的倾向，将每一件事情缩减成同一种东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到柏林：同样的行政和国家机构，同样的沿街大楼、同样的家居建筑等等。这意味着——有时以一种可能的最残酷的方式——根除所有民族和民族性之间的区别。难道我们希望这种真空由民族主义之外的某个东西来填充？我想，我们创造一个公民社会来尊重每一个集合之“我”的成员，一个拥有民族价值但并不是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社会，并不运用任何意识形态作为原则来组织国家的社会，这要花相当长的时间。

米奇尼克：什么叫做仇外心理？它起源于何处？为什么现在没有犹太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反犹太人思潮会突然抬头出现在这份叫做 Politika 的月刊上面？为什么要冒犯吉普赛人？这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特有的；在每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找到。在德国，纳粹象征的重新出现达到了一个顶点，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某些情况。

哈维尔：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仇外心理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四十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你去伦敦、巴黎或纽约，你会碰到不同种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每一个人都习惯了这一点。天长日久也有问题——比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习惯于这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公平的、世界主义的世界上，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和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而我们则生活在一种封闭的地区，在我们的社会中，遇见某些方面不同于我们的人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说着另外一种语言。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正在寻找谴责的对象。他们正处于突然获得自由的震惊之中。他们失去安全感和他们的价值系统。这是一种我经常拿它与

从监狱释放出来相对比的情况。当你在里面时，你渴望被释放的那一瞬间，但是，等到它来到了，你突然变得很无助。你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你也许想要回到重新回到里面去，因为在那，你知道干什么，不会像在外面头脑虚弱无所期待。一个遇到挫败的社会也是一样，它不能善待自己的自由，因此寻找一个敌人来推卸一切事情。当然，最容易的事情是将人群中明显突出的某个人当作敌人——这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或者他的皮肤是不同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越南人、或吉普赛人或别的什么“他们”当作怨恨对象的原因。人们需要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幸和他们自身的遭遇归结到不同于他们的某个人头上去，归结到某种敌人身上，目的在于从他们自身生活的地狱中逃离。比起认识自身的虚弱，拿手指朝着某个他人说这是魔鬼，是再容易不过了。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尽管总统这么说，但是我认为比起其他国家来，捷克社会并不是如此仇外的。在革命之后，我们没有一个反犹太人的浪潮爆发。尽管有讨论我们过去和德国的关系及其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条约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反德国人的浪潮。对吉普赛人的攻击只是涉及一个很小的年轻人的圈子，他们视自己为光头党并没有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国际舆论对于所有后共产主义的调查结果表明，捷克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这并不是说这儿没有仇外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比较其他国家相对来说是一个小范围的。当然，尽管是小范围的，我们也谴责每一起这样的事件，因为它是危险的。

米奇尼克：我很高兴地在这里见到——如同在波兰——总统的同事与总统进行争论。我要说，我更倾向同意总统的思路。至于说到潜在的危险，这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一种动态。仇外心理通常用来朝向外国人，但是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况，正像我刚才复述的那个德国人的传闻。说到底，德国人是一个民族，然而到头他们却不是。

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不能不提到两件事情。首先，对我来说，诸如此类的东西也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去共产主义化。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对待与众不同的人们的态度，共产党人是一些历史和经验不同的人。第二个例子是共和党。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党的领导人米洛斯拉克·斯拉达克（Miroslak Sladek）⁶和波兰民族党的领导人耶日·吉耶提克（Jerzy Giertych），都视勒庞（Jean-Marie Le Pen）为榜样。

我想说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东西，它也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荒谬可笑的和边缘的，但是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希特勒最初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的支持者还不如斯拉达克（Sladek）。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成功的奥地利画家，有可能变成保守的德意志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哈维尔：我想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当我们推翻了阻挡我们的篱笆和原先的价值系统崩溃之后，像斯拉达克（Sladek）这样的人便被激发和进入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过分简单化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种负面的自我认同，他没有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纲领。斯拉达克（Sladek）意欲囊括伏尔塔瓦河（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的整个政府，包括议会和总统。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同在一些人们中引起了响应，那是因为它简单得一目了然。在他们整个生活中，人们一直习惯于咒骂共产主义者，当他们不再有什么人可以咒骂时，他们便迷失了方向。斯拉达克（Sladek）出现了并告诉他们咒骂当今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他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简易的出口。某些流行的情形给形形色色的冒犯和仇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极端民族主义是无止境的。要求保卫“捷克民族”的纯粹性贯穿了斯拉达克（Sladek）

所说的每一件事情的主题，但是，他也可能选择其他任何廉价的观点。我完全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危险。希特勒的例子多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一次我公开把它说了出来，结果是斯拉达克（Sladek）要对我提出起诉。

这种情况在苏联某些地区可能变得尤其危险，那里的事情在许多方面比这里要糟糕得多。我相信我们社会机构将有能力对付这些病毒，说到底，在这个地区我们有过一些经验。内战时期，有好几次——从左派到右派——推翻马萨瑞克⁷的尝试，但是没有一次成功，徒留一些笑柄而已。我相信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有着潜在的危险，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民主还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这些威胁。同时警察也感到迷惑，不知道该不该管。他们担心自己看起来像是共产主义警察的延续，所以他们宁愿掉过头去或者保留被动旁观者的角色。

六、如何对待宗教的复兴、如何防止宗教介入国家事务以及有关原教旨主义。

米奇尼克：你经常说在一个政治文化被如此彻底摧毁的世界上，我们需要回到精神价值。你是如何看待后共产主义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在极权主义专制下，宗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力量的源泉，不管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宗教诉诸于自然法律，对此我们必须信仰。现在是这种情形吗？

哈维尔：我想后共产主义世界有两个尺度对待宗教虔敬，至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是这样，我所说的将局限于我自己的国家之内。首先，宗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拓展了一个人的视野；它指向存在于我们之上的某些事情，它令我们想起我们良心和责任感的根基以及强调无私和对邻人的爱。我们缺少道德的社会十分需要回忆这些传统的基督教价值。

然而，第二个尺度是（它在波兰的声音会比在这儿要强大）——宗教或教会方面打搅了公共生活。在这个非宗教的、世俗的世界上，宗教——深深根植于内在的个人和精神方面的事情——再度成为一种教条或意识形态。正如我一直在说的，这个世界现在存在着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机会。

有着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国家，比起基督教国家更清楚地展示了宗教介入政治时有多么危险。在穆斯林国家，国家被设想成建立在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但是它们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教条的原则。一个国家采纳这些原则作为它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把个人缩减为一个单向度的人，对他进行强制和操控。我想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国家是危险的，如同建立在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原则之上一样危险。

米奇尼克：就你作为国家首脑的身份，我来问一个问题。教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如何行事？比如有取缔流产的迫切呼声，这是否意味着要求一项条款，宣称建立在基督教价值基础上的国家要把这价值渗透到宪法中去？是否要求立法保证这样的价值在教育制度中有着头等重要的位置？当主教遇见总统时，他们是否争辩，因为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基督教民族，共和国必须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哈维尔：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情，尤其是在捷克这个地方。在斯洛伐克，那里天主教更为强盛，基督教一民主运动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教会并不要求国家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或者它的角色由宪法来保证，但是有介入政治生活的迹象。

依我看，捷克大主教 Miroslav Vlk 是一个我们如此需要的虔敬的缩影。他的纲领是精神和道德复兴的一部分，我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存在于在捷克教会的框架之内决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教

会希望和国家分离，要求保障国家不再干预它的正常事务，还要求能归还一部分1948年以后被没收的修道院。但是，无论捷克还是斯洛伐克，都不会试图将教会“国有化”，以教会的领导作用来代替党的领导作用。

米奇尼克：现在我就你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公民身份来发问。你如何对待妇女人工流产的要求以及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将要被判刑？

哈维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对此没有什么牢固的看法。我的直觉是人工流产不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大多数人也是这样。但是如何解决人口爆炸时代的这个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们的流产法是自由的，某些天主教的议会代表想要从严对待。有人要求我支持他们，但是我不感到非如此不可。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写的书，我感到自己没有资格说必须怎么做。我们的问题还不是法律过于严厉，而毋宁说是相反。

米奇尼克：身为公民而不是总统，你怎么看待一个牧师告诉他的教民，作为一个好基督徒应该选择某个政党？

哈维尔：我一直在说，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在斯洛伐克出现极个别这样的情况。我能理解当共产主义制度垮台时，牧师们站出来声援自由，讲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的好话。红衣主教托马塞克（Tomasek）曾引导民众支持我们的“造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存在一个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事务。但是如果今天牧师今天对人们说他们应该选举哪个政党，我认为这是最不幸的。我想那是一个坏牧师。

沃德拉（Vondra，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我不能想象一个牧师怎么会跟人们说他们应该选谁。

米奇尼克：但是存在着一些非常有意思边界状态。不久前，斯洛伐克出版了一本具有宗教挑衅意味的小说，作者是马丁·卡萨德（Mattin Kasard）。我们共同的朋友斯洛伐克总理扬·恰尔诺古尔斯基（Jan Carnogursky）随之扣押了国家出版津贴，而联邦政府的代总理要求检察官对此进行调查。这里，我不得不进行某些类比。在波兰，一些主教们发放了一封关于大众传媒问题写给教区教友的信，他们宣称哪一种媒体应该或者不应该发行。另外一个例子是拉什迪，那个被控亵渎和被判处死刑的人。当然，从扣押津贴到被判死刑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其逻辑是一致的。就我所知，你最近在广播上就此发表了谈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哈维尔：我说，再也不把文学拉到法庭面前受审。文学总是或多或少激怒某些人，我知道文学会冒犯某些人或他们的宗教感情。我能想象人们被一个故事所冒犯、激怒的情况，但我不能想象把这个作家送上法庭。

米奇尼克：二十年前，当伊朗革命爆发时，我感到非常稀奇古怪和不可理解；在二十世纪末期创造一个宗教国家看起来是荒谬的。然而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到宗教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和在以色列的犹太原教旨主义，看到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增长，看到正在增长的不同原教旨主义倾向——新教的（比如在美国）和天主教的（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我不得不问自己伊朗发生的革命是不是一种新现象的提示。我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e Glucksman）说得对，他写道我们面临的最强大的挑战是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他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替换我们共产主义图景的新现象。格鲁克斯曼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征候，而是种种原教旨主义面貌之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哈维尔：在我回答之前，我必须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原教旨主义中最为强有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以用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伊斯兰相对来说是一个后来者。伊斯兰教的崛起比基督教晚好几百年，现在它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基督教几百年前所处的一个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很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然而，这并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确相信，自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可能变成一种主要力量。然而，我相信，与此同时，存在一种抵消的力量——这个星球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希望也将要占据主要地位。现在我们的星球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受各种因素的威胁：富国和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距离、人口增长、环境问题等等。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一种全球危险。已经有人看到这个危险和理解它们，我相信，我们也只能对付那些被个人和人类视角能够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摆脱所有教条、意识形态和原教旨主义奴役的话。否则，我们脚下的道路无异于自取灭亡。当然，我相信，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起着很大作用。

你看，当萨达姆·侯赛因侵犯科威特的时候，在联合国的允许下，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首次组成了一个国际联盟进行反对。这是一种新的情形，可以解释成这种自我保护进程的一个象征。科威特是拥有一些油井的小国家，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入侵会开始这样一些先例——散布这种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威胁其他国家，从事一场种族灭绝的战争来反对少数民族团体，从库尔德人开始。我不倾向于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时代，而是存在着抵抗它们的力量。

七、斯洛伐克问题。

米奇尼克：捷克和斯洛伐克到底在争论什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真正分歧？

哈维尔：这种争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公平的。过去一千年内，斯洛伐克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捷克的经验。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有过一个自主的国家，他们“比较涣散”；他们也有着我们所没有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他们正在步入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新生的特殊阶段。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中的较小和较不为人所知的民族，斯洛伐克总是处于捷克的阴影之下，尽管捷克曾经帮助斯洛伐克走上自己的道路，但是这种帮助也可以被理解为展示捷克的某种优越感，是一种冒犯，从心理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斯洛伐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共同体，他们想立足于自身，想要和老兄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事实上，这种感情得到传播，但并不是很普遍的。可以理解的是，斯洛伐克在某种程度上对捷克心存疑惧，他们留神各种迹象，看看捷克是否在搞什么新的诡计把斯洛伐克合并掉。

第二个方面是政治的原因，这里事情发展得很糟糕。不同的政治力量乘机打民族主义的牌，因为这是动员人们最简单的方式。打这张牌的人中有的人还算文明，而有人则完全是蛊惑人心。但是他们都以为某个时代来到了：家乡将要解放，新的国家将要诞生，于是对斯洛伐克民族来说是一个站起来的时代。这种东西造成了压力而这种压力目前到了它的顶点，我们真的面临着我们的国家是否正在走向分离。我仍然相信能够它能够幸免，尽管我们所经历的不只是一个危机。你必须区分这两个方面：一是其中所折射的政治游戏，二是两个共和国的议会之间、人们之间通常存在的争论。这些要求常常和一种特殊的复杂性有关，但是最主要的，是人们出于不同的观察世界的经验和方式。

给你打一个荒谬的比方，来说明这种情况。你想象拥有一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的联盟，——其中四十万波兰人和八十万德国人。这是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处在经济上和其他许多方面更为有利的位置，更有甚者，他们比波兰人多出两倍。在这种情况下，波兰人一定会尝试像许多斯洛伐克人所做的事情。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年长的那一位总是伸出手来扶助年轻的那一位，哪怕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八、捷克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同时变得激进，持续地互相攻击。

米奇尼克：那么内部的分歧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怎么对待他们自身内部的问题？波兰现在讨论的问题多种多样，包括启动市场经济，教会的作用，是否需要一个总统制的还是议会的政治制度，讨论关于农业政策、公司、各种津贴、信用贷款、价格保护、关税保护；还有关于去共产主义化，以及波兰是否采取欧洲的模式还是选择波兰特色，因为欧洲将色情业、人工流产、消费主义毒品、堕落等一视同仁。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哈维尔：有好几个。下个春季开始选举，而政党才刚刚成立，他们老是想着选举，这种东西覆盖了所有他们的宣言。在政治谱系明朗化的同时，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国家模式和写出一部新的宪法。

在捷克，一个争议的中心是关于斯洛伐克。一些政治家们想要一个可能的最强有力的国家，因此不想在斯洛伐克的压力面前让步。其潜台词是，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支持这项政策的选民们的喜欢。而捷克人越来越倾向于说，斯洛伐克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好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某些政治家则进一步激起这种情绪，仅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斯洛伐克也有类似这种情况，有主张联盟的，有主张同盟的，有鼓吹完全独立的。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存在种种分歧。

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经济政策。一种强有力的右派声音在出现。这些人要求最迅速和最激烈的改革造成——简言之——一个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他们遭到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左派的反对。这两方面持续地互相攻击；右派像地下共产主义者那样热衷所有的自由，而左派变得越来越激进，进而批评所有改革过程。

人们也在为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争论，还有就是关于祛除法。后一项更多是在心理意义上的隐蔽问题，发生在从前反对共产主义的持异议者、更年轻的对此事所知无多的年轻人以及既不和共产主义合作也不和反对派合作的人们之间。今天，最后一种人学着尤金·奥尼尔的话说“长期以来我和无聊卑劣的事情作斗争，到头来我也变得无聊卑微了。”意思是说，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失去光泽，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还有，他们指出，有些持异议者原来是共产党员——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他们认为所有共产党员都是一样，不想区分他们是五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在党内。公共舆论倾向认同非持异议者的政治家，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大多数人们自己既不是持异议者也不是党的核心阶层（nomenklatura）。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年轻的政治家更适合他们自己的处境和在精神上与之接近。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那些范围更小的争论，它们都浸透着党派政治。

九、散沙一盘的局面似乎在呼唤魅力型个人，但拒绝铁腕的诱惑对哈维尔来说

并不难。

米奇尼克：前持异议者的边缘化是所有我们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正如你经常指出的——持异议者代表着人们的良心愧疚，这些人曾经循规蹈矩而现在沉浸于非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

但是我仍然想问你另外一件事情。所有我们的天鹅绒革命都或多或少地诞生了魅力型领袖，你本人也是这样一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格鲁吉亚持异议者、民选总统想要以格鲁吉亚的哈维尔为世人所知。这位魅力型领袖和前持异议者很快将他的对手关进监狱。是不是可以说，我们都面临着重造权威秩序的诱惑，而说到底。民主是一个妨碍，它是没有效率的，每件事情都得慢慢来，而我们则需要迅速和关键性的行动。在格鲁吉亚，形势发展为街垒和基本上是一场内战，远远没有结束。

你是否想过后共产主义时期权威主义的威胁，当民主结构仍然脆弱时？当你听说 Zviad Konstantinovich Gamsakhurdia 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哈维尔”时，你有什么感受？

哈维尔：我不认为自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要在关押我朋友的意义上抓权。相反，我在酒吧、大街上遇到的人们都责备我太软弱了。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对他们更严厉一些”。“他们”是指每一种人：共产党员、去公有化者、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政治家和议员。因此，我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不够有权威。

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脆弱的、新生的民主，需要尽快拥有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机构和游戏规则，避免那种民粹派的呼吁铁腕的权威力量出现。民主必须迅速获得权威。如果做不到，就会有斯拉达克（Sladek）这样的人去做。当哈维尔必须获得权威而不是总统、政府和议会获得权威，哈维尔则不再是同一个人。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框架，于其中这些机构能够互相作用。我们需要建立制度性保护来对付不断出现的政治危机。

以我们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有待完成，并伴随着一个新的宪法制度和完成一部新的宪法。我不得不说我要扩大总统权限。我不是说要一个总统制的制度，于其中由一个普选的总统领导各执行部门，而是说我主张在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时期曾经拥有的部分总统的权限。例如，总统有权将立法提交给联邦议院，如果在议会中政府没有赢得信任投票，总统必须能够解散议会和组织一个选举。因此我主张扩大总统权限，不是扩大我个人的权限，而是这个国家首脑的权限。因为这是反对强力政府最有效的武器。

米奇尼克：你好几次说起，作为总统你意识到政治家个人特性的意义。关于此你能不能再多谈一点？在你看来是那种特性？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最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我没有说起过国家首脑（所拥有的）的特性，仅仅是我的观察而已。我注意到，当我喜欢一个具体的政治家，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处于同一个波长和的确能彼此沟通，这反映出与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友好关系。我相信萨拉（Sasha），参加过所有国际性会议，会证明这个。

当我意识到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联系的意义和他们给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时，的确很震惊。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并使你意识到你的责任。很容易想象一种情况——比方说吧——我早晨七点钟与人有一个会面，对方是冰岛的外交部长，但我很累，要睡觉，或者感觉不适。当然，会谈不会取消。于是我们必须在记者招待会上亮相和回答各种问题，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说。因此报纸开始说，

会议是在冷淡的气氛中进行，此次访问是令人失望的，接着很快会变成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冰岛关系降温的一个政治事件。当然，这是我杜撰的一个故事，你会理解我说的是什么。

米奇尼克：我们的民主有一个困难重重的起步，所面临的困难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每一个地方，包括政治竞技场，都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有着种族冲突，在我们所有问题的顶点存在一个我称之为后共产主义初期的混乱——相信一个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正像我们曾经相信计划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样，现在许多人相信在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哈维尔：我个人不同意市场力量会制造解决所有问题的魔力。首先，我不认为市场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或给生活带来意义。这方面我不同意几个右翼报刊专栏作家和政治家的观点，我和他们有争论。

对于我来说，勿庸置疑，所有的财产权应该属于具体的某人，供需法律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不会将这个视为意识形态，视为生活的意义，或一个乌托邦。这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得到证实的管理，并和人的自然天性相吻合。比如，当你召来一个个体户水暖工，他会比国营企业的匿名雇佣者做得更好。显然，因为个体户水暖工对于他工作的结果有兴趣，他从他服务的效果中得到报酬。

在这个意义上，我鼓励有可能的话，最迅速地恢复正常财产关系，恢复商业之间的多元竞争。市场的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是经过考验的被证实的经济原则，但就是这些。它们不是一种宗教。

米奇尼克：近些日子，民粹主义的语言，那些空洞的允诺，正在波兰的公共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政治斗争走到了这一步——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者许诺展示奇迹：如果你选我，我将给你你要的任何东西。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的情形如何？这种东西来自何处？

十、哈维尔对自己身为总统不得不重复一些口号感到不安；他必须同时考虑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个人所应保持的真实。

哈维尔：我想产生于我们不成熟的政治文化。显然，一个人想要在十五年内保证自己及其纲领选举成功，他就必须止步于煽动性口号。他不得不用行动返回到他所说的和能够获得某些结果。在有一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中，仅仅是煽动性口号是不够的。然而，在民主仅仅开始形成的情形下，民粹主义有很多机会利用这种混沌无序总是提出廉价的和轻易的政治口号。

而我必须提及某些自己感到的巨大麻烦。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这意味着我痛恨重复自己、痛恨简单化。同时，因为我现在担当的角色，我责成自己千百次的自我重复，向我的听众发出简单明了的呼吁。当我做一个演讲，我意识到我不能使用复杂的长句子，我必须尽量简洁和结束在一个能够理解的的呼吁上面。我经常发现当我提出一个有原创性的句子，但当我把它解释三遍之后，它已变得陈腐。从我的角度，我的整个生活都在反对这件事情，我批评由陈词滥调组成的生活。我曾经分析过由陈词滥调的语言，现在我发现我自己正在面临职业性的重返陈词滥调的诱惑之中。

我的同事可能体验过这样的事实，我不喜欢写好了的发言稿。我不想要别人来写，因为我知道我正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和我正在接近陈词滥调。同时我也不能念他们给我准备好的稿子，因为我有自己的风格，尽管他们已经写好了，这是

另外一个风格。每当他们为我写，我就感到尴尬和脸红。结果是，我试图自己写，但是我又痛恨做这件事。你不知道昨天要写一个今天的发言稿是多么的讨厌。如果我不照稿念，我有时还能蹦出一些原创性的句子，但是当我把它们写下来，那几乎是索然寡味的。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理解这个。昨天，我建议我来写那个发言稿，但是我意识到我是在彻夜痛苦地写一个你将发现痛苦地把它念出来的东西，我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忍受痛苦。

米奇尼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流亡者归来和派上很好用场的国家：卡尔·斯切沃森伯格（Karl Schwarzenberg）是你总统班子的总管；帕维尔·提格里德（Pavel Tigrid）是你的一位顾问，吉瑞·格鲁莎（Jiri Grusa）在波恩担任大使。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显然，流亡者团体在我们的国家中曾经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很难想象民主的反对派。为什么在所有其他国家流亡者只是给出许多很好的建议，而在这里他们却归来？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那提明斯克（Tyminsk）8的情况怎么解释？

米奇尼克：你非得要这么粗鲁地说话？

哈维尔：必须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的归来并不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其中大多数人还是留在了他们所选择的国家；他们在那已经付出了二十年或者四十年，他们有孩子等等，归来意味着把他们的生活连根拔起。但是他们经常回来看看。每次我走过城堡广场去Vikarka饭店，至少有一百个年长的太太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她们从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回来看看，谢谢我能够让她们这样做。他们不只是过去不能回来，现在也不能回来。但他们都是忠诚的公民，他们不能生活在这儿是很遗憾的。

像斯切沃森伯格（Schwarzenberg）和提格里德（Tigrid）那样的知识分子，把归来看做是一种挑战和乐于投身于民主的诞生，这样的人并不是多数。有些人归来是因为在外面生活得不愉快，或者是为了他们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米奇尼克：请对我说说两年来发生在我们这些持异议者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改变了。你从一个重罪犯变成总统，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是怎么改变的？当一个人同时是总统和作家，你肯定经常发现自己处于这两者选择之间——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忠于自己的真实。你是怎么对付这种事情的？

哈维尔：这是一个要求某些反省的困难问题。首先我必须说，没有一个顶真的人——我认为自己是这种人——能够用简单的单一模式来解释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有着完全矛盾的属性和性格特点。

例如，我是一个对可笑的事情特别敏感的人，我也倾向于对每件事情感到惊奇。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我不能相信自己做了总统，尽管我已经做了将近两年。早晨起来我站在盥洗室，仍然半睡半醒，急匆匆地刷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匆忙。我对自己说我不得不去总统办公室去会见一些总理或别的什么人，突然我意识到我不能相信这个，这是可笑的和不真实的。

另一方面，尽管——这是一个悖论——生活教导我不要对每件事情感到太惊奇，教导我轻快地走过甚至是最荒谬的和最难以预料的情境，它们并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我就这么直接地进入它并似乎有吸引力，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对一个作家来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所创造的世界实际上慢慢地降临到他们身边。我们在他的书中发现，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创造过一个赫拉巴尔式的世界。同时他也实际地创造了它们：不仅在这里他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世界，在

Kocoura 酒吧，而是它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他也能够做到。由于他的出现，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这个变形的结构，采取了赫拉巴尔的路线。

这与我的情况类似。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带点舒适的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又将我周围的空间弄得走样，成功地造成某种未曾预料的情境。我几次入狱和我现在当总统都是一样的荒谬。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荒谬在未来的道路上等着我，或许我从这个办公室里搬走，或许我不能连任，或许我再次坐大牢以度余生，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我选择了我的命运或者我自找麻烦，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我只是一个安静的小资产阶级。

于是存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为每件事情感到惊奇，另一方面是我知道我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种矛盾观念的一种集合物。例如，我们突然变得对我们过去的时代有一种嫉妒，我们不能理解这个。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我们不可能是这样。你真的感到嫉妒？

哈维尔：这只是一个文字上的比方。但是对我是这样。你问起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忠诚和真实之间的冲突。这的确是一个有时候出现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去寻找一种方式——我的同事也帮助我——做到对自己真实，这将避免出卖我相信的某些东西，尽可能地不去制造没有必要的政治复杂化，或者搅乱政治局面以及导致我背叛民主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趣味和想象力的事情。这是一个如何掂量自己所说的话的问题。如果说得大而化之，没有明确所指，你的听众怎么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而如果说得太具体，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和带来更多混乱，你怎么办？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趣味、直觉和想象力；这是比任何政治科学更加重要的东西。

米奇尼克：你是否处于这种情况，作为总统，你签署了一个你知道不该那样去做，但是不能找出别其他办法的法律？

哈维尔：不久前我刚刚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之后我很快把它写了出来。在纽约的一个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我谈论了这个话题。

我们的宪法制度赋予我签署法律令其生效。我只是签署而已；如果我不这样做，法律仍然生效，而我所做的只是在总统和议会之间造成张力。我刚刚遇到的这种情况和祛除法有关，我签署了这项法律同时提出修正它。议会必须接受我的挑战；但是，为了让它变成现实，这项法律必须生效。我的朋友分成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我不能签这是避免实际效果的一种途径，有人说先签了再提出修正案更加富有建设性。最后，我采纳了后者。时间将会证明我做的是否正确。

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与此同时，我立即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我只是做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在做的事情：当我面临一个困境，对我来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们都写下来。这是我解决生活中难题的文字手段。

十一、米奇尼克询问哈维尔的阅读情况，这个问题应该放在总统先生卸任之后。

米奇尼克：你不仅是一个总统，同时还是一个作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和一位对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试图提供一种综合理解的作者。我还想问你的阅读情况。尽管有这么多事情，在过去两年内，你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赞托夫斯基（Zantovsky）：你真的认为他有时间阅读？多么荒谬的一个问题！

哈维尔：事实是，我 95% 的时间都在官方文件和报纸。我很少有时间读文章，读小说更是异想天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关于扬·马萨瑞克 (Jan Masaryk)⁹ 的传记，我们的外交部长，战后死于神秘的环境——是由他的朋友马采尔·戴沃波特 (Marcia Davenport) 写的。

这不是一本很了不得的书，但是读这本书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一天到晚都在担忧，我变得愤怒，我感到失望，想要放弃周围如此多的混乱，这个国家正在崩溃等等，于是突然读到了当共产党准备接手政权时，摆在马萨瑞克面前可怕的道德困境。他曾经向他的父亲发誓，他不会抛弃他的父亲的继任者贝纳斯 (Benes)，但是此时共产主义正在渗透到所有方面。显然，共产主义将要接管和摧毁所有对手。贝纳斯 (Benes) ——一个年老体衰、多病的人，肯定要被抛弃和签署摆在他面前的所有文件。扬·马萨瑞克 (Jan Masaryk) 心理上深感恐惧，但是他又受制于他对父亲的誓言；同时他感到形势已经完全绝望。最极端的是，在斯大林、莫洛托夫、佐林的手上他不断经受羞辱，人们喜欢哥特瓦尔德，当他去华盛顿进行一个官方访问时，结果没有人有时间会见他。不管是马歇尔还是杜鲁门，都不见他，哪怕马萨瑞克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很知名。他的妈妈是一位美国人，他在美国长到十岁，他说英语很流利——不只是书面语包括不同地区的方言。现在他的朋友突然没有时间会见他，这仅仅发生在共产党二月政变的前一个月，此时欧洲的命运已经决定。还有，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位有着强烈盎格鲁·撒克逊同情心的政治家身上，他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曾经是很受欢迎的人物。

这个人缺乏勇气、度过最初冷战时期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这么一种可怕的境地，只有跳出窗外一走了之。比起马萨瑞克 (Masaryk)，我想到我自己的情况的确没有那么糟糕。

米奇尼克：昨天，吉瑞·迪森比尔 (Jiri Dienstbier) 刚刚指给我看扬·马萨瑞克 (Jan Masaryk) 跳出的那个窗户。今天你讲述这个故事和我昨天看到这个窗户，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暗合。

我们相识三十年了。现在，每次人们问及我的政治面向，我总是回答：哈维尔式的。我想为此谢谢你。今天我是和一位朋友和一个总统谈话。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谢谢你，瓦谢克；谢谢你，总统先生。

注释：

1 Ustashe 曾于 1941 年——1944 年依靠德国势力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对非克罗地亚居民实行恐怖统治。

2 Chetniks，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游击队员。

3 Father Tiso 1887—1947，天主教神父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总统，战后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处决。——译者注

4 Antonescu，二战时期的罗马尼亚政府首脑，希望通过依靠德国人反对苏联人。

5 (Belohradsky, 1944——，捷克哲学家，捷克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1970 年起住在意大利，自 80 年代中期以后，对哈维尔影响很大，在《去捣捣乱》“Disturbing the Peace”一书中有提及这个人。——译者注。

6 Miroslak Sladek，捷克一个极右的小党——共和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7 Masaryk，1918 年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8 Stanislaw Tymisk 返回波兰并与 1991 年和瓦文萨竞选总统。——原文注

9 Jan Masaryk，此人为捷克第一共和国总统 Masaryk 的儿子。